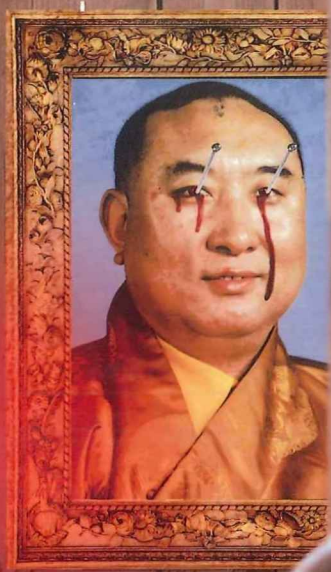


「胡錦濤與溫家寶主持並執行謀殺班禪十世」真相解密

殺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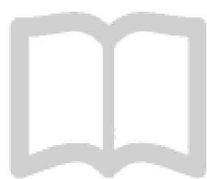


殺佛

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當代滅佛運動

他們無法阻擋你知道有流亡的達賴喇嘛，卻能讓你不知道有留下來的班禪大師
有甚麼更多他們不想也不敢讓你知道的……

袁紅冰·安樂業 著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 出版



殺佛

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袁紅冰
安樂業 著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公司



蒙古利亞

北京

TIB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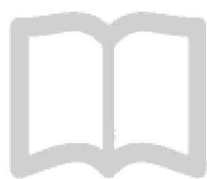
中國
CHINA

台灣
TAIWAN

緬甸







十世班禪大師：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

——袁紅冰

寫在名譽校長靈塔前

——十世班禪大師生前擔任過許多大專院校的名譽校長。我的母校是其中之一。

安樂業

爲什麼？

眾人爲天堂而賽跑

謹請引導！

我要下地獄

爲了那個長滿鮮花的季節

爲了牧人走遍山野的足跡

爲了農夫辛勤耕作的汗水

爲了心上人兒久等無奈的眼淚

我要下最深的底層

涅槃並非自身的目標

燃燒的僅是心

跳動的也是心

穿梭於極地深處

怕誰？

牛背是我們成長的搖籃

雪山是我們強壯的身軀

草原是我們寬闊的胸膛

爲什麼？

眾人爲自身而無奈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於日喀則逃離暴政途中

我沉默了

——德國牧師Martin Niemöller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當納粹抓共產黨時，我沉默；反正我也不是共產黨。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當社會民主黨被關時，我沉默；反正我也不是社會民主黨
。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當工會幹部被抓時，我沒抗議；反正我也不是工會幹部。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Jude.

當猶太人被抓時，我沉默；反正我也不是猶太人。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當我被抓時，已經再也沒有人可以為我抗議了。

關於袁紅冰

袁紅冰，流亡作家、中國著名自由主義法學家、詩人哲學家、政治活動者、「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起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席委員、「自由聖火」網站總編輯。現居澳大利亞。

一九五二年出生於內蒙古高原。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袁紅冰成為一名知識青年流浪漢。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政府以清查「內人黨」（編按：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名義開始迫害蒙古人民。蒙古民族的慘痛經歷深深震撼了袁紅冰少年敏感的心。他發誓，一定要把蒙古人民的苦難寫出來，一定要讓那些美麗、自由、

高貴的生命在自己的小說中得到復活。從此，袁紅冰踏上了艱難的秘密寫作之路。

一九八六年，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後，袁紅冰留校任教。之後，任訴訟法教研室負責人。他在高校中宣導自創的英雄人格哲學，被學生譽為「北京大學精神導師」，名噪一時。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袁紅冰組建了「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一九九一年十月，袁紅冰哲理散文詩《荒原風》出版，並旋即被禁。一九九二年，袁紅冰主編、出版轟動一時的《歷史的潮流》；一九九二年六月，發起、召開，並主持有百名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參加的「奧林匹克飯店會議」，抨擊極左思潮。

一九九四年三月，因發起和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中國當局以「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罪秘密逮捕了袁紅冰。同時，「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被國家安全部非法沒收。這部體現蒙古民族追求自由命運的史詩，歷經二十餘年，於一九九三年完成。

被捕的當天夜裡，袁紅冰便被秘密押往貴州。

袁紅冰在北京高等院校內和社會上的廣泛影響力，使當局不敢在北京對他進行審判。「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對袁紅冰的審訊過程中涉及到的具體罪行有如下十八項：

- 一、以競選人身份參加八〇年北京大學人民代表的競選活動；
- 二、八九「六·四」事件中，發起組建全國高等院校唯一一個教師非法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以及非法發起召開全校教工大會、全校黨員大會，並撰寫《致中國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的公開信》，為動亂推波助瀾；
- 三、九〇年出版的《荒原風》，系統否定官方哲學辯證唯物主義，並以該書中的「餘韻」一篇，為「六·四」暴亂唱輓歌；
- 四、九〇年和九三年，兩次煽動北京大學學生推舉自己作人民代表候選人；
- 五、九一年，煽動北京大學學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干擾國家的外交政策；

六、九二年，非法主編、出版《歷史的潮流》，企圖以此書分裂共產黨中央；

七、九二年，向北京市法院提起訴訟，指控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和國家新聞出版署查禁《歷史的潮流》為非法；

八、九二年六月十四日，發起召開並主持有百名持不同政見知識份子參加的「奧林匹克飯店會議」，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再度氾濫；

九、九二年十一月，發起召開由國家官員和自由知識份子參加的「大鐘寺飯店聚餐會」，企圖為「六·四」事件翻案；

十、九三年秋，為抗議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以政治壓抑學術自由，進行個人靜坐示威；

十一、九四年初，就警察對自由畫家嚴正學施暴事件，發起三百人簽名抗議活動，企圖造成社會動亂；

十二、發起組建涉及十餘個省區的自由工會性組織「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

十三、試圖組建包括魏京生、閔奇等人在內的民運領袖集團；

十四、九四年二月，參與煽動山東某縣農民基督徒進北京抗議當地員警迫害宗教自由的活動，並同意作農民基督徒抗議活動的律師；

十五、與柴治國等持不同政見共產黨員一起，組建反黨集團性質的秘密組織；

十六、長期以來，通過組建公司、舉辦和參與各種討論會等方式，向黨政軍各要害部門滲透，為鄧小平之後，發起民主運動與專制政治的決戰，進行政治、經濟、社會力量等方面的全面準備；

十七、撰寫了作為民主運動理論綱領的著作《民主與共和》；

十八、為發起「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撰寫了反動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和哲學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

同年底，經過半年的非法監禁，中國當局將袁紅冰流放貴州。在安全部門的嚴密監視下，袁紅冰由此成為「中國當代訴訟史上的失蹤者」。美國國

務院公佈的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的人權報告之中國部分中，兩次提出袁紅冰的人權案例。

一九九五年九月，袁紅冰克服重重困難，又一次在秘密狀態中，重新完成了《自由在落日中》。

這部被毀後重新寫出的《自由在落日中》的命運本身就是一部傳奇，它象徵著自由的人性對專制鐵幕的勝利。

至二〇〇三年，袁紅冰又陸續秘密創作出《文殤》（袁紅冰自傳體小說），《金色的聖山》（堪稱藏人命運史詩的小說），和《回歸荒涼》（描繪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普遍墮落以及高貴生命的絕望的小說）。

二〇〇四年七月，袁紅冰攜耗時三十餘年秘密創作出的《自由在落日中》等四部書稿流亡海外。這四部小說，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更通過詩意的語言，記錄下人們對自由人性的永恆追求，體現出對專制的反抗與蔑視。

有評論稱「袁紅冰於二〇〇四年十月在海外出版的一系列小說作品將為『中國語境』在世界文學史上贏得更大的榮譽和尊重。這也是世界有史以來、中國有史以來用沾滿血和淚、激情與卑微、自由和強力的文學敘事完成的劃時代文本」，「四部日後註定要載入中國文學史冊的巨著……在海外出版，系統全面的揭發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人倫、道德、宗教的毀滅性破壞，堪稱是集史學、哲學、文學、民族學、思想、宗教於一體的奇書」。

二〇〇五年六月，「審判中國共產黨國際司法委員會」任命袁紅冰為「審判中國共產黨反人類罪行雪梨國際刑事法庭」大法官，組建「審判中國共產黨反人類罪行雪梨國際刑事法庭」。

二〇〇五年八月，「審判中國共產黨反人類罪行雪梨國際刑事法庭」開庭審理法輪功學員指控江澤民、羅幹、周永康、劉京，及中共「六一〇辦公室」（編按：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後地方各級黨委陸續設立，統稱「六一〇辦公室」），在迫害法輪功過程中所犯的反人類罪行。

二〇〇五年八月，創辦「自由聖火」網站，任總編輯。

二〇〇六年四月，作為「審判中國共產黨反人類罪行雪梨國際刑事法庭」大法官，袁紅冰就法輪功學員控訴江澤民等反人類罪案作出刑事判決，判處江澤民、羅幹、周永康、劉京等四被告終身監禁，沒收個人財產，並宣佈取締「六一〇辦公室」。

二〇〇六年四月起，發起「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宣導中國文化復興。任「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席委員。

袁紅冰的主要文學著作有：《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聖山》、《回歸荒涼》、《文化與命運——袁紅冰流亡文選》；主要傳記著作有《文殤》；主要哲學著作有《英雄人格哲學》、《哲人之戀》、《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燃燒的安魂曲》；主要法學著作有《法的精神漫談》、《判斷訴訟證據標準論》；主要政治學著作有《民主與共和》、《台灣自由三部曲》、《被囚禁的台灣》；主要政治哲學著作有《人類大劫難》。

袁紅冰的文學著作《自在落日中》、《文殤》、《金色的聖山》、《回歸荒涼》在臺灣和香港出版後，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共當局把他的全部文學著作都列為禁書。

袁紅冰主要著作創作年表：

- 《荒原風》：一九九〇年
- 《民主與共和》：一九九二年
- 《英雄人格哲學》：一九九二年
- 《自在落日中》：一九九五年
- 《文殤》：一九九六年
- 《法的精神漫談》：一九九七年
- 《金色的聖山》：二〇〇〇年
- 《回歸荒涼》：二〇〇一年

- 《文化與命運——袁紅冰流亡文選》；二〇〇九年
- 《台灣大劫難》；二〇〇九年
- 《台灣大國策》；二〇一〇年
- 《哲人之戀》；二〇一〇年
- 《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二〇一一年
- 《台灣大國魂》；二〇一一年
- 《台灣自由三部曲》；二〇一一年
- 《人類大劫難》；二〇一二年
- 《被囚禁的台灣》；二〇一二年
- 《燃燒的安魂曲》；二〇一三年

《殺佛》導讀

《殺佛》是由詩人哲學家袁紅冰主筆，與藏漢雙語詩人安樂業共同創作的時政巨著。這是一本關於中共暴政殺佛的重罪之書，也是關於十世班禪大師的悲情之書。

迄今為止，袁紅冰的絕大部分文學、哲學和時政著作都以中共暴政下被侮辱與被踐踏的族群的命運為背景；人類的「心靈苦痛」是袁紅冰創作的永恆主題，也是他創作的宿命。

由於他的著作詩意豐饒，又以表述弱勢族群的苦難命運為創作的天職，充盈著俠義精神，所以，他被稱為詩俠。

安樂業因為從事自由西藏運動被中共當局關進勞改營；出獄後，他翻越喜馬拉雅大雪山，走向自由。他是第一本藏人政治犯的詩集的創作者，也是進行獨立研究的藏學家；他的詩和相關學術著作已經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

《殺佛》的主題是揭密中共當局謀殺第十世班禪大師的陰謀決策和實施過程；圍繞這個主題，作者將中共當局黑手黨式的決策機制和藏人的悲苦命運等一系列重大課題的真相，呈現在世界面前。

相信《殺佛》的出版，必將在中國大陸、西藏、流亡藏人社區、台灣、日本、西方國際社會，以及全球佛教界引發震撼性的反應。

《殺佛》至少有下列九大看點：

一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突然逝世。十世班禪大

師死於中共當局謀殺的懷疑不脛而走；十世班禪大師之死遂成爲世紀之迷。

《殺佛》第一次全面、具體、詳盡地揭示出中共當局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整個過程，使世紀之迷大白於天下。

二

《殺佛》關於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決策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原因和過程的敘述，關於原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原中共總理溫家寶、現任政治局委員胡春華、現任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冷血謀殺十世班禪大師過程的揭示，讀起來令人驚心動魄，也使中共政治黑手黨的本質無所遁形。

三

《殺佛》揭開中共當局製造僞十一世班禪，以及讓真正的十一世班禪銷形滅跡的黑幕，也把中共全面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真正死亡原因的知情人的國家恐怖主義罪行公諸於世。

四

《殺佛》揭示出當前中共控制西藏的一項戰略思考。

習近平說：「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根據習近平的指示，中共當局正在設計和實施一個政治陰謀，即將達賴喇嘛誘騙回中國，以便將來控制達賴喇嘛的靈童轉世過程。

一位中共太子黨核心成員聲稱：「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我們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犛牛的兩個睾丸……」

五

《殺佛》揭示出中共暴政鐵幕後面發生的當代消滅佛教運動。

西藏高原之上，從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一直持續至今的滅佛運動，戕害宗教、荼毒僧眾，禍及萬民，其凶殘酷烈的過程史無前例，令人不忍卒讀。

世上億萬佛教信徒，無論身居何處，知悉佛教蒙難於西藏高原的內情，都應當發大悲之聲，為遭受暴政大迫害的藏傳佛教伸冤。

六

十世班禪大師是雪域高原之上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西藏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和發起人。

《殺佛》揭示出，中共當局為斬斷流亡藏人和西藏境內佛教復興、文化復興、西藏復國三大運動之間的聯繫，透過操縱流亡藏人上層中的某些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改稱「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陰謀實施過程。

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等於交出西藏主權之後，又徹底交出了西藏的治權；「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只是一個流亡藏人社區的服務組織，或者人權組織，而不再是一個政治組織，因此，不再具有表達西藏境內反抗運動的政治意志的能量。

《殺佛》披露的這部分內容，既令人深感中共政治陰謀之狡猾詭詐，也

令人為流亡藏人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而扼腕長嘆，不勝唏噓。

七

薄熙來事件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歷史性事件。關於這個事件，《殺佛》揭示出一個必將引起全球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者極端關注的秘辛。

薄熙來被囚之後，立刻發出威脅，聲言如果判處他死刑，他就將在法庭上揭發胡錦濤、溫家寶、胡春華等人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罪行，並要求以殺人罪對這群「殺佛」罪犯實行逮捕，提起公訴。

薄熙來此言一出，中共廟堂震撼。中共當局遂以薄熙來之子的生命作籌碼，與薄熙來達成黑幕交易——

中共當局留薄熙來一命，薄熙來則在中共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問題上保持緘默。

《殺佛》披露的這個辛秘，對於讀者瞭解中共的政治法律的實質，有振聳發聵之功。

八

二〇〇八年，中國河北爆發毒奶品事件，流毒國內外，舉世震驚，全球嘩然。可是，當時的河北省長胡春華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繼續平步青雲，官運亨通，甚至被培養為「中共第六代領導集體」的領頭羊。

《殺佛》揭示出其中的奧秘：胡春華之所以深得太子黨信任和倚重，全在於他在中共殺佛，即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過程中立下「不世之功」。殺佛之「功」使胡春華獲得了中共賜與的「鐵帽子王」（編按：清朝共有十位親王和二位郡王獲「世襲罔替」（子孫無限次數世襲，且承襲被承襲者之原有爵位），俗稱十二家「鐵帽子王」）。

「一葉知秋」！

胡春華的例證表明一條中共官場的潛規則——

每一個登上高位的中共官員，都要以為中共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重罪作「投名狀」。

九

二〇一二年以來迄今為止，已經有一百二十二位藏人點燃自己，把燃燒的生命作為神聖的祭品，獻給自由西藏的理想；自焚藏人有許多是「花季」（編按：十六、七歲時，雖非完全無憂無慮，但是人生許多重要的煩惱還未被列入思考範圍，這時一般被稱為「人生的花季」，意思是純潔美好）的少年男女。

從藏人生命中騰起的一團團金焰在拷問人類的良知，藏人為什麼自焚已經成為世紀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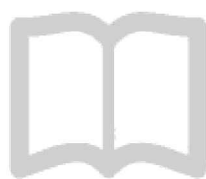
《殺佛》對這個世紀之問作出了必將銘刻史冊的明確回答——藏人不得不用燃身獻祭的方式爭取自由，根源在於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統治和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

中共曾經透過一紙和平協議，允諾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然而，中共統治西藏六十餘年，藏人的命運在血海屍山間伸展；十世班禪大師曾經發出「勿使佛教滅亡，勿使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聲。時至今日，藏人正瀕

臨文化滅族的大劫難。

現在，中共又企圖再用「一國兩制」來誘騙台灣放棄主權。
藏人的前車之鑒，台灣人不可不察。

「今日的西藏，就是明日的台灣」——這是一句警世箴言。



目錄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第二章 西藏悲情

——佛國淪為「黑地方」

第三章 班禪佛是聖者與英雄

——他用金剛寶杵敲開地獄之門

第四章 歷史上的短暫春天

——班禪大師在藏人心靈中播下佛教復興的種子

第五章 決策殺佛

——春天之後將是嚴冬

第六章 準備殺佛

——鬼影幢幢，陰謀如晦

第七章 佛殤

——聖潔的白蓮花凋殘於鐵幕陰影之下

第八章 佛魂不滅

——黑暗不會成為永恆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說：「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

這個『寶貝』了。」

第十章 現代滅佛運動的罪惡之源

——漢人的苦難和罪責

第一章

我的宿命

——佛的雙眼流出猩紅的血

「心靈的苦痛是哲學和文學的永恆主題。」對於我，這個箴言卻意味著宿命。

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種神秘的力量，總是讓種種塵世間心靈的苦痛與我的命運正面相撞。每一個心靈的苦痛都像一柄燒紅的刺刀，深深插入我的心中；這種心的疼痛就是我的宿命。

於是，表述屬於這個世代的心靈悲劇便成爲我終生的精神苦役；彷彿我的筆天生就是塵世心靈苦痛的代言人。

《殺佛》這本著作書寫的正是關於一個活佛的命運悲劇，悲劇所蘊涵的心靈苦痛同時也屬於藏人族群。

這位活佛就是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

二〇〇〇年，我去探訪一位十五年未曾謀面的同學。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同窗共讀，我們曾經是摯友。本科畢業後，他和北京大學的十幾位校友一起，遠赴西藏工作，而我則繼續留在學校。從此我們便天各一方。

歷經人世滄桑之後去探訪老友，是試圖讓我疲憊的心得到某種安慰。然

而，甫一見面我就發現自己錯了。這位老同學好像受到了時間的詛咒，正值壯年卻衰老得如同一段長滿白髮的枯樹，而且，他的雙眼黯淡無光，像兩片早已被生命遺棄的發霉的夜色。

顯然，我前來尋找慰藉，然而，我面對的，卻是一個比我更需要安慰的殘破的靈魂。

在鐵鑄的沉默中，他為我切肉，為我置酒，然後，用目光邀我一起舉杯狂飲。

烈酒很快就把我們之間的沉默燒成深紅，他灰暗的眼睛也被痛苦的神情照亮，於是，他開始說：

「你還記得那個叫胡春華【註1】的嗎？他是中文系的。畢業那年，我們一起來西藏。一九九二年，他被胡錦濤【註2】提拔當共青團西藏的書記。」

「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天，胡春華請在西藏的北京大學校友到他家裡喝酒，慶賀升官。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我醉到不能走路，只好睡在胡春華家的客廳裡……」

這位同學的聲音啞啞而低沉，像一陣衰弱的燒焦的風。但是，一件令我驚心動魄的事情卻從他的敘述中清晰地呈現出來……

第二天接近中午，這位同學才從宿醉中醒來。胡春華已經上班，房間裡沒有其他人，靜得如同墓穴。這位同學起身，想要找衛生間。酒意朦朧間，他拉開客廳角落裡的一扇狹窄的門。門內的景象立刻使他的酒意在驚悚中風消雲散，蕩然無存。

門裡面不是衛生間，而是一個壁櫥。

窄窄的攔板架上，一盞低度數的暗紅的燈發出黯淡的光，給壁櫥蒙上一層古老血鏽的色調，顯得陰氣森森，猶如地獄。壁櫥正中掛著十世班禪大師的像，兩隻鐵錐分別扎在班禪大師【註3】雙眼的眼球上，他的面頰間還有用紅油漆畫出的兩行從眼睛中湧出的血淚。

班禪大師唇邊依然飄拂著佛才有的祥和的微笑，雙眼中卻湧出猩紅的血

淚——

這既意味著蒼天和大地都會為之哀悼的悲情，又似乎是佛的苦難命運的象徵。

這位同學震驚地凝視著班禪大師被鐵錐刺瞎的流血的雙眼，一時不知所措。不過，他很快意識到，自己無意間窺視到胡春華的一個隱秘，而這個隱秘同時也屬於中共鐵血強權。即使無意間窺視到別人的隱秘也常常意味著危險，而且，隱秘的性質越嚴重，危險便越致命，更何況他所發現的隱秘與鐵血強權的罪惡直接相關。

憑著偵查學的相關知識，這位同學輕輕關上壁櫥的門，接著掏出手絹，拭去留在門把手上的指紋，又用拖布抹去壁櫥門前地板上的鞋印。做完這一切之後，他才離開胡春華的家。

他想要消滅一切能夠使自己同這件事聯繫起來的痕跡，但是，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的痕跡，卻難以磨滅。

班禪大師於一九八九年初入滅。

大師圓寂之後，關於大師是死於謀殺的傳言便不脛而走，像一縷冤魂，

隨風在西藏高原上飄蕩。

根據從胡春華家壁櫥裡看到的十世班禪大師的像，這位同學不能不確信那個傳言是真實的，而胡春華定然在謀殺班禪大師的政治陰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胡春華出生在湖北省。那裡曾經是古楚國巫文化濫觴的瘴癘之地，專生毒蛇惡獸。

迷信鬼神，崇尚巫術，乃是巫文化的遺風。

謀殺某人之後，爲了避免他的鬼魂來索命復仇，謀殺者必要用鐵錐，或者荊棘、鋼針，釘入受害人的雙眼——

依照巫文化的信念，刺瞎被謀殺者的雙眼，他的鬼魂也就會由於盲目而迷失在永遠的黑暗中，找不到復仇的對象。

雖然在文化的意義上，胡春華已經背棄了精神的祖國，並且與共產黨的精神源流，即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屬於同一個族群——

他們都把物性邏輯視爲價值之王，都把心靈歸結爲物性邏輯的分泌物。但是，犯下弑佛重罪之後，胡春華顯然無法只依靠西方唯物主義哲學的

信念，就徹底消除內心的恐懼，於是，他不得不從巫文化最陰鬱、惡毒的部分，尋找精神的慰藉。不過，從他用鐵錐刺瞎班禪大師像的雙眼的那一刻起，他就徹底刺瞎了他自己的良知之眼，此後，他將完全喪失理解和欣賞美與高貴的事物的能力。

多年以來，這位同學對於那次他在胡春華家裡發現的秘密一直守口如瓶。他知道，一旦講出這件事，他可能面臨殺身之禍。

除了危險的意識之外，讓他保持沉默的還有另一個理由。

那天，他是受盛情之邀，才去胡春華的家中赴宴；如果他把這個無意間發現的秘密講出來，就無異於背叛同學情意的小人。更何況胡春華登上高位之後，對於在西藏工作的北京大學校友，多有關照，同學之情殷殷可鑒。

對於意志堅硬的人或者喪盡天良的人，秘密才不會成爲精神的負擔。可是，我的這位同學意志既不夠堅硬，也還天良未泯，所以，無意間窺視到的秘密日夜都在折磨著他。他很清楚這個秘密中隱藏著殺佛的罪惡，而他的沉默使他覺得自己是殺佛的同謀。

自從那天離開胡春華的家之後，這位同學便長期失眠——

不是他丟失了睡眠，而是他不敢閉上眼睛；只要一閉上眼睛，他就會看到插進十世班禪眼球的鐵錐，看到大師眼睛裡湧出的血淚，還有大師唇邊飄拂的那一縷屬於虛寂意境的春雪般寧靜的微笑。

「那個壁櫥就是充滿血腥氣的地獄，班禪活佛的靈魂被囚禁在地獄裡；佛在悲泣，眼睛裡流出的是血……這個景象像一個惡咒，而我每時每刻都承受著詛咒……」

「……冥冥中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只有把這個秘密講給另一個人聽，我才能得到解脫——打破沉默，才能為班禪大師打開地獄之門；班禪大師的魂回歸佛境，我也才能擺脫惡咒的糾纏。今天你來了，對我講出這個秘密，我就可以從惡咒中得到解脫。呵，我現在就輕鬆了，心的鐵鏈已經解開。」

「……可是你要答應我，絕不把這件事講出去。這麼多年，我一直在沉默中忍受折磨，就是因為找不到一個能夠信守承諾的人。我知道，這個社會上如果還有一個守信的人，那就是你……」

「一旦把這件事講出去，你我都會有危險，當官的可能殺人滅口。更重

要的是，一定會影響胡春華的前程。

「現在，他的仕途可以說一帆風順，春風得意。這幾天，他被指定參加北京中央黨校的省部級幹部進修班，進行培訓。聽說胡錦濤還極力想把胡春華提拔到中央去工作。要是因為我們講出這件事，毀了他的前途，也太對不起同學了。那樣的話，我就變成了一個賊——人家請我到家裡作客，我卻偷走主人的秘密，讓人家傾家蕩產。所以，你一定不要把這件事講出去，陷我於不義……」

——這番話是那天酒酣之際，同學對我的最後囑託。

當時，直視著這位同學猶如風裂的石灰石般蒼白、乾枯的面容，我只能幾乎看不出地點了一下頭，表示承諾之意——

雖然幾乎看不出，但畢竟作出了承諾。

之所以勉強作出承諾，是因為意識到，假如我拒絕他的囑託，這個受到命運詛咒的脆弱的人，很可能會立刻變成一個瘋子。

當然，我也完全理解承諾的後果：從此我將代替他，用痛苦的沉默托起

一個飽含佛的血淚的秘密；秘密中承載的千古悲情，將由於我的沉默而化作對我的終生詛咒。

爲此，我恨這位同學，恨他把良知不能承受之重轉給了我。

不過，憤恨之餘，我很快又原諒了他，因爲，他可以算是我的知己；他知道，我天生就是爲了承受塵世的艱難和悲愴而活著或者死去。

聰慧的人寧願在清醒中死去，也不肯在渾渾噩噩中苟活。

我是一個聰慧者，所以，我決定查清十世班禪大師之死的真相。

從世紀交替之際起的四年中，經過無數次努力，再加上天祐人助，一個超越班禪大師個人命運的歷史悲劇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地逐漸從中共極權政治陰謀的暗中浮現出來——

清晰得就如同鐵筆在鉛板上刻出的圖案，擺在我的面前。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看到中共鐵血強權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理由和具體策劃實施的過程。其中每一個理由都在論證中共權貴的冷血、自私、對權力的貪慾，都在論證中共暴政對藏人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暴虐和國家恐

怖主義的凶殘；其中每一項具體的策劃和實施都在論證中共權貴的虛偽、詭詐和黑手黨政治的本質。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看到十世班禪大師，這位悲劇英雄的智慧與無畏；而智慧與無畏後面，是佛的大悲之心。他的高貴人格在宣讀藏文化萬年歷史的精神遺囑。

正是班禪大師，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藉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胡耀邦主政的時機，以超人的智慧和無我的英勇，在西藏高原上，在六百萬藏人乾涸的心靈中，播撒下佛教復興和藏文化復興的種子。

十世班禪大師是上蒼對藏人的祝福；如果沒有十世班禪大師艱苦卓絕的努力，藏文化的命運之樹或許已經在西藏高原上凋殘。

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下半期一直持續至今，雪域高原上如火如荼的藏人抗爭暴政的自由運動，都是班禪大師播下的心靈種子開出的繁花和結出的碩果。

十世班禪大師又一次論證了英雄和聖徒創造歷史的真理。

從這個歷史悲劇中，我再一次領略到佛學中最令人心靈震撼的菩薩的大

悲之情。

菩薩誓願身入地獄，承受人類的全部苦痛與罪孽，直到所有苦難的命運都得到超生——

十世班禪大師也是如此。

大師的靈魂與情感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共極權下淪爲人間地獄的西藏高原；他生命的足跡與藏民族的苦難命運重疊在一起；在最悲慘的時刻，他也與自己的族人同呼吸共命運；他是藏人苦難的代言人，所以，他爲自己的族人承受蒼天般沉重的苦難。

如果說當代藏人的命運像一條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流淌的血河，班禪佛的千古悲情就是血河中的一朵最壯麗的浪花。

如果說當代藏人的命運是在地獄中迴盪的永不停息的風，班禪大師的意志就是那藏人命運悲風的不滅的魂。

佛血迸濺在極權鐵幕之上，極權鐵幕則遮天蔽日，試圖把殺佛的大惡埋葬在九地之下，使之永遠不見天日。來自天啓的機遇使我與中共殺佛的陰謀

正面相撞。

然而，面對太陽都會為之放聲痛哭的歷史悲劇，卻只能保持陰影般的沉默，這對於我，一個自少年時起便誓願以俠義精神安身立命的人而言，乃是情感的酷刑。不得不咬碎牙齒，忍受情感的酷刑，是因為我對那個同學作了承諾——

不僅是不願辜負同學的信任，更是基於一項人格的信念：好男兒一諾千金。

理想主義者都相信夢境。十餘年來，在許多次夢境中，我的魂都飄進那個被血紅的燈光照亮的壁櫥，班禪大師的軀體彷彿被惡魔的詛咒鑄進布滿血鏽的鐵壁間。有時用一片金霞，有時用一縷淺藍的風，我為大師輕輕拭去面頰上點點猩紅的血淚，但是，我不敢為大師拔掉插進雙眼的鐵錐，我怕那會讓他更加疼痛，我怕拔掉鐵錐之後，他眼睛中湧出的滔滔血河，會淹沒人類的歷史和墮落的塵世。

二〇〇九年，我為撰寫《通向蒼穹之巔》採風的過程中，知悉了一件點

燃我情感的事件。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藏民族三十年前浴血起義的紀念日，在拉薩街頭，一位神韻如金鷹的藏人青年，彷彿要擁抱蒼天一般，向太陽展開雙臂，衝向軍警的方陣；同時，他的呼嘯聲在金色的陽光中閃耀：

「我就是三十年前被你們殺死的起義者，我又轉世回來了！」

我意識到，這位藏人青年的呼喊是再次復活的反抗意志的宣示，是自由之魂重返西藏高原的象徵，是西藏復國理想永遠輪迴不滅的誓言。

這一切的精神起點，便是上世紀八〇年代，十世班禪大師在藏人心靈中播撒下的西藏文化復興和佛教復興的種子——

每一粒種子都是一滴從班禪佛心中滲出的血珠。

西藏的反抗意志、自由靈魂和復國理想已經重返人間，可是，班禪大師死於謀殺的千古奇冤，卻依舊被鐵血強權埋葬在政治陰謀中，不得見天日。面對此種情形，即使鐵石之心也會因悲憤而迸裂。於是二〇〇九年早春，在位於喜馬拉雅臺地上的達蘭薩拉【註4】，我舉行國際記者會，首次正式公布十世班禪大師死於中共政治謀殺的信息。

為繼續信守對那位同學的承諾，我沒有披露已經瞭解到的陰謀的具體內容和實施的過程，當然更沒有提到胡春華將鐵錐插入十世班禪大師像的雙眼一事。

我原以為，只要公布班禪大師遭受謀殺的線索，便會引起西藏流亡政府的關切，而以一個政治組織的能量立案並展開調查，比任何個人的努力都更有助於為班禪大師雪洗浴血的冤情。

可是，我遇到的卻是冷漠。

我知道，那種冷漠本質上不是針對我的，而是針對十世班禪大師。

對於一位聖者和英雄的悲苦命運的冷漠，實際在表述某種意義上的人性
的腐爛和政治的骯髒。

我不禁再次想起一位中國女政治犯的遺書——被處決前，行刑者為阻止她在刑場上發出對暴政的詛咒，竟用生鏽的鐵絲刺穿她的下顎和舌頭，然後將鐵絲擰成一個死結——遺書中寫道：「即使對鐵鑄的牆咳一聲，也會聽到回音，可是，我向活人的心千萬遍呼喚，卻得不到一絲回應。」

對班禪大師的命運悲劇冷漠如寒霜者，以及用鐵絲將女政治犯下顎和舌

頭擰在一起的行刑者，這兩種人雖然時空遠隔，卻有殊途同歸之意——他們都要把真實埋葬於死亡中。

不同之處只在於，前者是通過消極的不作為來埋葬，後者則表現為積極的作為。

直視比鐵鑄的高牆更陰沉的人心的冷漠，我又陷於沉默之中。

沉默是源於對人類的絕望——

難道人類已經徹底背叛了道德良知和正義？難道人類的歷史將由卑鄙的政客來書寫？

我在對人類的絕望中沉默著，直到二〇一二年。

這一年，我決意昂視闊步走出沉默，撰寫《殺佛》一書，向世界全面徹底地揭示中共鐵血強權決策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歷史背景、時代原因和具體過程。

透過這本著作我要講訴的，不僅是班禪大師的個人命運悲劇，還有藏人的心靈悲愁和現實苦難。

我之所以決意走出沉默，是因為雪域高原上升騰而起的一團團生命的聖

火，熔化了我對人類的絕望。

這是一個背叛心靈的理想並在物慾中腐爛的時代。

二〇一二年，丟失了靈魂的歷史用庸俗的筆觸記錄下來的每一個所謂重大事件，無論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藝術的，甚至宗教的，基本都是由沸騰的物慾主宰，而與心靈無關。

但是，就在地球上離太陽最近的地方，就在伸出手去便可以撫摸藍天和彩雲的地方，就在那金翼的鷹群和浩蕩的萬里長風棲息的地方——

由安多、康藏和衛藏構成的西藏高原之上，一百多名藏人男女，為反抗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而點燃自己，把化為金色烈焰的生命作為神聖的祭品，獻給自由和西藏復國的理想。

自焚群體中，有風蝕的岩石般歷盡滄桑的老人，有燦若朝霞的少年和花季少女，更多的是年輕的雪域鐵漢，還有彷彿青銅雕成的高原美人。

在人類萬年的文化歷史過程中，沒有哪一個民族，像藏人這樣，以族群的名義點燃自己，用如此英勇悲愴而又燦爛輝煌的方式，表述對於自由的苦

戀，對於心靈的忠誠。

中共極權暴政統治西藏六十年，藏人的命運是在血海淚濤中蜿蜒；藏人的苦難如高山巨嶺橫互在歷史的天際。

藏人的自焚獻祭者是在西藏命運的血海淚濤中點燃自己，藏人如山的苦難在為獻祭者的正義性作證。每一個自焚的藏人都是一團自由的聖火，一盞禮佛的金燈；都是一首英雄的史詩，一支心靈的長歌——

每一個自焚的藏人都是一尊金焰之佛。

中共宣傳機器污蔑達賴喇嘛煽動自焚。

事實上達賴喇嘛不僅沒有煽動，而且也沒有能力煽動誰去點燃自己——
即便是釋迦牟尼佛或者上帝也沒有這種能力。

每個自焚者都是依照自由心靈的啓示，讓自己的生命在金焰中昇華為璀璨而短暫的意義——

人的生命本來就只能擁有瞬間，而與永恆無緣。

藏人獻祭者群體承受金焰焚身裂骨的人世間極致的苦痛，卻在人類異化為醜陋的物性貪慾存在的時代背景下，為自己的族群贏得了不朽的榮耀——

塵世間，唯有金色的火焰不會朽敗。

他們向歷史證明了，藏人不僅是佛的選民，也是寧願爲作自由人而焚身獻祭的英雄和聖徒的選民。

西藏自焚抗暴運動堅守的精神原則，與物性貪慾主宰的時代中人類的價值取向南轅北轍。儘管前者在九天之上，後者在九地之下，但是，在上者卻不得不承受孤獨。這正是屬於墮落時代的精神悲劇。

於是，「西藏在燃燒，世界在冷漠旁觀」的現象，便成爲一個令人欲哭無淚的時代特徵。

自由世界裡，從標榜追求正義的政客到炫耀自由意志的文人，都只會偶爾把飄忽的斜視轉向燃燒的西藏高原，似乎自焚抗暴運動是發生在銀河外星系的遙遠事情。

動物保護主義者則透過亢奮地呼籲關心灵浪貓狗，來炫耀他們的人權良知已經超越人類的領域，可是，他們對西藏的人權災難卻麻木不仁，視若無睹——

每一個被他們忽視的自焚的藏人都是一份對暴政摧殘人權的熾烈控訴。

當東亞大陸的苦難在呼喚自由的拯救時，西方卻首先必須對自由作出生命哲學的拯救。

時代將靈魂出賣給物性貪慾，自由便淪為物性貪慾的囚徒，經濟至上論因此甚囂塵上。

於是，中共暴政用金錢買下人類的良知，自由也就同時把自己出賣給對暴政的綏靖主義——

爲了從暴政得到滿足物性貪慾的經濟利益而綏靖。

在自由獲得高貴的生命哲學拯救之前，從藏人獻祭者心靈中升騰而起的金焰，即便能點燃死灰，也難以點燃那一雙雙冷漠的眼睛。

在藏人獻祭者的自焚抗暴運動前，中共暴政的千萬御用文人一直保持著冷血而卑鄙的沉默。

中共暴政六十年間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以推行文化性種族滅絕的血腥政策。可是，暴政的代言人溫家寶【註5】，竟把反抗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的自焚者，稱爲「恐怖主義」，從而爲暴政進一步強化對西藏的國家恐

怖主義鎮壓正名——

暴政就是要仗恃鐵血強權，指鹿為馬，顛倒是非。

而中共著意培育其「國際影響力」的文化特務王力雄【註6】，則在歷史的關鍵之點上「偶爾露崢嶸」，回報中共的栽培之恩，透過指稱藏人自焚是「高度暴力」，為溫家寶顛倒黑白之說提供理論佐證。

然而，溫家寶的荒謬之言，王力雄的污蔑之語，卻似乎要在六十億人類的整體沉默中，成為黑色的真理，鮮少有人為藏人獻祭者仗義執言。這真可令太陽為之一慟——

難道人類還活著，而良知已經死了嗎？

成千累萬自詡中國「公共知識份子」者，費盡心機想擠在達賴喇嘛的光環下獲得「知名度」的枯枝敗葉般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還有不識自由為何物的偽自由知識份子，也對藏人自焚抗暴運動諱莫如深，三緘其口。究其原因，根本在於這批人深知，每一個為理想和心靈自由而自焚的藏人，都是一面明澈的「天鏡」（編按：比喻監察天下的權力。語出《南齊書·高帝紀上》：「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

「天鏡」中會映出這批人的虛偽人格和屬於鼠類的怯懦。

由於自知醜陋而沉默還算得上是「高貴」，其中更有寡廉鮮恥者，竟試圖反客為主，掩飾其人格之醜——

他們做出「生命導師」的道貌岸然之態，要求自焚獻祭的藏人「珍惜生命」。

這些終生都以虛偽和謊言表述其人格的偽類，他們的生命只配在日益衰朽的醜陋肉體中逐漸腐爛；他們根本沒有精神能力去理解英雄和聖徒珍惜生命的方式。

自焚的藏人透過讓生命昇華為自由的祭品，昇華為燦爛的意義，來證明他們對生命的珍視；自焚的藏人承受烈焰焚身的苦痛，是在替人類守護一句刻在歷史之巔的生命誓言：「不自由，毋寧死。」

偽類們的行色只在論證墮落時代的墮落的現實——庸人俗物渺小的心中卻充滿屬於上帝的自信，鼠類則獲得嘲笑英雄和聖徒的自信。

最令藏人自焚獻祭者黯然神傷的，可能莫過於達蘭薩拉某些流亡藏人政客的態度。

在藏人爲爭取做自由人的權利而不斷點燃自己的過程中，這批大小政客卻在忙於一件事，即竭盡所能，在一切公開場合切割他們同藏人自焚抗暴運動的關係。

當然，實際上高貴的自焚獻祭者也不會同政客有任何關係。

「西藏在燃燒，世界在旁觀」。

而這些流亡藏人政客基於個人政治利害的精明計算，竭力向冷漠的世界，或許還有中共暴政，剖肝瀝膽，證明他們的「清白」；他們甚至喪失了讚頌自己族人中的英雄和聖者的勇氣，喪失了爲獻祭者吟詠一首安魂曲的道德良知和情感衝動。

我曾經久久凝視一張自焚者的遺照。

那是一位少女僧人，十七歲，名叫桑吉卓瑪。

遺照的背景黑暗而堅硬，酷似一面鐵壁；少女僧人的面容則像浮雕在鐵壁上的豐盈的滿月。眼睛是靈魂的棲息之所，少女僧人的眼睛流露出淡金色的光澤，似乎預言她的靈魂即將嫁給金色的烈焰；俊秀的唇角掛著一縷寧靜

安詳的微笑，那是得到天啓的真理祝福的心靈才會有的神情。她的頭顱微側，右手托著下巴，顯出幾許少女如花的妖嬈；右手手背間現出兩行藏文墨跡：「西藏，我獨立的祖國」。

那些字跡宛似鐵翅的蝴蝶，彷彿要趁風而起，飛向荒野間的花海。

在與少女僧人遺照的對視中，她的目光將一個金色燦然的囑託一直送到我心的深處；她希望我蘸著藏人的血海淚濤，在峻峭的藍天之上，為自焚獻祭者書寫墓誌銘，以抗議這個冷血的時代。

我向來認為，人，至少自由人，本質是文化的存在，精神的表述。所以，在族群認同上，我重視的不是生理特徵，而是心靈的風格。

有鑒於此，我把藏人自焚獻祭者引為我的族人——

我們屬於同一個種族，忠實於心靈和自由理想的種族。

我不能拒絕族人的遺囑，於是，我用這樣一句話來回答少女僧人：「我心疼，所以，我書寫自焚藏人的史詩與長歌——《燃燒的安魂曲》。」在說出這句話的同時，我便決意，也要撰寫另外一本書，即《殺佛》，把中共暴政謀殺十世班禪的罪惡告訴世界。

五十餘年前，藏人透過全民大起義，用英雄的搏殺，衛護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今日，藏人通過自焚抗暴運動宣示對自由的忠誠。

半個世紀以來，藏人走過了由英雄的搏戰到聖者的獻祭之路，那是一條伸展在血海屍山間的艱難之路。

中共暴政鐵幕的陰影下，頑石都會破碎，鐵塊都會腐爛，可是，西藏的自由之魂卻依然如山花野草般頑強地活著。

西藏的自由之魂沒有湮滅於中共暴政的鐵幕，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班禪大師復興佛教與西藏文化的努力，歸功於他在藏民族心靈中播種的復國的理想。

燃燒的西藏之魂在守望著人類對心靈和自由的最後忠誠；十世班禪大師則是西藏之魂的拯救者。所以，在班禪大師遭受謀殺的問題上，我不能繼續沉默下去；繼續沉默會讓我失大義於天下。

講出事實真相，也並不只是爲了給班禪大師伸冤，而更是爲了把藏人命運的苦難與悲愴，藏人抗爭暴政的慘烈與壯麗，還有藏人血淚豐饒的復國理

想，刻寫在深紅落日之上——

深紅的落日與自焚獻祭的金焰，都是關於燦爛凋殘的生命哲理。

註釋：

【註1】胡春華（一九六三年～），湖北五峰人。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主要執行人之一。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七九～一九八三年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大學畢業後入藏工作。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組織部幹部，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在西藏青年報社工作，一九八五～一九八七年任西藏飯店黨委委員、人事部副主任，黨委副書記、人事部经理。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期間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副書記。一九九二年任西藏自治區林芝地區行署副專員。一九九二～一九九五年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書記。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任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一九九七～二〇〇一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副主席。二〇〇一～二〇〇三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秘書長。二〇〇三～二〇〇五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區政府常務副主席。二〇〇五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區政府常務副主席。二〇〇五～二〇〇六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二〇〇六～二〇〇八年，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年任河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二〇〇〇

九〇二〇一〇年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現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註2】胡錦濤（一九四二年～），出生於江蘇省，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四代最高領導人。

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任青島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一九八五～一九八八年，任貴州省委書記，貴州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八八～一九九二年，出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一九八九年，要求獨立的藏人舉行示威遊行，發生「拉薩事件」，胡錦濤迅速宣佈戒嚴，用武力進行鎮壓。二〇〇二年～二〇一二年，胡錦濤任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二〇〇四年～二〇一二年，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二〇〇三～二〇一三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已退休。

【註3】十世班禪大師（一九三八年～一九八九年）

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法名羅桑赤列倫珠確吉堅贊，藏傳佛教格魯

派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出生於青海省循化縣。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坐床典禮後正式繼任，成為第十世班禪喇嘛。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西寧。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十世班禪任籌委會第一副主任委員。此後，十世班禪大師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一九六二年十世班禪大師撰寫了《七萬言書》，以「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為題，遞交給中共國務院。《七萬言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政策進行了嚴厲撻伐。十世班禪列舉大量事實，說明中共在平叛、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十分嚴重，並且強調：這些問題和錯誤若不認真加以糾正，藏人將面臨滅族滅教的嚴重危險。該報告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

一九六四年，十世班禪大師在一次萬餘藏人參與的傳召法會上提出西藏有權獨立並號召西藏獨立，宣告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真正的領袖，並祝達賴

喇嘛長壽。十世班禪大師當場遭到中共逮捕，後被中共指控為「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最大的反動農奴主之一」，並被剝奪一切職務。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十世班禪大師被囚禁在秦城監獄。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世班禪大師獲釋，但被軟禁於北京，直至一九八二年。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力主恢復十世班禪大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領導人職務。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班禪大師開始在西藏實施了一系列涉及藏族文化、宗教、語言、習俗的重建與改革，並為三百五十萬藏人摩頂祝福。十世班禪大師是西藏境內當代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和西藏復國運動的啓蒙者、推動者和精神領袖。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世班禪大師死於中共的政治謀殺；圓寂地點在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日，十世班禪大師的遺體被安放在黃金皮靈塔祀殿
釋頌南捷。

【註4】達蘭薩拉：一九五九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帶領八萬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離開被中共佔領的西藏，開始流亡。同年四月一日，達賴喇嘛抵達印度，在印度達蘭薩拉組織「西藏流亡政府」，達蘭薩拉也成為藏傳佛教和藏傳文化聖地。現在，在桑東仁波切主導下，「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已經被取消，改稱「流亡藏人的行政中央」。

【註5】溫家寶（一九四二年～），漢族，天津市人。一九六五年四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於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研究生學歷。

一九八五起，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任。一九八七～一九九二年，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記。二〇〇三～二〇一三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至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國務院總理、黨組書記。已退休。

溫家寶的夫人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珠寶商。

【註6】王力雄：中國作家。二〇〇九年訪問達蘭薩拉時，受到西藏流亡筆會楊科加、松秀吉、才讓嘉、那曲今巴等藏人詩人和作家當面抗議，抗議者指控王力雄是中共的文化特務，其訪問達蘭薩拉的目的在於破壞自由西藏運動。

第二章

西藏悲情

——佛國淪為「黑地方」

以帕米爾山結爲起點，喜馬拉雅、岡底斯、念青唐古拉、唐古拉、崑崙、祁連等一系列地球上最雄偉壯麗的山脈，乘萬里長風，騰躍而起，橫空出世，猶如驚濤駭浪，扇形展開，洶湧而去，直向東方，彷彿要向沐浴於太平洋中的朝日求愛。然而，這一系列激盪於雲海之上的冰峰雪嶺，其咆哮奔騰之勢，卻驟然被冥冥中的巨靈神斧斬斷，橫斷山脈便是巨靈神斧在大地上留下的傷痕。

這一片形如白蓮花瓣的大地——西迄帕米爾山結，東抵橫斷山脈，南以喜馬拉雅爲緣，北止於祁連山脈，便有了一個上蒼賜與的名字，西藏高原。

帕米爾山結是萬山之父，西藏高原便是萬河之母。

東亞大陸、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半島所有偉大的河流，都以西藏高原爲源頭。

正是從西藏高原流下的雪水河，孕育出東方文明——

黃河、長江之間，中華文化繁盛；恆河、印度河流域，古宗教文化豐饒；湄公河、紅河、伊洛瓦底江、薩爾溫江，使荒蠻的東南亞半島人文薈萃；從祁連雪峰湧下高原的一條條晶藍的激流，在大漠戈壁間，澆灌出古絲綢之

路的片片綠洲。

工業革命拉開人類現代史的序幕。透過工業革命，人類獲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能量。歷史背叛新教精神之後，「為上帝積累財富」的道德信念被資本主義拋棄，瘋狂追求物慾成為時代的魔鬼之魂。

於是，蘊涵著上帝才會有的不可思議的巨大物性能量的科學理性，異化為毀滅自然生態環境的魔鬼的詛咒；人類開始如同要從乾枯的頑石中榨出清泉一樣，渴望從物慾中榨取幸福感。

人類由於物慾的誘惑而背叛心靈，地球則如同鐵架上的烤乳豬，漸漸被熊熊的物性貪慾之火燒焦。在物性貪慾為價值之王的實用主義哲學主宰人類命運的背景下，西藏高原卻曾經是一片屬於心靈的聖土。

條條崛起於雲空之上的山脈構成西藏高原的骨架；萬千座雕刻在蒼穹間的冰峰雪嶺被落日或者朝霞點燃的時刻，宛似無數團金色的火焰踏著浩蕩的長風，向虛空中的永恆和無限，作獻祭之舞。

人類心靈之光黯淡，物性貪慾主宰時代風格，值此精神艱難困苦之際，西藏高原，那青銅色的長風和彩霞流雲的故鄉，成為生命神聖感最後的棲息

地，而藏人則是生命神聖感的最後守望者。

藏人是佛的選民。他們信奉佛關於寂滅的真理，也理解幸福不在物慾之中，而在心靈之間。

金錢是物性貪慾的圖騰，然而，有旅人曾經看到，西藏荒野間的牧人把花花綠綠的各國鈔票像畫一樣貼滿帳篷的內壁。當人類中的絕大多數都把金錢奉為萬神之王的時候，藏人卻把鈔票當作裝飾品——

這便是藏區牧人對待物慾的經典態度，因為，他們的心靈像荒野之風一樣自由。

時代在沸騰的物慾中腐爛，藏人卻在寂滅真理的感召下，虔誠地守護著一種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他們像高原上的野草岩石一樣自然，像青銅色的高原之風一樣自然。

上蒼似乎出於大慈悲之意，特別選擇藏人做這片神奇的土地的主人——藏人在守護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使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態環境免受物性貪慾的毀滅性的破壞；而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態的命運，與東亞大陸和南亞次大陸，這片人類數量最多地區的命運息息相關。

藏人超越物慾的生活方式，可以說是亞洲和世界的天賜之福。

世界上有許多被現代物慾主導的生活方式遺忘的地方，比如非洲——被遺忘，那是由於那些地方文化的荒涼與落後。

西藏高原遺世獨立，拒絕物慾生活的誘惑，則是由於文化的豐盈——藏人及其堅守的生活方式，意味著心靈的奇蹟。

然而，命運的邏輯在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葉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共產主義運動的血河滔滔漫過東亞大陸，也湧上西藏高原。

在鐵血強權的逼迫之下，達賴喇嘛不得不同共產主義運動在東亞的代理人，即中共強權簽訂了一項關於西藏「和平解放」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編按：一九五〇年十月，藏軍在「昌都戰役」中大敗於中共人民解放軍。一九五一年五月，西藏五人代表團在不知原因未向西藏政府報告的情況下於北京和中共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宣布不予承認）。

和平和解放都是很美好的詞彙，不過，在強權主導的歷史進程中，美好

的詞句常是偽善的謊言；爲了直視真相，往往必須越過美好的詞句編織的騙局。

所謂十七條協議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可以表述如左：

達賴喇嘛交出承續數千年的西藏的國格和法統，承認中共政權擁有對西藏的主權權威；以此爲前提，中共就答應給西藏以和平，並保證不改變西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的延續。

這紙協議爲中共統治西藏打開主權之門，也爲西藏的命運推開了通向地獄之門。因爲，對於中共而言，協議中要求西藏噶廈政府背棄西藏國格是真實的，而承諾不改變西藏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只是權宜之計。

以十七條協議爲起點，至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爲止，這個時期西藏通向地獄的命運之路，可以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五〇年代的滅佛狂潮；第二階段，大屠殺、大監禁；第三階段，大飢餓；第四階段，「文化大革命」對佛教的斬盡殺絕。

簽訂十七條協議數年內，中共完成在西藏高原全境的軍事、政治、經濟和統戰部署之後，就透過以消滅佛教爲主旨的「社會改造」運動，開始上演

摧殘西藏命運的第一幕悲劇。

滅佛，就是要摧毀藏人心靈的家園。

中共的迫害之劍首先指向佛教，究其原因，根本在於共產主義運動的精神目標在於，用鐵與血的力量將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哲學、政治學和歷史發展觀構成的理論，推上絕對真理的王座，進而以絕對真理的名義控制人類的靈魂——

控制了人類的靈魂，也就從最徹底的意義上征服了世界和歷史。

爲了實現這個精神目標，爲了索要對人類心靈的控制權，中共天性就仇恨文化多樣性，並把摧毀共產主義文化形態以外的其他文化，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作爲基本的政治原則。

由於藏人是佛的選民，藏人中的多數是佛教的虔誠信徒，所以，中共摧殘西藏文化的現代滅佛運動，即文化性的種族滅絕，從一開始就同生理性的種族滅絕重疊在一起。

這種心靈和生理雙重意義上的種族滅絕，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更加殘酷，因爲，對忠實於信仰的虔誠者而言，踐踏和侮辱他用心靈爲之獻祭的

信仰，比用利刃割開他的胸膛，剗出熱血淋漓的心更難以忍受。

當然，只能聽懂物慾召喚的時代中，除藏人之外，已經很少有人能理解這種屬於心靈的苦痛。

西藏高原之上，曾經有數千座寺廟的暮鼓晨鐘，敲擊出佛學真理的韻律。一座座寺廟的金頂在豔紫的晚霞輝映下，流光溢彩，宛如黃金鑄成的心靈的王冠。

就藏人的生活意境而言，寺廟首先意味著心靈追尋終極安慰的神聖之地，不過，寺廟也同時具有其他社會功能：

寺廟不僅是教育中心、文化中心、醫藥中心，也是一定意義上的娛樂中心。

數千座寺廟就像堅實巨大的龍骨，支撐起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的航船，在西藏高原的雲海上，駛向表述虛寂真理的生命意義。

中共暴政顯然完全理解寺廟對於藏人的重要意義，於是，大規模摧毀寺廟就成爲強權實施西藏文化滅絕政策踏出的最初步伐，成爲現代滅佛運動的

國家恐怖主義的先聲。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期，兩年之內，西藏高原上的數千座金頂的寺廟，那藏人心靈的王冠和魂歸之所，在灼傷藍天的紅焰中，化爲騰空而起的滾滾黑煙；千年之前的滅佛期僧人用生命保存下來的古老經書，或者隨烈焰焚毀，或者被扔進糞池，腐化成肥料；各種象徵神秘的精神意境的法器被砸碎，而藏民族千年的虔誠奉獻蓄積在寺廟中的珍寶，遭受到國家搶掠，一夕之間所有權便歸於中共暴政。

只有三十餘所寺廟倖免於難。因爲，中共要保留少數寺廟，作收買統戰藏人貴族之用；當然，也是爲了向世界證明，中共並沒有徹底毀滅宗教——宗教還像文化化石一樣得到了保護。

寺廟是佛的精神的居所，僧人是佛教三寶之一。

佛法有兩種：一種寫在紙上，叫作經書；一種寫在心上，稱爲僧人。

寺廟遭受大規模摧毀之際，惡運也像猩紅的血雨，降臨在僧人的命運上。暴政強迫僧人還俗，在半集中營式的合作社裡從事勞動。

逼迫僧人從精神領域回到世俗領域，被中共視爲一種歷史的進步，據說這樣做「解放了物質生產力」。

作爲粗俗不堪的形而下的唯物主義信徒，中共顯然根本沒有理解這樣一種真理的能力：

在物性形式上極其渺小的人類，之所以可以驕傲地自詡爲宇宙的精神之花，獲得獨立於並超越物性邏輯的文化命運，全在於人本質上是心靈的存在；以摧毀精神追求爲代價所換來的物質生產力的解放，根本上意味著人的退化——

由心靈的存在，退回到物性的永恆黑暗深處，就像一片滲入黑戈壁灘的晚霞。

在許多地方，對僧人的逼迫表現出殘酷的心靈侮辱的風格。

當局指令男女僧人結婚：中共要僧人透過這種違背佛誠的行爲，侮辱佛法，以證明他們同過去的心靈生活徹底決裂——

每個僧人都是佛教文化的生命載體，只有讓僧人在心靈的意義上自己侮辱了佛法，中共的文化性種族滅絕的理想才能最終實現。

大批不肯在逼迫下結婚的男女僧人則被關進勞改營，做無限期的苦役犯，而大多數苦役犯的生命，就像流沙上的足跡，很快就被命運之風冷血地抹去。

當年一個粗俗的中共低級軍官的一句話，經典地暴露出暴政的凶殘、下流與醜陋。他說：「讓這些『野犛牛』交配，他們就不再念佛了。不肯交配的，一定是還在心裡念佛，那就要把他們關到死；毛主席教導我們，『敵人投降，就叫他滅亡』。」

——這個低級軍官所說的「野犛牛」，是指藏族僧人，他想要以此侮辱藏人。我把他的這句髒話記入歷史，是爲了給將來審判中共暴政的反人類罪行，提供一個證據。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葉，西藏文化命運遭受到「共產主義幽靈」的最初的惡咒。

雪域高原之上，佛法蒙難，佛教塗炭，一座座曾經金碧輝煌的寺廟化作廢墟。只有不知悲愁爲何物的金色流霞和紫色的晚風，還依舊依偎在佛塔雪

白的殘骸旁，縈繞在坍塌的聖殿間。

歷史用一個冷峻的問題，把藏民族的命運推進死角：

是讓綿延萬年的藏文化和佛的真理，以及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黯然神傷地湮滅在共產暴政的鐵幕陰影之下，還是奮起抗爭，用紅血和白骨表述對祖先榮耀的忠誠？

或許由於祖先的血液裡有長刀和狂風的神韻，有創造英雄史詩的夢想，藏人悲壯地選擇了反抗——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作為時間象徵，雪域高原全境，爆發了反抗暴政文化性種族滅絕的全民大起義。

選擇反抗之所以悲壯，是因為當時藏人包括老弱婦孺在內只有三百萬，而中共暴政僅軍隊就有五百萬蛇蠍虎狼之師。

在蒼白、冷血的理性主義者眼中，或者在以物性生存為真理的庸人俗物看來，藏人決意反抗乃是自取敗亡的非理性的愚蠢之舉。然而，正是這次全民大起義，使「自由西藏運動」進入歷史，成為國際社會不可忽視的現實存在。

這個事實論證了一個哲理：

在人類歷史所處的現象世界裡，表述即存在，沒有表述，或者不敢表述，就意味著不存在；藏人敢於以浴血的全民大起義表述自己的意志，所以，直到今日，藏文化和藏傳佛教依然堅硬地存在著，悲壯地存在著。

作為自由人的榮耀就在一九五九年藏民族大起義的刀鋒上燦爛閃耀；藏人湧流的血燒焦了高原的白雪，燒紅了深黑的頑石，但是，卻不能熔化屬於一個時代的對英雄史詩的冷漠。

冷漠來自於一句精神時尚的箴言，時尚得甚至比兩年前低腰的露臀溝褲和現在的爆乳裝還流行。

西方的綏靖主義政客、靠中共施捨為生的「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以及中國的偽類——偽自由知識份子、偽民運人士、偽基督徒——共同製造出這句箴言，並使它成爲一種精神時尚。

它的內容如是表述：「和平、理性、非暴力」。

正是以這句箴言爲價值依據，「自由西藏運動」才逐漸凋殘了當年藏人

大起義的英雄史詩之美，才喪失了向中共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亮劍的血性和勇氣。

我厭惡「和平、理性、非暴力」這句像西裝革履的中國暴發戶一樣附庸風雅、道貌岸然的箴言。因為，我厭惡偽善；因為，我厭惡欺騙。

首先，「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對被壓迫者提出的要求。

在中共暴政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極致以維護專制政權的時刻，在中共暴政運用黑手黨政治全面壓抑社會的情況下，在手無寸鐵的被壓迫者面對由千萬軍警、千萬貪官污吏和十萬鐵牢構成的中共國家暴力的前提下，上述向被壓迫者提出的要求，不僅偽善，而且荒謬。更何況，這個由西方的政客、文人和中國的偽自由知識份子提出的要求，即便按照西方的歷史邏輯，也是一個明顯的騙局。

對西方的近代史作縱橫觀，從撕裂中世紀黑暗的尼德蘭革命，到法國大革命，再到美國獨立戰爭，這些推動時代命運之輪的壯麗事件，都在書寫同一個真理：

民主需要用起義者的血相貿易；自由是被壓迫者用刀劍才能向專制者索取到的戰利品。如果沒有一次又一次點燃歷史的血與火的搏戰，歐洲和北美大陸可能直到今天都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徘徊；如果當年被摧殘的新教信徒，被剝奪的「第三等級」，被奴役的北美大陸，都只會在鐵血強權之前像被打怕了的狗一樣，發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叫痛聲，那麼，直到今天自由和民主可能都還是遙遠的夢。

事實上，被壓迫者反抗的激烈程度並不是由被壓迫者所決定，而是由強權者決定。

強權者對追求自由人們的鎮壓越嚴酷，反抗便越激烈；強權者把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暴力發揮到極致，人民的反抗也必定具有血與火的風格。

西方是透過浴血的搏戰，才給時代戴上自由民主的桂冠，才給自己贏得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但是，西方的現代精神時尚卻要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騙局，阻止東亞大陸的自由進程。他們爲什麼如此虛偽；他們爲什麼不願東方得到自由的拯救？

——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而應當由西方的政客、文人和中國的偽自由

主義知識份子來回答。

一九五九年的藏人全民大起義，是迄今為止東亞大陸上最爲慘烈悲壯的反抗暴政的現代英雄史詩。藏人運用來自天啓的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告訴歷史，藏人不僅是佛的選民，更是英雄的選民和驕傲的自由人。

中共鐵血強權調動幾十萬大軍——

這些士兵血紅的眼睛裡閃爍著階級仇恨的毒焰之光，把起義的藏民族淹沒在滔滔血海中。

這次大屠殺證明，中共暴政爲實現文化性種族滅絕的目的，可以毫不猶豫地大規模殘害生命，實施生理性的種族滅絕。

不過，即使在殘酷屠戮生命的過程中，中共暴政也沒有喪失其摧殘人類心靈的天性——

它要從精神領域中摧毀藏民族的獨立的存在。

中共軍隊對起義者集體屠殺之後，竟逼迫他們的親友在掩埋受害者的「萬人坑」之上歡歌起舞，慶賀暴政的勝利。那些被迫在自己男人的屍體上起

舞的女人，那些被迫在父兄殘骸上歡歌的少年，那些被迫踐踏兒子英魂的父母，他們在做過這件事之後，很快就衰老了，變成枯枝敗葉，行屍走肉；他們的肉體還苟延殘喘，他們的靈魂已經被暴政殺死。

大屠殺之後，繼之以大逮捕。

由於被囚禁的人數激增，一個狹小的牢房往往要關押幾十個人；大批起義者像枯黃的落葉，凋殘在地獄般的囚禁中。活著的人也被超強度的苦役折磨得奄奄一息。

據當時給藏區勞改營運送物資的司機講，來到勞改營猶如進入鬼域，看到的是一隊隊乾瘦得近乎骷髏的活鬼，拖著鐵鏈蹣跚而行。

大屠殺和大逮捕之後，藏區的許多村莊裡只剩下悲傷的婦女、恐懼的兒童和衰朽的老人，青壯年或者變成荒野中布滿彈痕刀傷的白骨，或者變成勞改營中的冤魂和活屍，也有少部分隨達賴喇嘛離開浴血的高原，走上苦難如山的流亡之路。

眾多中國的偽自由知識份子喜歡作沉痛之態，談論紅色高棉屠殺三分之

一柬埔寨人的暴行，以證明他們對人權的關切。但是，在藏人遭受大屠殺、大逮捕的問題上，這些偽類總是怕觸怒中共暴政而三緘其口。

眾多消息來源表明，一九五九年大屠殺和其後的大逮捕過程中，逾百萬藏人失去了生命；死難者超過當時藏民族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暴政荼毒之下，英勇的靈魂被戕殺殆盡，藏人變成一個沒有青壯年的悲涼族群，藏人命運的血河似乎要在暴政鐵幕陰影中乾涸。

一九五九年的大屠殺和隨後的大逮捕，構成西藏地獄悲情的第二階段。然而，苦難並沒有到此為止。過去的悲劇還沒有落幕，新的悲劇就已經上演。那便是西藏通向地獄之路的第三階段，大飢餓。令東亞大陸餓殍遍野、伏屍萬里的大飢餓，是中共暴政逆天而行的結果。

中共權貴建政之後不久，便以「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開始在整個東亞大陸實施財富的大搶劫。

中共憑藉強權將全部資本和土地收歸國家或者集體所有——
「集體所有」不過是國家所有的另一種表述。

由於國家歸中共一黨獨裁專政，所以，國家所有權只是披在中共權貴所有權上的一件法律外衣；透過這次國家搶劫，中共權貴實際成爲中國唯一的資本家和大地主，東亞大陸上其他所有的人則淪爲中共權貴統治下的無產者，窮光蛋。

爲在農村和牧區實施國家搶劫，中共使用的主要政治工具，叫作「人民公社」，在藏區也是如此。中共逼迫藏人交出土地、牧場、牲畜和其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並加入到「人民公社」中。

黑格爾【註1】根據其法哲學理念告訴人們，所有權就是自由。

失去了所有權的藏人實際成爲中共管制的政治組織，即「人民公社」中的會說話的工具；千萬年以來，像高原上的風一樣自由自在的藏人，因此淪爲暴政的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奴隸，而「人民公社」則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集中營。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葉之後，爲給共產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戰略構建築物基礎，毛澤東【註2】發動「大躍進」運動，試圖迅速建成重工業和軍事工業體系，並把國家能量聚焦於發展核彈和運載導彈，以及核潛艇。

共產暴君毛澤東一聲令下，千萬狗官酷吏聞風而動，在東亞大陸萬里河山間，實施竭澤而漁的橫徵暴斂；暴政要從已經被人民公社剝奪了土地和財富所有權的數億農民和牧人生命中，榨取苦役犯般的勞動能量，供毛澤東實現其政治野心。

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瘋狂！

千萬狗官酷吏爲討暴君歡心，置萬民生死於不顧；強搶豪奪之下，農村斷糧，牧區無畜，慘絕人寰的大飢餓由此爆發。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間，近四千萬人飢餓而死，約占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八，東亞大陸由此淪爲鬼域。藏區飢餓而死者則接近一半，遠超過所有餓死人口的平均數，而其原因竟是藏人更具有人性。

一九五九年，由於大屠殺之後大飢餓又接踵而至，西藏高原荒野間的屍體像羸露的岩石一樣多。

饕餮人屍之後，野鼠長得體壯如貓，夜裡發出的嘶叫，像是厲鬼哭嚎；野狗的眼睛彷彿要湧出血來，而鷲鷹由於過分肥胖，不得不奔跑幾十米，才能振翼起飛。當時，中共的官員和軍警處於食物鏈的頂端，他們有武器，可

以獵殺因食人屍而肥碩的野狗和鷲鷹充作食物；藏區的漢人移民在飢餓逼迫下則把野鼠都吃光了。

從一九六〇年起，野鼠絕跡，野狗無蹤，藍天也由於看不到鷲鷹翱翔的身影而荒涼，藏區的漢族間開始普遍出現吃人屍的現象，甚至為爭搶屍體而白刃相向的事件也多有發生。

大飢餓之火燃遍西藏高原，安多和甘肅、四川的藏區漢人移民為活下去，竟然敗壞人倫，換妻易子而食，形同禽獸惡鬼。

吃過人肉之後，生命還繼續存在，心卻已經死了。

一位靠吃人肉才免於餓死的農夫曾對我說：「吃了死人的肉，心就變得又冷又硬，像個鐵砣；後來把老婆跟別人換過，吃了新鮮人肉，日頭【註3】都變成黑的，心也像黑日頭，燒得胸膛疼，像把肋巴骨都燒裂了。」

農夫的話猶如地獄之風，數十年來一直縈繞在我心間；當我置身於擁擠的中國人群中，常會猝然感到一陣不寒而慄的驚悚。一個血腥的問題會迸濺在我的眼球上：

「大飢餓中四千萬人死於非命，那麼，又有多少人是靠吃人肉活下來的

？現在的中國人又有多少是繼承了食人屍者的基因？在沒有對那段歷史作出歷史性反省之前，食人屍的基因會對這個民族的人格產生怎樣陰沉可怖的影響？」

漢人最先被中共用粗俗、骯髒的唯物主義哲學徹底洗腦。洗腦之後，漢人接受了一個觀念：生命本質上不過是一塊物質。而爲了活下去，任何可吃的物質都可以用來充當食品。

中國歷史上也有人相食的事件，也有與這些事件相關的哲學原因，但是，現代中國的人吃人現象的哲學基礎，就在於中共信奉的唯物主義。源自西方文化傳統的唯物主義對於生命毫無敬畏之心，正如毛澤東所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才會出現敢於衝破人性的底線，用吃人肉維持存在的現象。

即使在大飢餓的毒焰焚燒之下，藏人仍然堅守人性的原則。

基於來自天啓的生命潔癖，藏人拒絕吃食人屍的野鼠和野狗，更不會吃他們視爲神聖者的鷲鷹；當然，基於對生命的敬畏，藏人絕對不會爲了活下

去吃人肉——

在忠實於心靈的藏人的信念中，還有比活下去更神聖的東西。藏人爲堅守人性的原則付出慘重的代價，即大飢餓中藏人死去的比例遠遠高於漢人。

命運的邏輯就是如此不公正，堅守高尚生命原則的人，比卑鄙者更少生存的機會。

大飢餓過後，藏人的命運已經如風中殘燭，搖搖欲滅。然而，從毛澤東陰森勝過鬼域的心中湧現出的詛咒，卻要再一次摧殘西藏的命運；這次詛咒是以「文化大革命」的稱謂著稱於世。

無論「文化大革命」在東亞大陸其他地區意味著什麼，它在西藏高原上肆虐的主題十分明確——以「新文化」，即共產黨文化的名義，對已經變成殘垣斷壁的西藏文化，進行斬盡殺絕式的掃蕩，以徹底實現對西藏文化的種族滅絕。

共產黨文化經典的理論風格之一，便在於以階級鬥爭作爲歷史發展的動力，從而使階級仇恨獲得與歷史發展趨勢一致的神聖性。

神聖化的仇恨則是任意發洩獸性的正當理由；凡是仇恨被神聖化的時空，必定出現殘酷至極的歷史進程。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階級仇恨的神聖性發揮到極致，因此也召喚出漫天的血雨腥風。

「文化大革命」摧殘的鋒芒仍然首先指向藏傳佛教。

作為西藏佛教聖殿的大昭寺，那凝聚了千年精神財富的心靈之源，慘遭荼毒，頃刻之間便變成一片廢墟；毛澤東的「紅衛兵」逼迫男女僧人在大昭寺前的廣場上公開性交，以表述強權對佛的精神的勝利。大昭寺的悲劇象徵佛教之國的精神滅絕。

「文化大革命」摧殘的鋒芒同時指向藏民族的英雄人格傳統，中共要把藏人變成沒有自己的英雄的族群——

一個族群喪失了屬於自己的英雄人格，也就喪失了獨立的命運。

曾經有眾多吟遊詩人，追隨青銅色的高原之風，走遍藏區，吟唱格薩爾王的英雄史詩（編按：格薩爾王（一〇三八年—一一一九年），在西藏傳說中是蓮華生大師的化身，一生宏揚佛法，降妖伏魔，統一了大小一百五十多個部落，是藏人引以為豪的曠世英雄。民間傳唱的《格薩爾王傳》是歷史上最長的史詩（六十萬行）

，也是世界上目前尚被傳唱的最後一部史詩，流傳於西藏和中亞已有一千多年，內容述說嶺國（位於西藏東部長江和雅魯江之間）國王格薩爾的故事，歌頌他降魔驅害造福藏人的光輝業績。「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吟遊詩人或者同《格薩爾王》的唱本一起被投入火中焚毀，或者在石頭和鐵棍的敲擊下頭破骨裂而死，或者被投入勞改營，成爲人間地獄中的活鬼。

中共試圖斬斷藏人的現實和其歷史命運的全部聯繫，他們不僅要摧毀藏人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甚至要規範藏人對死亡的態度。

中共指斥天葬習俗是「迷信」。爲禁絕天葬，中共採取釜底抽薪之策，大批射殺和鳩殺鷲鷹，然後，強令藏人死後土葬。

對於藏人，死後埋進黑暗的土裡慢慢腐爛，意味著永遠不能超生的地獄之痛。

這次對藏區大迫害的精神之源，毫無疑問在於中共的政治意志，因爲，「文化大革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起的。

不過，就藏民族的命運而言，最慘痛之處則在於，許多藏人直接參與實

施上述摧殘藏民族心靈家園和滅絕藏文化存在的暴行。他們爲什麼會瘋狂地踐踏自己文化的祖國，精神的故鄉？因爲中共已經透過「洗腦」，剝出了他們的藏人的靈魂，給他們換上了一顆共產黨文化的魔鬼之心；他們生理上還與藏人毫無二致，但在精神的意義上，他們已經背叛了藏民族的文化之魂。

——他們不再是藏人，而應當叫作共產黨人。

一九六七年，中共對西藏實行軍事管制，西藏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時期。

一九六七到一九六九年間，西藏高原上仍然發生過幾起藏人起義的反抗事件，但是，反抗的藏人全部被軍隊當場殘殺；有的起義者的屍體甚至被彈雨撕成碎塊，可見鎮壓之慘無人道，血腥殘酷。

五〇年代初的滅佛運動，五十年代末的大屠殺、大逮捕，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大飢餓，「文化大革命」的大迫害——

經過這四次摧殘，藏人中最勇敢、最聰慧、最高貴、最自由的生命幾乎全部凋謝。西藏高原變得荒涼了，變成一片死寂。佛國在文化的意義已經滅絕，達賴喇嘛領導的流亡藏人運動，只是遙遠天際的一抹殘霞，西藏高原上

則覆蓋著布滿血鏽的極權鐵幕。藏人作為一種美麗而神秘的文化存在，似乎將被暴政的鐵手湮滅在歷史的黑暗深處。

心靈之燈熄滅，萬古長如夜；曾經心靈豐饒的雪域，在禮佛的金燈被鐵血強權撲滅之後，變成精神乾枯的「黑地方」。

不過，在荒涼的黑暗之中，西藏高原依然祈盼著英雄和聖者的拯救。

註釋：

【註1】黑格爾：格奧爾格·威廉·弗理德理希·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一七七〇年八月～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德國著名哲學家。代表作品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全書》、《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歷史哲學》和《美學》等。

【註2】毛澤東(一八九三年～一九七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臭名昭著的中共專制獨裁者。在他的專制統治下，中國文化、中國知識份子、中國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毀滅性破壞。

【註3】日頭：北方漢語太陽的意思。

第三章

班禪佛是聖者與英雄

——他用金剛寶杵敲開地獄之門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第十世班禪大師，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宗教領袖，同時也是當代藏人的精神導師。

他們對於西藏之所以具有不可取代的意義，主要不是取決於「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這兩個稱號的歷史地位，而是因為他們關切藏人的現實苦難——

用靈魂和生命來關注；他們的命運之路與藏人的苦難一起，在歷史的鋒刃上行進。

半個世紀前，達賴喇嘛引領八萬藏人，翻越鷹也飛不過的喜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開創了自由西藏運動。

這條艱難困苦而又勇敢高貴的命運之路，既是走出中共暴政的政治法律鐵牢的自由之路，也是回歸心靈的神聖之路；踏過流亡的重重苦難，達賴喇嘛和追隨他的藏人，雖然訣別了西藏，卻又使藏傳佛教，那大多數藏人心靈的歸依，走向世界，走向自由。

達賴喇嘛可稱為當代的摩西，無論對於藏人、漢人、或者全人類，都是如此。因為，中共暴政不僅奴役藏人，而且奴役中國人，同時，也以極權主

義的全球擴張，威脅人類的自由命運——

中共暴政是當代世界的萬惡之源。

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失去了祖國，可是卻得到了心靈的自由；不過，祖國和絕大多數族人還在暴政鐵鏈的束縛下，屬於西藏流亡者的自由，也必定與精神的苦痛如影隨形。

十世班禪大師作出另一種悲愴而壯麗的命運選擇：

當雪域蒙受千古未有之大劫難的時刻，他選擇與族人一起承受沐浴在血海淚濤中的地獄之苦，不棄不離，同生共死。

中共鐵血強權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班禪大師也把佛的大慈悲情懷發揮到極致。他誓願留在地獄之中，用菩薩之心，為消弭眾生苦難而與強權抗爭。

正是因為班禪大師與西藏高原一起，在焚心裂骨的苦痛中堅守對心靈的忠誠；正是因為班禪大師與祖國和族人一起，在國破教滅的劫難中，守護對自由和復國的信念，他才最終得到歷史的祝福，成為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西藏文化復興、西藏佛教復興的精神導師和實際推動者。

十世班禪大師是當代藏人的聖者與格薩爾王式的英雄。

他的成聖之路，起步於他用佛的大悲和英雄的膽魄鑄成金剛寶杵，爲自己敲開地獄之門——

當雪域高原陷入人間地獄時，他要和自己的祖國與族人共同面對命運的詛咒。

西藏高原的五月本應當是春花爛漫，如霞似錦的季節；可是，一九六二年五月，雪域高原上卻是陰雲壓頂，悲風漫漫，死氣沉沉，生機黯然。

經過大屠殺、大逮捕、繼之以三年大飢餓之後，藏人中的青壯年除了流亡海之外，絕大部分或者陳屍荒野化爲白骨，或者戴著鐵鐐，行進在苦役犯的命運之路上，剩下的老弱婦孺也隨荒涼的風一起，被囚禁在人類歷史上最的集中營，即人民公社之內。

更可悲之處在於，藏人心中禮佛的金燈似乎已經熄滅，西藏高原文化命運魂飛魄散。

暴政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高歌凱旋，聖潔的雪域佛國的歷史身影逐漸

朦朧，彷彿要永遠湮滅於時間的虛無之中。

就在這西藏高原的命運艱難之際，十世班禪大師寫出《七萬言書》【註1】，並交給中共。

這是一本用藏人的血和佛的淚寫成的藏人大悲苦之書。

《七萬言書》中記述了中共在滅佛運動、大屠殺、大逮捕、大飢餓過程中犯下的人性泯滅、魔性如熾、獸性瘋狂的反人類罪行，也記述了藏人經受的地獄之苦。

班禪大師引述了一句普通藏人的悲愴之語——這句話能令鐵石之人落淚——「雪域被搞成黑地方了，我們死了就像死了狗一樣。」班禪大師自己也以浩蕩的悲歎，發出悲情萬古的祝禱：「勿使衆生飢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爲祝爲禱！」

《七萬言書》是藏傳佛教的生死之書，也是藏人命運的生死書。

《七萬言書》就是班禪大師的心——

他血淋淋地剝出自己的佛心，作爲祭品獻給藏人的苦難，獻給人類的歷史。

我承認，用胸膛撞擊暴政的刺刀，用胸中熾烈的血將刺刀燒紅，那意味著英雄；我承認，走上喜馬拉雅的通天之路，與暴政決裂，作萬里流亡，也意味著英雄。但是，在磨牙吮血的鬼魅重圍之間，依然敢為拯救蒼生之苦，向魔鬼之王挑戰，才稱得上英雄中的王者。

十世班禪大師就是壯麗的英雄之王。

他用《七萬言書》這柄金鋼寶杵敲擊暴政的地獄之門；在佛教凋殘，蒼生塗炭，心靈死寂如墓地的黑暗時刻，金鋼寶杵撞擊地獄之門的聲響，如天雷掠空，巨濤經地；撼天動地的同時，也強烈震撼了暴政。

歷史沒有料到，十世班禪大師有勇氣孤身一人，向刀劍如林的暴政挑戰，而且挑戰的鋒芒如此銳利，直指中共的咽喉。

談到中共造成的大飢餓歷史慘劇時，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入史的！」

劉少奇此言，膽戰心驚之態畢露，展示出一種屬於專制者的深刻的內心

恐懼——

他們害怕自己天良泯滅的反人類罪被歷史記住。

正是基於這種恐懼，中共的魔鬼天性之一，便是透過新聞和出版控制，扼殺真相，將專制者的罪惡和受害者的苦難一起裝進鐵棺，投入時間的深淵，然後，再製造華彩繽紛的謊言，用來填充被抹去的歷史。

班禪大師的《七萬言書》，猶如巨靈神斧，劈裂極權專制的謊言的鐵棺，讓暴政的罪惡呈現在歷史的聚焦點上。

《七萬言書》，那是佛對惡魔滔天之罪的控訴狀。

《七萬言書》對於藏人更具有關係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意義。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歷史，也就失去了未來；失去了苦難史，則失去了存在的尊嚴和價值——

凡是還能頑強記住苦難歷史的族群，他的生存意志就仍然沒有崩潰。

十世班禪就是透過《七萬言書》，以西藏之佛的名義，代表藏民族記住了血海淚濤中沉浮的地獄之苦。

中共原本以為，雪域佛國已經湮滅在鐵幕之下，藏人作為一種獨立的精神存在也已經從歷史中抹去，西藏高原則從精神到政治經濟的意義上，都成

爲他們的戰利品。

《七萬言書》橫空出世，使中共意識到自己判斷失誤。

西藏高原之魂仍然在對苦難的記憶中活著，頑強得像燎原大火過後的野草——

他的根就翠綠在厚厚的死灰之下。

由於領悟並告訴世界關於寂滅的真理，釋迦牟尼佛被稱爲「大雄」，即壯麗的雄性。

十世班禪大師佇立在千萬座寺廟的廢墟間，佇立在藏人如山的殘骸白骨之上，向歷史交出《七萬言書》那一刻，他也堪稱大雄——

壯麗的英雄。

在撰寫《七萬言書》的過程中，班禪大師周圍的人幾乎無一例外，都勸他不要做這件定將給他帶來不測之災的事；他的經師甚至跪求他不要捋鐵血暴政之虎鬚。但是，在中共荼毒之下，藏人淪爲青壯年凋殘殆盡的夕陽族群之時，在藏人的命運如秋風中的枯葉漫天飄落的生死存亡之際，向蒼天和大地發出「勿使佛教滅亡；勿使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音，乃是佛的天職。

十世班禪大師履行了佛的天職，也使自己站在地獄的門口；歷史陪伴班禪大師，一起呼吸到了從地獄裡湧出的濃烈的血腥氣。

《七萬言書》揭示的反人類重罪令暴政恐懼，但是，極權專制者的恐懼總是會立即轉化成魔鬼的憤怒和切齒的仇恨。

中共領袖毛澤東把《七萬言書》稱爲「無產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按照中共的政治詞典，「無產階級的敵人」乃是不可饒恕者的代名詞，而毛澤東此言無異於已經將班禪大師推上了斷頭臺。

交出《七萬言書》不久，班禪大師就感受到種種山崩地裂般的政治壓力，不過，在將近兩年時間內，他只受到軟禁。中共似乎並不急於把他投入地獄。

中共這樣做，並不意味著仁慈。

作爲政治陰謀大師，中共領袖毛澤東很清楚，對於中共用豪華謊言爲自己建立的政治神壇，《七萬言書》是一種致命的威脅，而且，將來極有可能成爲對中共進行末日審判，把中共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控訴書。

毛澤東更清楚，中共有能力長時間把《七萬言書》傳達的訊息囚禁在專制鐵幕中，卻沒有能力殺死這些訊息；只有迫使班禪大師自己否定自己，才可能徹底抹去《七萬言書》留在歷史中的印記，否則這些歷史印記所表述的中共惡魔之罪，即使在毛澤東死後百年，也要承受道德上的掘墓鞭屍之罰。

基於上述考慮，一九六四年之前，中共不斷對班禪大師施加如火如荼的政治威脅、思想壓力，試圖使他屈服。中共的精神摧殘可熔鐵燬石，班禪大師的佛心卻堅逾鐵石，熊熊毒焰中，毫無軟化之態。

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共當局決定在拉薩舉辦一次萬人宗教祈福大會；會前，中共共產帝國「駐藏大臣」張國華，責令十世班禪大師「必須批判第十世達賴喇嘛」。

中共的理論「聖經」馬克思主義，將宗教鄙視為「人民的精神鴉片」，既然如此，中共當局為什麼又要實際主持舉辦宗教大會？其政治陰謀的蛇蠍之心可揭示如左：

迫使班禪大師在萬眾矚目的宗教大會上公開批判達賴喇嘛，既能夠產生以藏傳佛教的會議的名義否定達賴喇嘛的效應，又可以利用教派矛盾，造成

藏人最具權威的兩位精神領袖互相否定的態勢。

而無論以宗教大會的名義否定達賴喇嘛，還是班禪大師與達賴喇嘛兩位宗教精神領袖的互相否定，都意味著藏傳佛教的自我否定——

狡詐萬端、老謀深算的中共政客自然明白，自我否定才是最深刻、最徹底的否定；只有藏傳佛教的自我否定，才能根本摧毀藏人以心靈作祭壇的信仰。

當然，中共也試圖透過迫使班禪大師首先批判達賴喇嘛，然後再否定他自己的《七萬言書》。

中共深諳人性弱點，熟知人往往是一步接一步走向墮落的深淵。

中共「駐藏大臣」張國華責令班禪大師必須批判達賴喇嘛的同時，還表示這是中共當局給班禪大師最後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

顯而易見，這是暴政對十世班禪發出的「哀的美敦書」（編按：Ultimat-um，今譯為「最後通牒」），即要班禪大師自己作出選擇：或者留在人間，或者進入地獄——

留在人間便與恥辱同在，卻也可以同時享受中共賜與的錦衣玉食，高車

駟馬；進入地獄，歷史會記住佛的榮耀，但是，佛的榮耀要用無盡的劫難與苦痛相貿易。

十世班禪大師作出了佛的選擇。

一九六四年二月，西藏高原上陽光如金焰燦爛，天空似藍玉晶瑩；萬人傳召法會在露天廣場上舉行。班禪大師站於高臺之上，周圍軍警如群狼環伺，臺下藏人萬眾翹首。

當其時也，班禪大師作雄獅之吼，向蒼天和大地宣示：

西藏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達賴喇嘛是西藏的國王；現在，西藏人民有復國的權利，西藏必將恢復獨立。

當其時也，班禪大師的秘書不知是由於擔憂班禪大師為自己招來地獄之災，還是試圖擺脫與班禪大師共謀的嫌疑，向暴政顯示「忠心」，情急之下，竟伸出手去，想要摀住班禪大師的嘴。班禪大師本就身形偉岸，此刻更奮金剛之威，一掌擊開秘書之螳臂，更發出洪鐘大呂之音，為達賴喇嘛祈長壽之福。

如果說交出《七萬言書》意味著班禪大師用金鋼寶杵爲自己敲開地獄之門，那麼，在這次宗教大會上的作爲，就等於班禪大師湧身躍入地獄。

班禪大師站在地獄的門口，向自己的族人發出西藏復國的召喚。

在這個歷史必將記住的時刻，班禪大師並非只是說出一種信念，或者情感的趨向，而是以佛的名義，說出了藏人用心靈的苦痛和現實的劫難換來的教訓——

失去祖國，就意味著失去一切；把國門的金鑰交給中共，就等於讓魔鬼的鐵手扼住了藏人命運的咽喉；把決定自己政治命運的權利交給中共，換來的不是和平，而是亡教滅族之災；中共的政治法律框架之內，只有奴役，沒有自由，因此，西藏復國是藏人免於滅族之禍的唯一之路，也是藏傳佛教在雪域高原復興的唯一之路。

西藏復國的召喚，是一輪沐浴在藏人滔滔血河中的太陽，也是班禪大師湧身躍入地獄之前，以必死的決心留給藏人的遺囑——

佛意慈悲，以雪域蒼生爲念；佛心無畏，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佛情無私，唯願佛法復興，禮佛的金燈重新照亮眾生心靈。

然而，今日流亡海外的某些藏人政客，生活在自由世界裡無任何安全之虞，卻不敢替自焚的藏人聖徒與英雄說出心靈之痛，不敢控訴中共暴政文化性種族滅絕之罪惡，背棄班禪大師在刀鋒上留下的西藏復國的遺囑，一心只思討得中共之賜，能夠重回中共的「憲法框架之內」，也同時把自由西藏運動引入中共「憲法框架」的專制鐵牢。

事實上，一百二十餘位自焚藏人，已經用烈焰焚身焦骨的極致之痛苦再次告訴世界：中共專制惡法的框架內，只有奴役，沒有自由；自由西藏運動如果回到中共法律鐵牢之中，只能淪為政治囚徒。

對於十世班禪大師復國遺囑的背棄，就是對藏人逾半個世紀以來的無盡苦難的背叛。

班禪大師佛魂不滅，得知這種藏人自焚的金焰也不能使之焚毀的背叛，定當在地獄之苦中，作徹夜長哭。

班禪發出復國召喚，無異於將自己的「命運之風」（編按：「命運之風」，美國詩人 Ella Wheeler Wilcox 威爾科克斯（一八五〇年～一九一九年）作品《The

winds of fate》，她的詩有許多令人振奮的語言及促進積極的思維，「新思維運動」倡導者）掛在暴政浴血的刺刀尖上，就像掛上一條金色的經幡。

在復國的召喚中，他把達賴喇嘛稱爲西藏國王，並以祈願達賴喇嘛長壽之福的祝禱作爲復國遺囑的最後迴聲——

班禪大師已抱定「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菩薩大悲之願，因此透過長壽祝禱，把西藏的命運託付給達賴喇嘛。此情此願，可鑒十世班禪大師佛心如明月；決意訣別塵世之際，佛心中只有對西藏命運的關切，似白蓮花盛放，而沒有一絲教派私利的陰影。

班禪大師發出復國召喚之後，萬眾聚集的會場陷於一片死寂。據當時的與會者回憶，那種死一般的寂靜雖然只持續了剎那，卻像永恆一樣長久，似乎時間都由於震驚而忘記了流逝。

剎那的震驚過後，中共官員清醒過來；張國華氣急敗壞，咆哮如瘋牛，立即宣布逮捕班禪大師。以宣布逮捕爲起點，班禪大師開始了長達近十五年的地獄之苦。

地獄之苦的第一枚苦果，便是遭受連續數十天的「批判鬥爭」。

按照中共黨文化的語彙，「批判鬥爭」便是利用各種公眾場合，對「階級敵人」施加政治迫害、精神摧殘、人格侮辱、肉體酷刑，直至被「批鬥者」或者發瘋，或者自殺，或者意志崩潰，屈服於壓力，出賣靈魂，將中共對人性的詛咒刻在自己的額骨上，淪為暴政任意驅使的行屍走肉。

中共偽善，每逢大迫害之前必先給被迫害者確定萬惡不赦的「罪名」。

此次，中共也首先給班禪大師定下「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三項罪名，同時，又羅織十項莫須有的具體罪行，佐證這三項罪名。

這些罪名，每一項都如同歐洲中世紀羅馬教廷指控異教徒為魔鬼撒旦一樣嚴重——

那是要用鐵鏈捆在火刑柱上燒死的重罪。

而持續不斷的「批判鬥爭」，便意味著屬於中共暴政的精神火刑柱，被捆在「火刑柱」上焚燒的，是班禪大師的靈魂。

「批判鬥爭」的過程中，班禪大師受盡人格凌辱。

進行「批判鬥爭」者如惡魔厲鬼，圍繞班禪大師，狼顧鷹視，向大師臉

上噴吐口水，猛搨耳光，甚至傾倒尿水糞汁，咒罵班禪大師是毒蛇。其殘酷下流至極者，莫過於對班禪大師實施精神和肉體的雙重酷刑——

將一個木製生殖器插入大師的肛門。

在中國有一種專門用來懲罰婦女姦淫之罪的酷刑，叫作「騎木驢」，即對女犯執行「千刀萬剮」的凌遲之刑前，在通向刑場遊街示眾的路上，將一根木橛插入女犯的下體，以示羞辱。

現在，中共暴政要對班禪進行精神凌遲，以發洩獸性與仇恨。而且中共要侮辱的，不僅是班禪大師個人，更是整個藏傳佛教——

暴政此意陰狠至極，太過骯髒污穢，我實不忍再言，唯願讀者熟察之。

中共實施肉體摧殘之餘，還想在班禪大師的佛心間灼出羞辱的傷痕，不過，相信在歷史的回顧中，暴政必自取其辱；其辱佛的惡行惡狀，及其亙古未有之卑鄙無恥，必受天譴地責。

中共暴虐，實施大規模「連坐」。十世班禪大師召喚西藏復國一案，在衛藏和安多地區牽連至少數千人。

許多人不堪「批判鬥爭」的凌辱和酷刑，生命像烈焰中的枯草，化爲灰

燼，其中包括佛學和西藏世俗文化的精英——

他們是西藏文化之魂的生命承載者；他們隨風飄逝，西藏文化之魂因之黯然。

班禪大師血緣的親人，即父母，以及精神的親人，即經師，自然難以倖免於難。中共暴政為迫使班禪大師屈服，竟當他的面殘酷「批判鬥爭」他的血緣和精神的親人。

中國古代有言，所謂「人心似鐵，官法如爐」，意即就算堅硬如鐵鑄之心，也會在官法的熔爐中融化。中共的西方極權主義之法，其摧殘心靈之冷酷，更勝於古中國皇權之法。

但是，十世班禪大師佛心如金剛，任你毒焰三千丈，又怎能令佛心軟化半分。

誠如班禪大師所言：「現在遇到磨難時刻，我的意念中除了釋迦牟尼佛什麼都沒有。」

釋迦牟尼佛者，乃關於寂滅真理的大覺者——

萬法無常，萬苦皆幻；大千世界，唯一之真，只在寂滅之中。

班禪大師有信念如此，可渡萬千苦劫，而金剛之心不壞。

我看到一禎當年「批判鬥爭」班禪大師的照片。中共保留這禎照片原本想證明暴政對西藏「階級敵人」鬥爭的勝利，可是，以今日觀之，表現出的恰是佛心不可征服的意蘊。

照片中央，是班禪大師偉岸如高崖的身形；照片的背景陰森黑暗，似中共專制鐵幕，毛澤東巨幅畫像如同惡靈的浮雕呈現在鐵幕間；照片左右兩邊，「批判鬥爭」者擠作一團，彷彿群犬吠日，唾液四濺，一根根手指戳向班禪大師的面容——

這群「批判鬥爭」者在毛澤東惡靈浮雕陰沉莫測的注視下，竭盡全力現出狂怒欲絕之狀，詛咒班禪大師，以博取暴政的歡心。

群魔亂舞之間，惡鬼咆哮之際，班禪大師頭顱微垂，形似鐵佛，巍然不動，而其神情安詳，瞑目凝思，如置身荒原大野之中，浩渺雲空之上；想來此時，班禪大師意念中，定然佛心豐盈如滿月，寂滅之真理如萬里清輝，撒滿宇宙。

對班禪大師西藏復國召喚的「批判鬥爭」，幕後主使者和中堅力量毫無疑問是共產黨漢人，不過，在這個過程中，表現得最瘋狂、最狠毒的卻是某些藏人，其中包括被共產黨收買的西藏傳統社會中的貴族，也包括共產黨製造出來的所謂「翻身農奴」。

在共產黨的政治概念中，貴族和農奴本來針鋒相對，是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然而，在摧殘班禪大師的復國召喚的過程中，他們卻聽從共產黨的號令，沉澀一氣，成爲同一群幫凶，這既是一種政治的荒謬，又說明中共的虛偽。

傳統的貴族也罷，「翻身農奴」也好，他們都長著藏人的臉，身體裡流著藏人的血，骨頭上刻著藏人的基因，但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把他們與十世班禪大師歸類爲同一個種族——

在生理上兩者有共同源流，在心靈上兩者迥然不同，差別有如天地；班禪大師在九天之上，他們則在九地之下。

有人認爲這類淪爲共產黨的政治和思想走狗的藏人已經完全漢化。這種

判斷是錯誤的。

準確地講，從文化和人格的意義上，這類藏人已經共產黨化，而且與中共千萬貪官惡吏——無論他們在生理上應當被視為漢人、蒙古人、維族，還是回族——屬於同一個族群，表現出同一種文化，即共產黨文化孕育出的族群人格特徵：

物性貪慾托起的功利主義、入骨的奴性中異化出的狠毒、偽善所包裝的陰險詭詐，以及從極權專制權力裡獲得的荒淫無度的情趣。

共產黨狗官族群，這是一個把靈魂出賣給西方極權文化的魔鬼的種族，他們是背叛心靈的醜陋物質，他們是人性和道德之外的存在。

或許由於共產黨藏人狗官歸化魔鬼種族的時間相對比較晚，爲了取得魔鬼種族的認同，他們常常刻意表現出極端的共產黨人格。班禪大師公開發出復國召喚之後，在研究如何處置班禪大師的共產黨會議上，某些藏人共產黨官員，其中包括還具有所謂轉世「活佛」頭銜的人，諸如帕巴拉·格列朗傑一類，竟然冷血地提出，應當對班禪大師處以死刑。

這些所謂的轉世「活佛」，公然踐踏佛教不殺生的戒律，他們喪心病狂

到要殺真佛的程度，他們已經異化為渴望喝真佛之血的野狗。

這些藏人共產黨狗官對班禪大師的仇恨深處，隱藏著他們對西藏復國理想的仇恨。

顯而易見，假如班禪大師放棄復國的理想，他們就不會把仇恨指向班禪大師；正是西藏復國的理想像一面命運的銅鏡，映照出共產黨藏人狗官對於佛的背叛，對於藏人祖先心靈的背叛，對於藏人承受的無盡苦痛的背叛，所以，背叛者才仇恨西藏復國理想，而且恨得咬牙切齒，如癡如癲。

站在現實之巔，回顧這群共產黨藏人狗官歷史上的惡行惡狀，一種強烈的感觸沛然充滿胸懷：

將這群人同十世班禪大師一起，都冠以藏人的稱謂，既是對班禪大師的大不敬，也是對「藏人」這個稱謂的侮辱。

同時，我更加相信，以心靈的內涵和人格的風範為標準，才能準確地劃分出種族的界限。所有忠實於心靈的人們，都與班禪大師屬於同一個高貴而壯麗的種族，這個種族崇尚悲憫天下蒼生的英雄，尊敬為真理捨生取義的聖者，堅信人類不應當淪落為只能聽懂物慾和私慾召喚的形而下的存在——

這個種族有一個響亮的名字：自由人。

一九六六年，從中共政治意志中湧出的「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讓西藏高原籠罩在血雨腥風之中。對於西藏自由命運的忠誠，自然也使班禪大師再次承受屬於西藏命運的劫難。像動物園的關在鐵籠中的野獸一樣，被冠以「最反動的農奴主」之名當眾展覽——這可能是那個時期班禪大師蒙受的最殘酷的人格侮辱。

我很難想像，慣於在荒野中追逐自由之風的野獸，一旦被關進鐵籠，透過銹蝕的鐵柵面對觀賞的人群，牠們朦朧的情感意念中會湧起怎樣的苦悶與悲情。

但是，我相信，驕傲的自由人如果被異化的人類社會關進鐵籠，他在囚禁中注視鐵籠之外的目光，定然充滿對人類的蔑視與絕望，因為，他由於崇尚自由而成爲人類社會的囚徒。

班禪大師是自由人，不過，他同時也是佛。

佛不能蔑視人，而只能悲憫人的罪惡；佛不能對人類絕望，只能救贖絕

望中的人類。

但是，我知道，班禪大師承受奇恥大辱，像野獸一樣被關在鐵籠中供人觀賞之時，他對人類的悲憫之意和救贖之願，一定血淚豐盈，因為，佛亦有萬古浩蕩之情。

一九六八年，十世班禪大師被押進秦城監獄【註2】——

中共暴政第一獄；那裡也是人間地獄的最底層。

中共試圖透過單獨監禁摧毀班禪大師的意志。

鐵牢沉重的陰影之下，單獨監禁的死寂之中，石頭也會腐爛，時間也會凋殘枯萎，白骨也會霉跡斑斑，而班禪大師佛心依舊。

西藏高原之鷹如果被關進鐵籠，常會奮翼而起，用頭顱猛烈撞擊鐵條，直至翅折頭碎而死。

班禪大師亦有高原雄鷹之風。在秦城監獄期間，他曾經用輪廓如青銅色落日的頭顱撞擊鐵門，發出悲痛的長歎，其聲猶如受傷的猛虎暗夜悲嘯。班禪大師定然是為西藏的苦難、佛教的劫難而發大悲之音——

「文化大革命」中，扎什倫布寺靈塔被摧毀，歷代班禪的佛骨遭受踐踏之餘，又被棄之於荒野，心靈感應之間，十世班禪大師又怎能不為之痛斷肝腸；對於佛的選民，即藏人，侮辱佛骨，毀棄靈塔，無異於在藏人心中扎刀，在藏人的尊嚴上撒尿，班禪大師又怎能不為此痛徹心脾？

不過，在長逾九年半的鐵牢囚禁中，班禪大師的生命主題，則是效達摩面壁十年參禪之意，面對地獄般的黑暗而荒涼的死寂，苦思藏傳佛教復興之策。

正是由於十年死寂，十年苦思，班禪大師才能抓住後來的一次短暫的歷史機遇，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在西藏高原上推動佛教復興的命運之輪。

當代藏傳佛教在東亞大陸的十年復興，是以班禪大師佛心在十年鐵牢死寂中的十年苦思為基礎。此正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遙想當年，釋迦牟尼自己摘下金冠，步下王座，走向大野落日，最終找到寂滅的真理，從而登上人類智慧之巔，成為大覺者，即佛。

當代，中共暴政原本已經將十世班禪大師尊為「國家領導人」之列和西

藏的王者。但是，班禪大師視暴政賜與的榮華富貴如草芥，棄中共加封的「王位」如敝屣。

班禪大師撰寫《七萬言書》於前，發出西藏復國的召喚於後，即意味著他踏著釋迦牟尼的神聖足跡，再次走下王位。不過，當年釋迦牟尼是走向真理，而班禪大師是懷抱佛的真理，走向地獄——

在地獄之苦中，班禪大師與藏傳佛教的劫難同在，與藏人的苦難命運和無盡悲情同在。

或許正是班禪大師重現釋迦牟尼走下王座的高貴精神，歷史才給與他復興當代藏傳佛教的榮耀；只要太陽還沒有熄滅，人類的心靈還沒有腐爛，十世班禪佛的榮耀就將不朽。

註釋：

【註1】《七萬言書》：一九六二年，針對藏區諸省人民公社的問題及中共執行民族、宗教、統戰政策的問題，十世班禪撰寫《七萬言書》，以「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為題遞交給中共國務院。《七萬言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政策進行了嚴厲批評。十世班禪列舉大量事實，說明中共在平叛、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十分嚴重，並且強調：這些問題和錯誤若不認真加以糾正，藏人將面臨滅族滅教的嚴重危險。該報告被毛澤東定性為「反動派的瘋狂反撲」。

【註2】秦城監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著名的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秦城村，由蘇聯專家設計，於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日落成。秦城監獄是唯一一座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的監獄和看守所，由公安部監所管理局管理。這裡關押過國民黨、共產黨和政治異見者，見證了中共暴政黑暗

、殘酷而血腥的統治。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判刑的省部級及以上高級官員大多在此集中關押。

第四章

歷史上的短暫春天

——班禪大師在藏人心靈中播下佛教復興的種子

一九七六年紅葉如血之時，東方共產帝國的「教皇」毛澤東魂飛魄散，物化爲一具臃腫的僵屍。

鐵血強權者的死，必然留下巨大的權力黑洞；爲填補權力黑洞而進行的政治利益爭奪，則意味著極權體制的政治大危機。

毛澤東撒手人寰不久，華國鋒【註1】便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以毛澤東夫人爲首的所謂「四人幫」（編按：指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毛澤東妻）、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派重要政治勢力），這個「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新權貴階層的政治象徵。

華國鋒宮廷政變，本意只是爲了自己在與毛澤東夫人派系的權力爭奪中獲得主宰中共最高權力意志的地位，但是，他卻得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澤東驅逐出權力舞臺的中共舊權貴階層的支持。因爲，只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舊權貴才能恢復昨日的特權，而毛澤東夫人及其幫派則被歷史視爲「文化大革命」政治遺產的正統的繼承者，儘管事實上華國鋒幫派與毛澤東夫人幫派都應當歸類爲「文化大革命」遺留在歷史中的政治痕跡。

然而，歷史之輪並不總是按照極權者的意志運轉。

就在毛澤東之死引發的中共權力危機的幾年內，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英雄人格，胡耀邦【註2】，如海雨天風，闖入中國政壇中心。

胡耀邦性格率真、心口如一、勇於任事，且有古俠義之風，他的崛起乃是一個奇蹟。

在這裡，「奇蹟」一詞至少有雙重含義：

其一，在充滿陰謀與私利計算的中共官僚體系中，胡耀邦忠實於真理的信念和人性的光輝意味著人格的奇蹟；胡耀邦是中國最英俊的男人之一——在心靈的意義上最英俊。

其二，胡耀邦這種美而高貴的人格能在鬼魅成群、妖孽當道的中共官僚體系中脫穎而出，直上權力之巔，雖然有一些具體原因，例如當時中共軍隊權力體系中碩果僅存的元老葉劍英，與胡耀邦之交，有鍾子期、俞伯牙的知音之意；華國鋒派系同中共舊權貴之間的深刻矛盾，給了胡耀邦左右逢源的機遇……等等，但是，我仍然願把他崛起的現象歸之於機遇天成的奇蹟。

從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為起點，至一九八七年

中共權貴階層透過宮廷政變，奪走胡耀邦中共總書記的權力為終點，胡耀邦相當程度上主導了這個歷史時期的中國政治邏輯。

胡耀邦一馬當先，衝鋒陷陣，率先發起徹底否定共產暴君毛澤東的思想運動，儘管由於中共權貴階層竭力抵制，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努力半途而廢，未竟全功，但是，毛澤東畢竟被趕下神壇——

毛澤東失去神的地位，是中國人心靈解放不可或缺的前提。

胡耀邦主政期間，最大的仁政之一，便是廢止「人民公社」——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中營，使數億中國農民擺脫了實際的囚徒地位，獲得了經濟自由。

同時，胡耀邦力主徹底否定一九五七年以對知識份子的政治大迫害、思想大整肅為內容的「反右運動」。

雖然鄧小平一類中共老官僚頑固堅守「反右運動」有其必要性的反動原則，並使徹底否定「反右運動」的努力受挫，不過，絕大多數「反右運動」的受害者，還是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過程中，擺脫了「右派份子」，這種中共專制下的政治賤民的地位。

胡耀邦主政十年，中國進入中共建政史上空前絕後的思想自由時期。

胡耀邦實行的政治開明、思想解放的國策，使中國人對於自由民主化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寄與極大的期待——

自由與民主，那才是屬於人民的「中國夢」。

胡耀邦是上蒼賜給中國的一次奇蹟般的歷史機遇，他也確實給中國帶來一次持續十餘年的思想自由的春天。

在已歷萬年的人類文明史中，十餘年只是一個短暫的春天，然而，或許正由於短暫，才更值得被歷史珍重地記住。

胡耀邦用大良知者的勇氣和智慧，在極權鐵幕上撕開一道裂痕，思想自由的滾滾春風從裂痕間湧入東亞大陸；春風不僅吹綠了中原，也使西藏高原呼吸到春天的氣息。

經過五〇年代中葉的滅佛運動，五九年的大屠殺、大逮捕，以及接踵而來的大飢餓和雪上加霜的「文化大革命」，西藏高原民生凋敝，佛光黯然湮滅，幾乎變成萬里死寂的墳場墓地。

在藏區進行深入考察之後，胡耀邦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在西藏高原上實施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深惡痛絕，他在駐藏中共官員的一次會議上沉痛而悲憤地說，中共「對西藏人民是犯了罪的」；他還提出，絕大部分漢族幹部要退出西藏，留下來的應當主要是提供技術援助的人員，以便真正實行藏人自治。

不過，胡耀邦需要關注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他也不熟悉西藏高原的靈魂，即佛學。因此，胡耀邦對西藏的殷殷善意，只能透過另一個歷史人物，即十世班禪大師來實現。

如果說胡耀邦是十年浩蕩的春風，十世班禪大師就將成爲一位辛勤勞作的農夫，他要在西藏高原荒涼乾涸的大地上，播撒佛教復興和西藏文化復興的種子；他相信，佛學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復興，定會結出西藏復國的政治果實，而歷經摧殘的藏人的心靈，就是他將要播種的大地——
那是一片渴望自由和佛的慰藉的大地。

一九七七年，命運爲十世班禪大師打開地獄之門；在葉劍英過問之下，

班禪大師獲釋，離開秦城監獄，重返人間。

當年十二月，胡耀邦就任位高權重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长。當時，他關注的同西藏有關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復班禪大師的政治地位，因為，政治地位是班禪大師介入西藏事務的政治能量的來源和合法性基礎。

但是，胡耀邦的努力遇到李先念【註3】、汪東興【註4】等中共頑固派的強烈反對。他們提出，班禪大師曾經撰寫全面否定中共對藏政策的《七萬言書》，更在關鍵時刻，公開號召恢復西藏獨立，如果現在重用班禪大師，會在中共長期培養出的藏族幹部中，造成極大的混亂，也會使過去三十年與中共「榮辱與共」的藏族朋友心寒——

他們所謂的「藏族幹部」和「藏人朋友」，指的就是帕巴拉·格列朗傑一類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共產黨藏人。

李先念、汪東興等人更威脅說，中共培育的藏族幹部是中共管理西藏的政治基礎，這批人曾經同班禪的西藏恢復獨立主張進行過堅決鬥爭，如果現在重用班禪，很可能造成中共統治西藏的政治基礎的動搖。

一段時間內，在是否恢復班禪大師政治地位的問題上形成緊張的平衡，

因此，出獄已經三年，班禪大師仍然沒有機會回到魂牽夢縈的西藏高原，一直留在北京，實際處於軟禁狀態。

對於一般人，能夠從黑牢鐵鑄的陰影中活著走出來，心靈和白骨沒有在黑牢的死寂中腐爛，必定意味著無與倫比的喜悅。然而，班禪當年是為承受西藏浴血的苦難，才發菩薩的大悲之願，湧身躍入地獄。現在，他雖然離開地獄，可是，西藏的命運仍處於地獄之中；藏人心靈的苦痛和佛國滅亡的悲情，依舊隨浩蕩的風在西藏高原上日夜漂泊。班禪大師，這位把靈魂作為祭品獻給西藏高原的佛，又怎麼能只為自己命運的變化而感到喜悅；他的神思與夢魂定然繼續留在地獄深處，同西藏的命運共苦痛。

佛教復興於雪域，重建以心靈為核心價值的生活方式之前；西藏文化復興，重建西藏復國的理想之前，班禪大師心中只有早已乾涸的淚海，不會有滔滔的喜悅，因為，復興雪域佛國和西藏文化，乃是佛的天職。

一九八〇年，胡耀邦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天平隨之向十世班禪大師傾斜。

中共頑固派感到難以挽狂瀾於既倒，即難以阻止班禪大師政治復出的潮

流，於是，他們改變策略，由鄧小平【註5】、李先念、陳雲【註6】、薄一波【註7】分別找胡耀邦談話，提出班禪恢復政治地位之前，必須作出忠誠於共產黨西藏政策的承諾。

當時，鄧小平已任全國政協主席，按中共管理機制，分管中共中央統戰部。

統戰部部长楊靜仁【註8】受鄧小平之命，向班禪大師提出政治復出和重返西藏的三個政治條件，即「不推動宗教高潮；政治思想和立場與中央一致；維護祖國統一」。

班禪大師對這三項條件作出違心的口頭承諾。

百年或者千年之後，在歷史的回顧中，誠實的人們——如果到那時人類還沒有完全在謊言中腐爛的話——定然會感到，作違心的承諾是艱難而痛苦的事。

不過，我相信，班禪大師作出上述承諾時，或許會有一絲悲涼，卻不會感到艱難。

中共官場本就是陰謀和騙局構成的黑暗叢林，中共官僚絕大多數都是偽善而詭詐的謊言存在。對他們信守誠實的原則，就如同為陰溝裡猥瑣的鼠類播放高山流水、陽春白雪之雅樂，那是比對牛彈琴更可笑的愚蠢之舉。

相反，基於命運的逼迫，為了神聖的理想，讓生命語言化的中共官僚也受到戲弄，乃是人生一大快事，就如同炎炎烈日之下，口乾舌燥之時，暢飲雪水河清流一般，必會痛快淋漓，又怎會有艱難之感。

君不見，鄧小平最後一次復出之前，向主宰中共權力意志的華國鋒上書，意欲重回權力中心；其書中諂媚之意溢於言表，阿諛之情奴性入骨，雖娼妓老鴇之虛情，閹人太監之假意，亦難勝鄧小平當時的奴顏卑膝於萬一；然而，一旦重權在握，便老臉如霜，鐵手無情，招招欲置華國鋒於死地。

鄧小平的詭詐老辣，十世班禪大師亦必有所聞，因此，與此等毫無信義的老政客周旋，虛與委蛇，心口分離，自是必備之常識。

其實，在要求班禪大師作上述三項政治承諾之前，中共頑固派權貴就已經迫使他不得不面對一項真正的心靈艱難。

班禪大師離開秦城監獄僅四個月，薄一波就在鄧小平面前進讒言，他說：「耀邦要恢復班禪的國家領導人的地位，那勢必影響到西藏，還有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的藏區。班禪是個宗教人物，很多藏人把他看成精神領袖。這就產生一個政治問題：中國只能有一個精神領袖，就是中國共產黨。有兩個精神領袖就會出問題，甚至可能再一次出現一九五九年那樣的西藏叛亂。所以，恢復班禪的國家領導人地位，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組織上要出面安排他結婚，還俗，讓他自己否定他的宗教精神領袖地位。」

薄一波這一席話，可見中共老官僚陰險狡詐的鬼魅之意，蛇鼠心腸。

鄧小平與薄一波本就蛇鼠一窩，同氣相求。薄一波的卑鄙建言正中鄧小平下懷。於是，鄧小平以其一貫的蠻橫簡單的作法，託楊靜仁轉告班禪一句話：「先結婚，後談回西藏考察、朝聖等問題。」

最開始，薄一波甚至強調班禪大師的婚事要由「組織安排」。

用正常人能夠理解的語言翻譯過來，薄一波所謂的「組織安排」的意思是，要效法當年中共給清朝遜帝溥儀安排一個女特務作「夫人」，即把特務派到床上去的方式，處理班禪大師的結婚，以便對他進行日夜不斷的全天候

監視，不留一絲個人隱私的空間。

中共老官僚的陰損寡毒、泯滅人倫，由此可見一斑。

只是在胡耀邦的強力干預下，薄一波建議的最陰毒的部分才被否決——班禪大師在確定婚姻對象的問題上獲得一定自主權，而且還可以只談婚姻，不宣布還俗，繼續保留班禪的法號。

鄧小平、薄一波一類中共老官僚原來的如意算盤打得精明，他們以為，只要逼迫班禪大師結婚，就可以損害班禪大師在藏人中的威信，否定班禪大師的宗教領袖的精神權威。殊不知，看似一塊塊荒野中的岩石一樣粗獷的藏人，心中自有大智慧；其大智慧就表現為一項定見——

永遠相信佛心，而不相信強權。

而且，藏人的這項定見，既不會被如簧巧舌所迷惑，也不會被驚雷颶風所摧折。

數百年前，空靈俊秀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註9】，以其高原之風一樣自由的天性，不能見容於強權。滿清王朝褫奪其達賴喇嘛封號，使其生

命湮滅於安多高原之夜，並另立六世達賴喇嘛。但是，藏人，那佛的選民，卻堅信倉央嘉措是以繽紛如花海的詩情之美表述佛法，他們不接受強權另立的偽「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靈塔，至今仍享有法王的遺跡之尊，被虔誠地保留在布達拉宮。

當代，對於藏人獻給班禪的尊敬和信仰而言，中共鐵血強權逼迫十世班禪大師結婚之事，有如一片血紅的楓葉，飄飄搖搖，輕輕落入深潭之上，波瀾不驚，不會激起一絲波紋——

藏人相信班禪大師忠於佛法，就像相信他們自己的心靈；班禪大師作為宗教精神領袖的權威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這是老謀深算的中共老政客鄧小平、薄一波之流始料不及的。

一九八〇年代初葉，雖然之前有「西單民主牆」【註10】遭受摧殘之事發生，但是，從整體形勢上看，中國的思想自由化進程依然生機勃勃，綠意盎然。

在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大良知者胡耀邦的全力推動之下，一九八〇年，

十世班禪大師，這位由於曾經公開發出西藏獨立復國召喚而承受地獄之苦的英雄，竟然恢復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位，很快又恢復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職位，從而進入了所謂「國家領導人」的範疇。這意味著，班禪大師終於再次獲得了對西藏命運施加重大影響的權力，以及重返西藏高原的權利。

從一九七七年離開秦城監獄算起，班禪大師獲得重返西藏高原的權利之路走了將近三年。一位詩者寫道，「正直的人就要走那彎彎曲曲的路」，班禪大師獲得重返西藏的權利之路就彎曲在中共陰謀政治的荊棘叢中，每一步都留下了血染的足跡——

血是從佛心中滴出。

從一九六二年撰寫《七萬言書》，為自己敲開地獄之門算起，已經過去十九個春秋；雖然人世間有春花秋月之別，十世班禪大師的青春年華卻在地獄中如秋葉飄零。現在，歷經無盡劫難之後，歷史將要放飛這隻西藏高原的鷹群之王了；班禪大師，這隻西藏高原的鷹群之王，勢將扶搖直上，一飛冲天。

一九八二年，十世班禪大師重新踏上闊別十八載的衛藏大地，回到扎什倫布寺【註11】。

「文化大革命」中，扎什倫布寺內的歷代班禪的靈塔全部被毀，「紅衛兵」將靈骨肢解之後，棄諸荒野；一部分靈骨後來被藏人偷偷撿回，當作聖物保藏起來。

十世班禪大師此次返回扎什倫布寺，就是要將歷代班禪蒙難的骸骨迎回扎什倫布寺，並為重建的佛塔開光。

這次宗教儀式，其意義不僅在於為蒙難的歷代班禪靈骨安魂，而更意味著一個預言，一種象徵——

它預言，現代藏傳佛教的一次偉大復興已經如天雷震盪，不可阻擋；同時，歷代班禪靈骨佛塔的重建，也象徵著這次勢將風行所有藏區的佛教復興運動，是以扎什倫布寺和班禪的佛心為意志的起點。

必須把在西藏高原上復興佛教視為生命的起點和歸宿——
作為僧人，十世班禪大師當然要堅守這種信念。

不過，班禪大師魂繫復興佛教，並不只是由於自己的僧人身份，而是基於對西藏命運的更為深刻的認知。

人類歷史本質上是文化史；一旦喪失了獨特的文化命運，便喪失了存在的精神價值和意義，對於任何族群都是如此。而藏人的意義和精神價值同佛教水乳交融，難解難分。

正由於此，中共控制西藏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掀起現代滅佛運動——中共要徹底否定藏人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

基於上述認知，班禪大師相信，要想拯救西藏命運，首先必須拯救佛教；對於藏人，佛教復興意味著召魂運動，只有心靈重新被禮佛的金燈照亮，藏人才能找回屬於自己的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

十世班禪大師承擔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領袖的天職，並非囿於教派或者「班禪」這個概念的榮辱；他是以一種站在永恆和無限之巔俯視的超越感，來看待自己的天職。

在《七萬言書》中，班禪大師就表述過這樣的意思，即萬法無常，萬事萬物終究都會湮滅，佛教也有消逝之時——預言自己會入滅，這是佛教比其他宗教更接近真理之處——他之所以不忍佛教現在就在西藏被摧殘，只是因為他不忍看到一種生命力青翠盎然的精神存在被毀滅。

佛不忍看含苞欲放的心靈之花黯然凋殘。

班禪大師的上述表述使我震撼。

他復興佛教的根本原因，在於關懷蒼生之苦的大悲情，而沒有任何私利的陰影。他知道，唯有佛教能使藏人回歸心靈；如果佛教此時便湮滅，藏人將在共產黨文化的教唆下，淪為一塊塊無魂的醜陋物質；一具具行屍走肉，只能在物慾中逐漸腐爛為骯髒的虛無——

班禪大師不忍注視這種生命的墮落，而藏人的心靈需要決定了，佛教是不應此時就入滅的青翠的過程。

事實上，一九七七年出獄不久，雖然還處於軟禁之中，班禪大師就開始利用有限的自由，為復興佛教事業而聯繫劫後餘生的藏人高僧和學者。

佛教的重要人物經過滅佛的政治浩劫之後還能生存下來，無非有兩種情況：

一是軟弱怯懦，透過把靈魂出賣給暴政而苟活；一是具有極其頑強的生存能力，這種生存能力往往不是生理的，而是來自於心靈，來自於堅如鐵石的信念。

願意為復興佛教而重新聚集在班禪大師周圍的高僧和學者，毫無疑問屬於堅如鐵石的心靈和信念的存在；堪布晉美彭措和貢唐蒼仁波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這個以班禪大師為靈魂的藏人智者星系，就從重建西藏寺廟和佛學院為切入點，開始推動佛教復興於雪域高原的命運之輪。

寺廟是佛的真理在塵世間的棲息之所，是藏人心靈生活的家園。

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大潮湧起之前，除布達拉宮和其中的寺廟作為古跡被保存下來之外，全藏區的數千座寺廟絕大部分都變成荒草起伏、狐鼠出沒的廢墟，也有一些充作倉庫之用。

班禪大師走出地獄，重返人間，再歸西藏高原之後，寺廟的重建有如得到天祐神助；短短數年，千座寺廟便奇蹟一般，從廢墟間湧現——

或許只有一個原因能夠解釋這種現象，即藏人心靈間的佛的神聖殿堂從來就沒有被摧毀。

一座座寺廟的金頂，輝映朝陽之際流光溢彩，晚霞璀璨的時刻紫霧縈繞，雪域高原開始重現佛國神韻。寺廟之內，無數盞禮佛祈福的金燈，重新照亮藏人由於暴政滅佛的黑暗而乾枯的眼睛——

眼睛裡金焰輕輕搖曳，那是重歸的靈魂在起舞。

得益於胡耀邦多次干預支持之助，班禪大師推動重建和恢復佛學院的進程，最初也十分順利；至一九八〇年代上半葉，佛學院已經如春花繁盛，在全藏區處處怒放，計有以「拉薩班禪學校」著稱的西藏自治區佛學院、那曲佛學院、四川佛學院、色達喇榮五明佛學院、甘肅佛學院、青海佛學院等。短短數年，佛學院就遍布藏區，這個現象表明，藏人的心靈如乾涸的大地渴望蒼天之雨一樣，渴望佛的法雨。每個佛學院都是一條佛法的雪水河，

眾多佛法之河，匯成了佛學復興的智慧之海。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的當代藏傳佛教在雪域高原的復興，其重要特徵之一，就在於佛學院發揮了巨大作用。

換言之，此次佛學復興的基礎不僅是建立在藏人對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的純樸信仰之上，而且更是以對佛學的深刻理解，即以一種博大的生命哲學作為奠基石，因此，佛學復興運動獲得了豐饒的精神內涵，而精神內涵的豐饒是任何一次文化或者心靈復興的強大的能量之源。

其中五明佛學院的發展歷程，經典地表明佛學院在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中的作用。

五明佛學院位於橫斷山高嶺深壑間的大荒之地，海拔近四千米；經班禪大師授意，由堪布晉美彭措創建於一九八〇年。

一九八七年，班禪正式批准五明佛學院成立，並尊稱創建人堪布晉美彭措為「聖者法王」。

五明佛學院創立之初，僅有三十二人。經過十餘年發展，五明佛學院已

經被《紐約世界報》稱為「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

五明佛學院顯密雙修，學修並舉，課程體系設置縝密完整，教學要求幾近嚴苛；學習者超過萬人，其中有藏族的男女僧人，也有俗人，還有數千漢人信眾，不遠萬里來到這大荒之野，尋求心靈的歸宿。

「聖者法王」在世期間，五明佛學院不僅培養出成千上萬的佛學人士，更培育出一百八十多位精通藏傳佛教各派教義的堪布，即法師和講經者；這批堪布不僅在雪域高原以及東亞大陸全境創辦道場，而且在重洋萬里之外的紐約等地建立「喇榮顯密中心」，使發源於十世班禪大師大悲之心的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具有了世界的眼光和胸懷。

班禪大師於一九八七年在北京黃寺【註12】創辦「藏族語系高級佛學院」，親自擔任創院院長。

這所高級佛學院招收的第一批學員堪稱西藏宗教的精英，其中包括遍布全藏區藏傳佛教五大教派的活佛和苯教【註13】的活佛；擔任講師的，則是從中共大迫害的血河中或者鐵牢的陰影中活著走出的資深佛學家和藏學家。

同時，班禪大師主持創建藏傳佛教研究院，從全藏區各地，以及內蒙和北美聘請了二十一位研究員、二十七位副研究員、十七位助理研究員，開始編纂《雪域百科全書入門》、《雪域哲學叢書》等著作。

班禪大師自任院長的「高級佛學院」設在北京黃寺，就極具象徵意義，即這次現代藏傳佛教復興同時具有東方文化復興的內涵。

——西藏在古代歷史上經歷過一次滅佛時期。

就藏傳佛教的傳播而言，那次滅佛之前，稱爲「前弘期」；滅佛之後的佛教再起，稱爲「後弘期」。

當代中共掀起西藏歷史上第二次滅佛的狂濤惡浪。班禪大師針對中共的滅佛發起的佛教復興運動，可以稱爲藏傳佛教的「再弘期」。

這次佛教復興超越西藏高原，強烈影響淪爲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即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地的東亞大陸內地，因此顯示出東方文化復興的價值。

藏傳佛教東傳是一個悠久的歷史過程。

經典的藏傳佛教東傳，第一次發生在蒙古帝國時期，第二次發生在滿清帝國時期。這兩次經典的東傳有一個共同特徵，即藏傳佛教都被強權奉為國教——

佛教東傳不是一個單純的精神過程，而是覆蓋著強權的陰影。

班禪大師推動的當代佛教復興運動，也顯示出藏傳佛教東傳的效應。不過，這次藏傳佛教東傳不僅沒有借助強權的鐵翼，而且只憑藉佛教精神的魅力，就吸引了東土宗教信仰自由的心靈，而這些心靈正在東方巴士底獄中，承受馬克思主義精神亡國奴的屈辱和中共政治奴隸的苦痛。

重建寺廟和創建與恢復佛學院，這兩個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佛教復興運動得以乘萬里長風、翱翔天宇的長翅。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一個只屬於雪域佛國的景象，在西藏高原重現——

銀火焰般瑩白的雪山下，蒼天之淚般晶藍的聖湖旁，青銅色的大野荒原之間，處處可以看到僧人們端坐瞑目，追尋心靈的意境；隨風飄搖的僧衣，猶如一團團絳紅色的火焰，那是生命意義在靜靜地燃燒。

作為僧人，班禪大師自然要承擔復興佛教的天職；同時，作為血液裡激盪著松贊干布磅礴豪情的藏人，復興被共產黨文化摧殘的西藏文化，也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

班禪大師復出政壇之初，就極端關注藏區教育體系的建設。

在班禪大師推動下，衛藏、安多、康巴，以及甘肅和雲南藏區，建立起一系列運用藏、漢雙語教學的大學和專門培養師資的師範學院，以及藏文中學；大師本人還擔任一些院校的名譽校長。

人們把上述這批院校統稱為「班禪學校」。

迄今為止，「班禪學校」畢業的人員已經達到二十五萬餘人，這些人構成現代雪域高原上西藏文化的生命背景；不僅如此，海外藏人流亡社區的報社、雜誌、電臺、研究機構的主筆，也幾乎全部畢業於「班禪學校」。

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即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無論對於任何民族，自己的語言都是民族存在的最主要的表述形式。

班禪大師深諳此理，他曾指出，滅絕藏語，就是要消滅藏人。

爲使藏語免於在中共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下凋殘，班禪大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據說，有一段時間，班禪大師辦公桌上一釐米厚的玻璃板幾天就不得不換一塊，因爲，爲拯救和發展藏語文與當局打交道時，那些中共官員顛預昏聩的官僚作風和冷漠甚至冷血的態度，常令班禪大師怒發如雷，巨掌擊下，玻璃破碎。

藏語文今日的存在與發展，相當程度上仰賴班禪大師拯救之力。

班禪大師佛心浩蕩，卻常聚焦於對藏民族英雄人格傳統的關注。

世界上最長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的搶救、整理工作，一直在他的佛心之光的普照之下；籌建松贊干布雕像時，班禪大師對設計人員講，以前都把松贊干布奉爲一尊佛，現在要從藏人的民族英雄的角度來設計松贊干布的雕像。

班禪大師對藏民族英雄人格的苦戀，似乎是一個命運的預言：

當代佛教復興運動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不僅需要藏人成爲佛的選民，而且需要藏人成爲英雄的選民——

在一定意義上，更需要。

註釋：

【註1】華國鋒（一九二一年～二〇〇八年），原名蘇鑄，山西省交城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華國鋒與汪東興、葉劍英合手逮捕了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曾經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註2】胡耀邦（一九一五年～一九八九年），字國光，中國湖南瀏陽人。曾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是中國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政治經濟改革的最主要的推動者；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胡耀邦是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發起人。其主政期間，在文化及民族政策方面推行開明寬容的政策，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放開民族自治權。胡耀邦及趙紫陽主政的十年，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少有思想自由的十年，中國的經濟、文化事業取得充分發展。

一九八六年年底至一九八七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學生高呼「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中共元老將學潮的爆發，歸咎自由化知識份子煽動，以及胡耀邦的縱容，並指胡耀邦應該對一九八六年學生運動的失控負責。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發動宮廷政變，迫使胡耀邦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搶救無效，逝世。

胡耀邦逝世後，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園內出現各種大字報，藉悼念胡耀邦批判一九八七年造成胡耀邦失勢的「老人政治」。基於對胡耀邦遭遇的同情和其開放清廉形象的尊崇，加上對官倒與貪污情況嚴重的不滿，當時的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發起著名的六四民主運動。

【註3】李先念（一九〇九年～一九九二年），湖北黃安（今紅安）人，中共元老寡頭集團重要成員。一九八三年六月，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九八八年四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主席。

【註4】汪東興（一九一六年一月～），江西省弋陽縣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顧委委員。

【註5】鄧小平（一九〇四年～一九九七年），四川省廣安縣人，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的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頭目，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血案的罪魁禍首。

【註6】陳雲（一九〇五年～一九九五年），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青浦縣練塘鎮）人，原名廖陳雲。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等職務。陳雲是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成員。

【註7】薄一波（一九〇八年～二〇〇七年），山西省定襄縣蔣村人，中共八大元老之一，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主要領導人之一。

【註8】楊靜仁（一九一八年～二〇〇一年），回族，甘肅省蘭州市人。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是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

【註9】倉央嘉措（一六八三年～一七〇六年），法名：羅桑仁欽倉央嘉措，第六世達賴喇嘛，著名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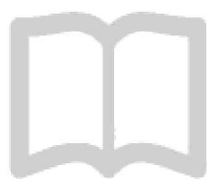
【註10】西單民主牆：主要指的是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北京西長安街和西單北大街交會處，西單體育場的約二米高、一百米長（也說是兩百米左右）的寬闊圍牆，上面張貼著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西單民主牆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起到宣傳政治自由與民主化的社會效果。一九七九年，中共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牆」。

【註11】扎什倫布寺，也稱「吉祥須彌寺」，全名「扎什倫布白吉德欽

曲唐結勒南巴傑瓦林」，意為「吉祥須彌聚福殊勝諸方州」，是西藏日喀則地區最大的寺廟，為四世之後歷代班禪喇嘛駐錫之地。

【註12】北京黃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位於安定門外黃寺大街，有東黃寺和西黃寺。其中東黃寺又名普淨禪林，建於清順治八年；西黃寺則建於順治九年，達賴喇嘛五世來京時住此。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禪額爾德尼來京，清高宗指定把五世達賴曾經住過的西黃寺作為他的安禪之所，六世班禪在西黃寺圓寂。

【註13】苯教，又稱苯波教，西藏最古老的原始宗教，八世紀中葉吐蕃王朝「扶佛抑苯」，苯教統治地位才逐漸消失。苯教屬泛靈信仰，藏人忌吃魚，或與此信仰有關。後來發展的苯教，是「幸饒彌沃如來佛祖」所傳教的「如來正法」，為西藏最古老的「象雄佛法」，歷史上因修行本教而成就虹化身的「大成就者」，一輩輩從無間斷者有二十四位，有間斷者更是不計其數。「古象雄文明」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範圍。



第五章

決策殺佛

——春天之後將是嚴冬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透過一次宮廷政變，逼迫胡耀邦交出中共總書記的權杖。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胡耀邦黯然退出權力的中心，失去主導權力意志的地位，這意味著中國十年思想自由的春天即將結束。

胡耀邦是上蒼賜給中共的最後一次自我拯救的機會，也是中國歷史和平完成民主轉型的最後一次可能。

大良知者胡耀邦主政期間，中國歷史確實存在良性發展的可能，即以胡耀邦為靈魂的中共開明派，透過自我政治改良，逐步實現憲政民主的和平轉型。

如果這種可能變成現實，中國將避免一次血雨腥風中的社會大變革；中共也會受到歷史的寬恕和救贖，躲過以反人類罪犯罪組織的名義接受末日審判的命運。

胡耀邦遭到政治整肅證明，中共拒絕了上蒼賜與的自我拯救的最後機會；中國失去了和平民主轉型的最後可能。

兩年之後，中共權貴動用幾十萬大軍，屠戮古都北京，鎮壓學生自由民主運動。就像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近代史上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八九「天安

門」事件中學生湧流的血，也洗去了當代中國史上的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以胡耀邦遭受整肅為標誌，中國只剩下一種前途，中共只剩下一種命運——中國將在大動盪中實現社會轉型正義，那是需要用血海淚濤相貿易的正義；中共權貴國家權力私有制將在全民大起義中被徹底摧毀，那是不可救贖、沒有寬恕的毀滅。

權力是對於政治陰謀的勝利者的獎賞。

胡耀邦失勢之後，這次宮廷政變的主導者，一群被稱為中共「元老」的老政客，超越中共的組織體系，實際主宰了中共最高權力意志。

這個生理上衰老得連骨頭都已經腐爛發臭的老政客寡頭集團，卻處於熱戀專制權力的發情期；站在他們後面的則是重返權力殿堂的中共權貴階層。

「文化大革命」中，這個中共權貴階層被毛澤東趕出權力的殿堂，黥面黔首，塗上「政治賤民」的標記，放逐到地獄的苦難之中。

毛澤東整肅中共權貴階層，本質上是因為這個階層一度在權力鬥爭中背叛了毛澤東，並效忠於另一個共產黨官僚劉少奇。儘管毛澤東試圖讓歷史相

信一個謊言，即他是基於某種政治理想主義才懲罰中共權貴階層，但是，歷史終究會走出謊言的陰影。

毛澤東物化之後，中共權貴階層利用華國鋒與毛澤東透過「文化大革命」培育的權力新貴之間的矛盾，以及從這種矛盾中爆發的宮廷政變，逐步全面重返中共權力殿堂。

這群還魂的鬼，這個曾經由於失去權力而飽經屈辱與痛苦的權貴階層認識到一個「真理」：

擁有權力便擁有一切，失去權力就失去一切；權力是他們榮華富貴的唯一源泉。

中共權貴階層及其政治代表，即主宰最高權力意志的元老政客寡頭集團，在經歷命運的大磨難之後，除了權力之外什麼也不相信，權力是他們唯一的理想；對於他們而言，權力就是詩，權力就是歌，權力就是幸福，權力就是歡樂。

中共權貴不能容忍胡耀邦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胡耀邦實施的思想自由和政治開明政策，將把中國的命運導向自由民主意義上的政治改良，而政治改

良必然以中共權貴失去專制權力作為發展趨勢。

胡耀邦遭受整肅之後的最初一段時間，政治邏輯還在按照胡耀邦推動的歷史慣性運行。不過，以鄧小平、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為核心的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正在他們那顆由於衰朽而仇恨生命的心中，醞釀屬於政治嚴冬的暴風雪。

思想自由的春天之後，沒有繁花如錦的盛夏，卻將迎來接踵而至的摧殘生命的冬天——

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西藏，情況都將如此。

中共權貴對外公開的胡耀邦的「罪錯」，歸結為支持「自由化思潮」。在內部整肅過程中，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對胡耀邦的西藏政策，也作出極其嚴厲的指控，其中薄一波和李先念表現得最為激烈，因而也最為醜陋。他們指責胡耀邦縱容西藏宗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使西藏的宗教分裂主義勢力死灰復燃，進而造成中共在西藏問題上政治全面被動的局面。

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上述指控，不僅直接針對胡耀邦，而且意味著暴政

即將對西藏的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以及對十世班禪大師亮劍。

如前所述，胡耀邦這樣品質高貴的大良知者能從中共官僚體制中湧現，並進而主宰中共最高權力意志，這本身便是一個政治奇蹟。

正是胡耀邦給東亞大陸帶來的十年思想自由的春天，為班禪大師推動藏傳佛教復興提供了時代背景。因此，任何對中共極權政治的鐵血邏輯稍有理解的人都清楚，中共摧殘胡耀邦的政治鋒芒，很快就會轉向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及其推動者，班禪大師。

面對這種險惡的局面，班禪大師不僅毫無迴避退縮之意，遑巡畏懼之情，反而奮起佛的「大雄」之勇，繼續全力推動佛教復興和西藏文化復興事業，展示出不惜與暴政決政治死戰的意志。

中共元老寡頭集團也很快就意識到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對其在西藏的極權政治統治的威脅。他們對班禪大師的忌憚，主要在於下列各個方面。

其一，十世班禪大師在藏人中享有崇高威信，而且這種威信並不是僅僅來自於「班禪」這個稱號的歷史地位，而主要是由十世班禪大師本人顯示出的菩薩大悲憫之情所贏得。

班禪大師透過推動復興佛教運動擁抱了西藏命運的天空，同時，他也擁抱了西藏命運的大地——

普通藏人的靈魂就是西藏命運的大地。

班禪大師走出地獄，重返人間之後，在不到十年之間，他的足跡便踏遍雪域高原；每到一地，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為藏人摩頂祈福。

據不完全統計，經十世班禪大師摩頂祈福的藏人達三百五十餘萬，佔當時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有時一日之內，為太多人摩頂祈福，班禪大師的手掌磨破，掌心殷紅，如浴血的太陽。

班禪大師為藏人摩頂，實際上是在以菩薩的大悲之情，撫摸西藏的大地，撫摸西藏的命運，撫摸綻裂在西藏命運上的無數條慘痛的傷痕，撫摸那些

在中共滅佛的大屠殺、大逮捕、大飢餓中死去的藏人的累累白骨，撫摸那些爲西藏復國而像蒼天的淚雨飄灑在青銅色高原上的斑斑血跡。

三百五十餘萬藏人則從大師的摩頂賜福中，感觸到心靈的慰藉，佛意的慈悲和復國的信念。

西藏千年歷史間，沒有任何一個宗教領袖或者精神導師像十世班禪大師這樣，如此接近普通藏人的靈魂，所以，他在藏人中的威信具有西藏高原的大地和岩石的氣息；藏人把他視爲心靈的守護神。

其二，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對於班禪大師的政治立場，一直懷有深刻的疑慮。

撰寫《七萬言書》和一九六四年萬人傳召法會上公開發出復國的召喚，這兩件事已經奠定了中共元老寡頭集團不信任班禪大師的政治基礎。

在胡耀邦支持下重返政壇之後，班禪大師從來沒有針對達賴喇嘛表達任何不滿或者不敬之意。相反，班禪大師做出巨大努力，試圖強化漂泊海外的

流亡藏人同西藏本土之間的聯繫。

在一次公開會議上，班禪大師說：「我們今天在這裡歡聚一堂的時候，自然想到達賴喇嘛和國外的藏族同胞。他們遠離故國，流落異國，離別同胞，這是任何有愛國之心、有愛民族之心的人所不堪的，作為同一民族的同胞兄弟，我們對他們的這種處境歷來十分關切。特別是對達賴喇嘛本人，由於他和我同是佛門弟子，同是歷史上形成的黃教教主宗喀巴的衣鉢傳承人，是很好的教友，我對他更為關切。」

班禪大師還在其他許多公開和私人的場合，表達過同樣的關切之情。中共及其宣傳機器向來把對流亡藏人和達賴喇嘛的妖魔化作為宣傳的主題之一。班禪大師的上述表態顯然與中共的意志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班禪大師的表態蘊涵的關切之意，同胞之情，教友之誼，毫無疑問強烈震撼了藏人的心。

隨著以班禪大師佛心為源頭的當代藏傳佛教復興運動蓬勃於雪域高原，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期開始，大批藏人捨生忘死，翻越地球上最雄偉的山脈喜馬拉雅，遠赴達蘭薩拉去看望達賴喇嘛和流亡的同胞，從而形成獨特的

人口流動遷徙的奇觀——

爲心靈和同胞之情的原因而翻越雲端之上的生命禁區。

藏人如此作爲，相當程度上是受班禪大師對流亡同胞和達賴喇嘛的情意感召。

上述現象引起中共權貴的極大惶恐。

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都很少有藏人越過雪山，走向達蘭薩拉。這並不是因爲當時邊境管理更嚴格，而是由於中共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以其殘酷的國家恐怖主義暴力和文化謊言，成功撲滅了藏人心靈中的佛燈。

中共切斷境內外藏人血脈聯繫之後，流亡藏人的命運只能趨向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前景——

無源之水勢必乾涸，無本之木怎能避免逐漸枯死的命運？

現在，隨著西藏佛教復興運動的崛起，十世班禪大師又一次點亮了藏人心中禮佛的金燈，因而才出現了成千上萬藏人翻越雪山朝聖的奇觀。

如果說一九五九年藏人離開家園是走上流亡的苦難之路，現在藏人遠赴達蘭薩拉則是走上回歸心靈之路，班禪大師便是照亮回歸心靈之路的明月。

當然，藏人回歸心靈之路上的明月，自然是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政治惡夢，因為，這批骨頭都已經腐臭發霉的唯物主義老朽，天生仇恨對心靈的忠誠；政治本能告訴他們，忠誠於心靈的族群不會甘心做專制權力的奴隸。

令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忌憚的第三個要點在於：

班禪大師推動的佛教復興運動逐漸引發追求西藏自由和西藏復國意志再次崛起的效應。

作為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精神殖民東方的政治代理人，中共強權和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在政治統治風格上有一個基本的分野：

中共強權要將鐵血統治深入到人的心靈，他們認為囚禁心靈是控制人的社會行爲的最根本保證，即要專制世界，必先將人的心靈置於黨文化的絕對控制之下；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在大多數情況下，則只滿足於控制世俗的權力，而把心靈交給各種宗教或者類宗教的文化信仰——

中國古代皇權常在各種宗教和文化信仰前垂下頭顱，中共暴政則直接使

鐵血強權的理論和觀念成爲唯一的文化。

佛教本質上是一種要使心靈得「大自在」，即獲得絕對自由的生命哲學。得「大自在」則必須讓生命擺脫包括權力在內的一切羈絆——

至少在心靈的範疇內是如此。

這樣一來，佛教復興與中共控制人的心靈的天性之間的衝突，就無可避免，不可調和。

中共爲其天性所驅使，必然要把藏人的思想關入黨文化的牢籠；佛教復興則一定要向極權專制者索要心靈的自由。這兩者之間的宿命的衝突果然爆發了。

即使在胡耀邦思想解放的春風浩蕩之時，中共元老寡頭集團也沒有忽視西藏的變化。

據薄一波的警衛參謀透露，一九八六年，面對中共各種情報機關送來的諸多關於西藏佛教復興情況的報告，薄一波痛心疾首，用枯骨般的手連連拍著辦公桌，嘶聲悲歎：「六月飛雪，六月盛夏飛雪呀！我們山西竇娥冤啊，

這一份一份報告就是大雪片。古時候，我們山西出現竇娥冤，才有六月飛雪。現在的六月飛雪，說明必有妖孽禍國——和尚在西藏的影響現在比共產黨都大，長此以往，怎麼得了！」

一九八六年，二十餘名僧人在拉薩和平示威，抗議中共警察當局對寺廟進行特務控制和其他踐踏宗教信仰自由的行爲。中共西藏當局對抗議的僧人實施逮捕和秘密審訊。這是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同中共極權體制之間最初的公開衝突。

事件發生後，薄一波、李先念、陳雲等老政客意識到，一種歷史性的衝突已經拉開序幕。這幾個老政客達成一致之後，由薄一波出面，將當時中共的「駐藏大臣」伍精華【註1】請到家中，密授機宜。

薄一波要求伍精華，再出現僧人「鬧事」的抗議事件，不要急於用立即逮捕的方式處置，而要採取有效措施，激化矛盾，擴大事態，「讓分裂主義分子充分暴露」，然後，再將擴大事態的責任推給「鬧事者」，以便名正言順地進行大規模的嚴厲鎮壓。

薄一波還告訴伍精華一句話：「不採取嚴厲的鎮壓措施，西藏境內的分裂主義勢力就會死灰復燃——這不是我個人的判斷，而是包括李先念、陳雲、宋平等一大批老同志在內的共同意見和憂慮。希望你能為我們黨解憂。」

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並不只是一次單純的宗教運動。藏傳佛教的復興是以對藏人當代苦難命運的深刻反思作為背景，而班禪大師的《七萬言書》乃是西藏苦難命運反思的起點；班禪大師發出的「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的悲音，就迴蕩在藏人對於民族苦難命運反思的過程始終。

這種在腥風血雨中行進的反思，必然要以追尋苦難的根源作依歸。

藏人當代苦難的源頭，就在於中共暴政，就在於藏人把打開國門的鑰匙拱手交給中共暴政，就在於藏人試圖用主權換和平，結果換來了滅教之苦，滅族之難。

所以，以民族苦難的反思為基礎，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會合乎邏輯地導向西藏復國意識；國亡，必然導致滅教滅族的大劫難——

這是藏人歷史性反思的結論。

正由於這個原因，藏人抗議中共宗教壓制政策的活動中，作為復國意志象徵的「雪山獅子旗」，才會重新迎風飄揚。

一九八七年三月上旬，藏人一九五九全民大起義的紀念日前後，各藏區出現抗議示威活動。

伍精華遵照薄一波密授的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意旨，指示軍警對示威者謾罵挑釁，繼而開槍射擊，激起民憤，擴大事態。然後，當局動用軍警，以制止「民族分裂主義的暴亂」為藉口，對和平抗議的僧人和普通藏人進行血腥鎮壓。

藏人為自由而湧流的血，又一次染紅了瑩白的雪山，燒裂了鐵黑色的岩石。

鎮壓之後，西藏中共當局宣稱，是為制止抗議者的恐怖主義暴力行為，軍警才不得不進行正當防衛。當時，班禪大師也透過藏人的途徑，及時瞭解到事情真相。他對中共西藏當局的虛假指控提出強烈質疑。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小組會議上，班禪大師

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在青海聽到黨內文件上說，『要挑起叛亂、壓出叛亂，然後在平叛過程中，徹底解決宗教和民族問題。』」

班禪此時說出上述歷史的記憶，等於明白地告訴人們，一九八七年中共當局又一次重複歷史上的罪惡陰謀，即主動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為血腥鎮壓製造藉口，以便在鎮壓過程中「徹底解決宗教和民族問題」。

按照中共的政治邏輯，這裡所謂的「徹底解決宗教和民族問題」，就是運用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在藏區滅佛，並對反抗的藏人實施種族滅絕性屠殺。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雖然在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發動的宮廷政變中失勢，但是，他的開明政策所推動的歷史邏輯仍在慣性中運行，他所開創的思想自由的春天，還在等待一次掃蕩東亞大陸的血雨腥風的摧殘，然後才會凋殘。

另外，十世班禪大師本人有「國家領導人」的頭銜，他在秦城監獄的難友萬里等人還居於權力中心，所有這一切決定了，當時班禪大師在西藏上問題仍然有一定的發言權。

他力主對一九八七年藏區「大動亂」的真實原因進行調查。

調查過程中，西藏當局主政者試圖用變造過的「動亂」現場錄影進行欺騙；班禪大師發現後，奮大威德金剛的衝天之怒，於深夜用巨靈之掌，敲開中共駐藏大臣伍精華的家門，迫使其不得不交出原始錄影帶，而原始錄影證明，是中共軍警首先謾罵尋釁，開槍射擊，才使矛盾激化，事態突變。

班禪大師所作的巨大努力，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一九八七年中共大屠殺之後的大逮捕的範圍，阻遏了中共當局對參與抗爭的藏人實施「秋後算賬」式的司法大迫害的企圖。

面對胡耀邦失勢的險惡局面，班禪大師仍然在可能的範圍內成功拯救了一批勇敢的藏人免於牢獄之災，但是，他本人卻因此引起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深刻忌憚，甚至仇恨。

在一次元老的聚會上，李先念的一段話典型地講出了這批老政客的心思，他說：「這個班禪要調查真相。什麼叫真相？真相也是有立場的。他是站在民族分裂主義的立場上，站在暴亂份子的立場上調查真相。他的所謂真相，是為民族分裂主義張目。如果任由他繼續肆無忌憚，胡作非為下去，西藏

是要被他再次搞亂的。」

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忌憚班禪大師的第四個要點在於，班禪大師積極為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尋找和建立不受中共當局控制的獨立的經濟基礎。

中共是卑俗的唯物主義者，相信經濟決定論，相信人的意識由物質基礎宿命地決定。所以，中共對人的精神進行絕對控制的同時，向來沒有忽視對人的經濟控制。

宗教是中共實施精神和經濟雙重控制的典型領域，而中共透過建立「三自」教會控制基督徒，則是其統治術的經典表現。

自治、自傳、自養的原則是當代中國基督教「三自教會」名稱的由來。

無論歷史上「三自」原則曾經有過怎樣的涵義，在當代中國，所謂「自治」，就意味著基督教會組織上由中共全面控制；所謂「自傳」，就意味著基督教會在政治和思想上由中共全面控制；所謂「自養」，則意味著經濟上

基督教會完全依靠中共的支持。

在「自養」原則之下，甚至教職人員的薪資亦由中共國庫撥付，而且，薪資等級是依照政府行政官員的等級來確定。可見，「自養」原則的實質，就是使基督教變成中共包養的「宗教二奶」和「政治小三」；經濟上不得不向強權乞食，宗教又怎麼可能具有獨立於強權的信仰自由。

顯然是為讓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插上自由奮飛的翅膀，免於淪為中共政治烏籠中的寵物的命運，擺脫對中共的經濟依賴——依賴就是被控制；班禪大師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期之後，便極為關注為西藏佛教和文化復興奠定獨立經濟基礎的事業。

在班禪大師主持之下，一九八七年四月正式籌備成立《援藏發展基金會》
《》，班禪自任理事長。

《援藏發展基金會》性質上是非官方、非營利的民間組織；其宗旨是援助各藏區的佛教、文化、教育、醫療、人道救助等事業。

尤其值得關注之處在於，這個基金會預設的資金來源包括國際友人、國際組織、外國政府，以及海外藏人。

從其預設的資金來源不僅可以明確看出擺脫中共經濟鐵手控制的意圖，而且也可以意識到同海外藏人流亡社區建立經濟聯繫的願望。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剛堅發展總公司》在日喀則舉行成立儀式。班禪大師蒞臨致開幕詞；開幕詞表明，剛堅公司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在於全面支持西藏文化發展和佛教復興。

在班禪大師入滅之前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剛堅發展總公司》的子公司就相繼在日喀則、拉薩、樟木口岸、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尼泊爾、瑞士等地區和國家成立；一個藏傳佛教復興運動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的獨立的經濟基礎，隱然成形，呼之欲出。

班禪大師所作的一切都是陽光下的行爲，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卻躲在厚厚的窗簾後面，時時窺視班禪大師的一舉一動；各種情報單位秘密收集提交的社會情況簡報，就是這群老政客進行偷窺的陰森冷血的眼睛。

薄一波將班禪大師爲佛教復興和西藏文化復興創建獨立經濟基礎的努力，視爲對中共統治西藏的重大政治威脅。他專門爲此拜訪陳雲，並對陳雲說

：「有人講你提出『鳥籠經濟』的目的，是要搞『鳥籠政治』。這些人講的都沒錯。我們共產黨當然要有自己的政治規矩。現在，班禪想要先飛出『經濟鳥籠』，然後再飛出『政治鳥籠』。我看這個『胖和尚』居心叵測。」

陳雲當時回答：「樹欲靜而風不止。現在不是我們逼班禪，而是班禪在逼我們。這種被動局面，是耀邦長期縱容自由化思潮氾濫的一個惡果。」

從這兩個老政客的上述對話中，已經可以感到濃重的殺氣。

班禪大師引起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極度忌憚的第五個問題在於，班禪大師的社會關懷超出藏區和佛教的範圍。

「文化大革命」內蒙古實施軍事管制期間，中共當局對蒙古人進行種族滅絕式的大迫害，十萬蒙古人死於冤獄，蒙古的政治、文化精英幾乎被斬盡殺絕。

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大良知者胡耀邦主政後，也在內蒙古推行開明政策，但是，內蒙古卻沒有形成像西藏那樣的民族文化復興和宗教復興運動。

這意味著蒙古人失去了這次從靈魂和文化的意義上拯救民族生存權的歷史機遇。

之所以如此，基本原因之一，就在於蒙古人的領袖烏蘭夫首先是一個共產黨官僚，其次才是蒙古人；蒙古人缺乏一位像班禪大師那樣的精神導師，宗教領袖——

蒙古人沒有一尊屬於自己命運的佛。

不過，班禪大師仍然對蒙古的文化和宗教復興表達了真誠的關懷。內蒙古各地藏傳佛教寺廟的重建和佛經的整理修繕活動，都得到班禪大師直接而具體的支持。

另外，班禪大師還展現出超越宗教門戶之見的大慈悲胸懷，多次為受到嚴重摧殘的伊斯蘭教的恢復，提供有效的實際幫助。

班禪大師的這些作為，令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

這批老奸巨滑的中共政客十分清楚，如果以班禪大師為核心，形成各個少數民族和各種宗教聯合爭取民族復興和宗教自由的運動，中共的極權專制政治，以及國家權力的中共官僚家族私有制，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危機。

胡耀邦遭到整肅之後，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同班禪大師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迅速接近爆發的臨界點。

這種矛盾本質上是共產黨的文化性種族滅絕的天性，同藏傳佛教復興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之間的宿命的衝突。

一九八七年秋天，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初步作出不惜用特別方式解決班禪問題的政治決策；所謂「特別方式」，即殺佛——

謀害班禪大師！

在一次宮廷政變式的中共內部會議上逼迫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位——這個事件是一個分界；事件之後實際形成了元老寡頭集團主宰中共最高權力意志的局面，中共黨章所規定的決策機構政治局，以及中共總書記，相當程度上都變成了橡皮圖章。

這個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主要成員包括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

、彭真【註2】、王震【註3】、楊尚昆【註4】、宋平【註5】等人。

用鄧小平的話講：「我們中間有軍委主席、國家主席、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和顧問委員會主任，有老資格的黨中央常委；我們當然有資格、有能力在特殊時期和特殊情況下，為我們黨把握大方向。這個資格和能力是歷史形成的，是歷史的結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在鄧小平居所的客廳裡，根據李先念和薄一波提議，召開了一次專門研究西藏問題的會議。會議的參加者計有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宋平。當時王震由於健康原因，楊尚昆和彭真忙於處理其他問題，均未出席這次會議。

與會的中共元老幾乎無一例外，認為班禪大師一九八〇年以來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已經超過中共的政治底線，嚴重動搖了西藏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必須加以處理。

李先念、薄一波提出，由於胡耀邦放縱自由化思潮的政策造成的惡果，分裂主義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在西藏已經死灰復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採取常規的撤職、批判、軟禁等手段處理班禪大師，很可能引發西藏自治區和

其他藏區大規模的社會動亂，甚至暴亂，因此，當務之急是要作出對班禪實施「特別處置」的預案，以備不時之需。

鄧小平最後發言，為這次會議作出原則結論。

鄧小平發言的要點如下：

一、西藏問題有複雜的國際背景；對於中國，在政治穩定的意義上，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區。所以，西藏必須保持穩定，對一切動亂的苗頭，都要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加以處置；如果出現警察力量不足以應付的局面，必要時，應當毫不手軟地動用軍隊力量。

二、對班禪要採取最後的挽救措施，派專人對班禪作思想工作，要求他懸崖勒馬，回到黨和國家的立場上來。

班禪對此可能有三種反應：其一，接受警告勸誡，放棄在西藏推行宗教自由化的活動；其二，陽奉陰違，口頭接受勸告，有一定收斂，實際上繼續我行我素；其三，拒絕勸誡，採取對抗態度，毫無悔改之意，反而變本加厲，在原来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鄧小平特別指出，根據班禪的個性和行事風格，他持第三種態度的可能

性極大。

三、鑒於對班禪可能的基本態度的判斷，需要儘快著手籌劃對班禪的「特別處置方案」。

鄧小平強調，參與「特別處置方案」的設計人員，必須有「堅強的黨性」，對黨絕對忠誠，同時，還要具備高度智慧和策略感；對班禪實施「特別處置」之後，不僅要消除一切可能引起懷疑的痕跡，以徹底杜絕引發藏人動亂的一切可能性，而且在班禪死後，也要繼續利用他在藏人中的聲望，維護西藏的穩定，增強中共在藏區的政治威信——

鄧小平特別冷冷地說出一句話：「這也叫作廢物利用吧。」

據一位擔任這次決策殺佛會議的服務工作的人士回憶，那一天北京秋空現出少有的碧藍，藍得讓人心疼；鄧小平居所的庭院中，松柏墨綠，修竹淺黃，金菊燦爛，詩意盎然，一片祥和，唯有幾枚秋葉，色澤猩紅，彷彿要滲出血來。

「難道，這就是佛血的顏色？」——

殺佛

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那位人士當時望著紅葉，不禁如是想。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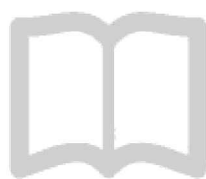
【註1】伍精華（一九三一年～二〇〇七年），彝族，四川省冕寧縣人。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西藏軍區政委、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等職。

【註2】彭真（一九〇二年～一九九七年），原名傅懋恭，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等職。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註3】王震（一九〇八年～一九九三年），曾用名正林、建成，湖南省瀏陽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上將。中共建政後，王震長期主政新疆。曾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常委、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等職務。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註 4】楊尚昆（一九〇七年～一九九八年），四川潼南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註 5】宋平（一九一七年～），原名宋延平，山東莒縣大羅莊人，清華大學化學系畢業。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成員，中國共產黨前高級領導人。



第六章

準備殺佛

——鬼影幢幢，陰謀如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決策殺佛會議」之後不久，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就確定了兩名主持執行「特別處置班禪方案」的人員，即溫家寶和胡錦濤。

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

眾所周知，中共中央有兩個重要的執行機構，一是中央辦公廳，一是中央書記處；其中中央辦公廳還擔負包括班禪大師在內的所謂「國家領導人」的安全警衛之責。

溫家寶的職位則橫跨中共中央兩大執行機構。

他既能以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位監督，甚至控制中共高級官員的行動，又能透過中央書記處即時瞭解到中共政治局的動態——

雖然當時只是候補書記，但並不妨礙他在書記處裡發揮實際作用。

不過，溫家寶之所以能得到元老寡頭集團的信任，主要並非由於他身處權力的中樞，而是因為他的虛偽卑鄙的人格。

溫家寶平民出身，其祖上按照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應該屬於「政治賤民」之類。然而，他卻能出人頭地，平步青雲，進入權力中樞。這除了靠他善於

察言觀色、巧言令色、投人所好的小聰明之外，主要是胡耀邦對其青眼有加，大力提攜的結果。

溫家寶本是一個靠閹人之術、太監之才，以求富貴，以搏虛名的猥瑣小政客，但是，鼠輩也自有其過人的機敏之處。

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元老發起對胡耀邦的整肅。溫家寶立刻意識到，權力的天平不會向總書記胡耀邦一邊傾斜。於是，他當機立斷，背叛對他有提攜之深情、擢拔之大恩的胡耀邦，徹底投靠元老權貴。

當時，元老權貴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針對胡耀邦的逼宮會議，溫家寶便按照鄧小平、薄一波的授意，利用中央辦公廳主任之權，藉加強會議警衛為名，實際完全切斷了胡耀邦對外聯絡的可能性。

事後，有人指責胡耀邦面對元老權貴的宮廷政變表現得過於軟弱。不過，這種指責是基於不瞭解具體情況。

無論對日作戰時期，還是國共內戰時期，胡耀邦都曾經是叱詫風雲的將軍，其個性自有剛烈果決、勇敢無畏的英雄之風。只是溫家寶的卑鄙背叛，出乎胡耀邦的意料之外，正所謂君子可欺之以方；形格勢禁之下，胡耀邦雖

有心殺賊，卻又奈無力回天何——

此可爲英雄一嘆。

有一位「太子黨」成員曾經向鄧小平女兒鄧榕質疑過溫家寶的人格，說溫家寶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無情無義，他可以背叛對他有天恩的胡耀邦，他將來就有可能背叛任何人。

鄧榕用此言提醒其父，不可過於信任溫家寶。

據鄧榕轉述，當時鄧小平這樣回答她：「溫家寶值得信賴，是因為他只對強勢者忠誠。只要我們保持強勢，他的忠誠就不會有問題。這種對強勢的忠誠，才是人性裡邊最值得信賴的。」

「至於情誼、義氣這類東西，那才是最靠不住的。假如有一天我們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又失勢了，就一切都不必說了。那種情況下，狗都會背叛，何況人呢。」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鄧小平客廳裡召開的那次「決策殺佛會議」過程中

，與會者僅憑藉老政客的陰謀政治本能，就已經在對班禪大師進行「特別處置」的地點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即爲了「避嫌」，絕不能在北京或者中原地區實施「特別處置」。

「特別處置」的地點應當選在西藏，最好在班禪歷史上傳統的駐錫地，日喀則。

這樣一來，除了要在中央確定一個「特別處置」的主持執行人之外，還需要向西藏派遣一名值得信賴的人，在第一線負責主持「特別處置」方案的執行。

在此情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元老宋平向鄧小平推薦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胡錦濤，出任西藏自治區書記。

宋平與胡錦濤之間有忘年之交，宋平甚至常常對胡錦濤顯示出舔犢之情。中共官場中傳言，胡錦濤能贏得宋平之心，皆因其服侍宋平，如勾踐之於夫差，舔痔吮疽，無所不至，侍病嚙糞，孝逾兒孫。

當然，其中曲折隱晦之情究竟如何，唯有「天知道」。

宋平向鄧小平介紹胡錦濤時，稱其「厚重老成，謙遜謹慎，黨性堅強；

關鍵時刻又勇於任事。」

宋平在此事上力薦胡錦濤完全出於對他的關愛之情。

宋平深知，作爲一介平民而非「太子黨」成員，胡錦濤官至中共省委書記已是難能可貴；中共官場乃黑暗叢林，處處坎坷，步步艱難，危機四伏，胡錦濤若想在凶險萬端的權力鬥爭中出類拔萃，再上層樓，甚至問鼎中央，則必須爲中共立下其他人所不能爲的奇功。

在宋平這類不信鬼神、不敬天地的馬克思唯物主義老政客看來，主持執行對班禪的「特別處置」，不僅不意味著殺佛的大惡重罪，反而是爲鞏固中共統治立下奇功一件；有此奇功大助在身，胡錦濤在仕途中定能青雲直上。

確定溫家寶和胡錦濤作爲具體主持執行「特別處置班禪方案」的人選之後，鄧小平在北京居室的客廳裡專門接見他們；時間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下旬，陪同接見的還有陳雲、李先念和薄一波。

接見之前，鄧小平辦公室負責人王瑞林先向溫家寶和胡錦濤通報了上次「決策殺佛會議」的內容。

鄧小平深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行」之道，所以，鄧小平在這次接見中的發言內容，主要集中在為實施對班禪的「特別處置」決策過程的「合法性」正名的議題上。

就是在這次發言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概念；他自詡是「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並將元老寡頭集團的成員稱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鄧小平對溫家寶和胡錦濤說：「現在出現了總書記支持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耀邦雖然主動辭職，但思想認識還不合格；部分政治局委員，比如胡啓立等一些，思想認識也還沒有提高。這種情況下，我們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就要站出來，負責掌握黨和國家發展的大方向，起到決策作用。」

「西藏問題背景複雜，無論對於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都很敏感，西藏絕不允許發生大的動亂。必要時對班禪執行『特別處置』的決策，是在特殊情況下，為維護西藏穩定的大局，由黨內第二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共同作出的。」

「既然叫作『特別處置』，就要按照特別方式和特別程序來執行。」

「你們在執行過程中，不必向政治局和書記處匯報；要儘可能縮小知情人的範圍。具體問題你們直接向先念同志、薄一波同志請示匯報；關鍵問題上直接對我負責。」

根據上述鄧小平就「特別處置」班禪所確定的行事風格，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黑手黨化，從此之後將公行無忌，荼毒萬民。

鄧小平家族就有黑社會的基因，現在，黑社會的基因將透過鄧小平，這個所謂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爲當代中國的政治癌症。

在這次接見中，陳雲發表的意見體現了中共元老寡頭集團關於西藏的戰略思考。他的意見可以採用大多數讀者都易於理解的方式，表述如下：

其一，西藏是處於中國國家發展的戰略中心的省區之一，西藏的命運和前途關係到中共的根本和核心的利益。

中共在西藏面對的最主要的挑戰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宗教問題。如果不能在宗教問題上作出有利於中共的安排，西藏的穩定就沒有真正

的保障；即使能夠保持一時的穩定，不穩定的因素終究也會透過各種形式爆發出來，威脅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基礎。

其二，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透過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輔之以必要的政治和軍事手段，中共基本解決了西藏的宗教問題，從而也就隨之基本解決了西藏境內的分裂主義問題。

但是，由於胡耀邦推行近十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政策，現在，宗教勢力不僅重新抬頭，而且開始大規模反撲。

一九八七年發生的藏區大動亂就是一個嚴重的警訊。動亂中，各地都出現「雪山獅子旗」，這證明宗教勢力的重新抬頭和分裂主義勢力的死灰復燃是一體兩面。

在西藏宗教勢力全面回潮的問題上，班禪起到了「關鍵性的極壞的作用」。

其三，由於國際和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共已經不可能再像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那樣，採用直接消滅佛教的方式來解決西藏問題。現在，必須運用具備充分政治策略的智慧，針對實際情況，來制定和執行相

應的政策；要找到解決問題的「支點」，要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而不能像過去那樣「只發蠻力」。

其四，要想找到解決西藏問題的「支點」，以便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其實很簡單，只需要清楚理解一個有關西藏問題的基本規律，即西藏一切政治問題的要害在於宗教；西藏宗教問題的要害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這兩個所謂宗教領袖。

這也是這次黨內「老同志」一致決策，要及時對班禪進行「特別處置」的根本原因。

達賴喇嘛流亡在外，中共鞭長莫及，但今後時機成熟時也要加以處置，現在，對班禪的處置必須果斷、及時，因為，任他繼續「倒行逆施」，西藏佛教回潮的趨勢將一發不可收拾。

其五，「特別處置」不僅是針對十世班禪本人的，更要從根本上一勞永逸地解決「班禪」這個宗教概念的問題。

在設計「特別處置方案」時，就要思考如何牢牢把握十世班禪之後的轉世靈童的認定過程；認定轉世靈童的決定權必須由「中央政府」掌握，而不

能由喇嘛們左右，更不能讓「達賴集團」有置喙的餘地。

只有從十一世班禪起，把此後的歷代班禪都培養成中共的堅定支持者，才是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高超的策略。

根據上述對陳雲談話內容的整理摘要，至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其一，中央權貴階層明確認定，十世班禪大師是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復國運動的精神領袖與啓蒙者，因而必欲除之而後快。

其二，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政治陰謀的殘酷冷血，令鐵石之心都會不寒而慄，他們並不滿足於用十世班禪的佛血染紅歷史，他們還要滅絕「班禪」這個神聖的宗教概念的佛魂——

他們要讓班禪的佛魂湮滅於鐵幕的黑暗中，他們要把此後歷代班禪都變成替中共這隻政治惡虎服務的佞鬼，即他們妄圖使「爲虎作倀」這句成語的意境變爲可悲的現實。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是最得毛澤東之寵的佞臣之一。

毛澤東死後，李先念意識到被毛澤東放逐的中共老權貴勢將捲土重來，才一定程度上參與宮廷政變，支持逮捕以毛澤東夫人為政治象徵的「文化大革命」新權貴。

這種在關鍵時刻表現出的對自己的歷史和毛澤東的背叛，又使李先念成為毛澤東之後的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成員之一——

卑鄙的人格和背叛，常是打開專制權力之門的鑰匙。

正由於李先念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所以，他對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在西藏實施的斬盡殺絕、斬草除根式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沒有任何反思。相反，李先念對於胡耀邦推行的為西藏帶來生機的開明政策，以及班禪大師復興佛教和西藏文化的努力卻深惡痛絕。

當時李先念是中國國家主席。

在這次接見過程中，李先念除了發洩對胡耀邦的強烈不滿，以及對班禪大師的深刻仇恨之外，只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即以中共元老的身份，對溫家寶和胡錦濤作出一個承諾。

他說：「我們黨歷史上冤枉過、委屈過一些功臣。但是，現在情況不同

了，只要我們這些老同志還在，就一定要做到『功過分明，有過必罰，有功必獎』。希望你們能夠圓滿完成對十世班禪的『特別處置』任務，也要成功完成班禪靈童的尋找和十一世班禪的認定的任務。

「這兩項任務關係到西藏的長治久安，關係到新形勢下是否能徹底消除分裂主義的危險，因此意義重大。

「完成好這兩項任務，你們就為黨立下奇功一件，大功一件。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為黨分憂的同志，一定會得到黨的信任，今後，黨也一定會對這樣的同志委以重任。

「今年初，我們解決耀邦同志的問題時，溫家寶就表現很好，和黨和老同志站在了一起，所以，溫家寶你是經過一定考驗的，是可以信賴的。錦濤是宋平同志推薦的，相信也一定有堅強的黨性。

「總之，希望你們謹慎果斷，出色完成任務，不要辜負黨對你們的信任，也不要辜負這次對你們個人前途十分重要，十分難得的機會。」

經過我們多方調查，從知情的「太子黨」成員到相關的工作人員，都印

證了這次接見過程中上述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的談話內容。

當我們審視上述表面看來似乎缺乏密切邏輯聯繫的談話內容過程中，一張鐵網卻漸漸浮現出來——

這是一張要捕捉人性弱點的網。

這張鐵網也告訴我們，鄧小平、陳雲、李先念，這三個中共老政客看似隨機性表述個人觀念的談話，實際上是在一個經過極其縝密的籌劃之後形成的意見體系，而且縝密得不動聲色，不露任何斧鑿的痕跡；三個人互相之間的配合真可謂天衣無縫，渾然天成。

中共老政客之重重機心，詭譎萬端，神鬼莫測。

鄧小平等人毫無疑問極其清楚，他們要求溫家寶和胡錦濤主持執行的，實質上是一次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政治謀殺，是一種具有政治黑手黨風格的犯罪，而且不僅如此——

由於謀殺的對象是十世班禪大師，主持執行者要首先面對「殺佛」的歷史罪名。

因此之故，溫家寶、胡錦濤將可能承受重大心理壓力。

鄧小平等人深知，要想讓溫家寶、胡錦濤積極主動、高效完滿地執行對班禪的「特別處置」，就必須幫助他們卸下心理負擔。接見過程中，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談話的順序和內容，都是為消除溫家寶、胡錦濤的心理壓力而設計的。

首先，鄧小平說明，這次政治謀殺雖然不是由政治局確定，但卻是「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共同決策，因此有「組織上」的合法性，而且是最高的合法性。

這一點對共產黨官員很重要——

他們實施的任何罪惡，只要獲得「組織上」的合法性，就意味著中共將以整個組織的名義，承擔所有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後果。

其次，陳雲從維護中共政權的整體戰略的高度論證問題，為這次以殺佛為目的的政治謀殺塗上了神聖的色彩——

對於共產黨官員，維護中共政權是最「神聖」的事業，而人性最可鄙的偽善之處則在於，只要為自己找到一個「神聖」的藉口，便可以盡情展現隱藏在本能深處的獸性。

再次，李先念則直截了當地拋出一個誘惑：只要為鞏固共產黨對西藏的統治秩序，完成這次至關重要的政治謀殺，他們就能夠得到中共的獎賞，即掌握更大的權力——

馬克思曾有言，資本家會爲了十倍的利潤而瘋狂；馬克思的信徒中共狗官，則可以爲了權力而瘋狂，因爲，資本家的圖騰是金錢，專制狗官的圖騰是權力。

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精心設計這次接見要達到的主要目的，就是充分利用人性的弱點，透過「思想工作」，使溫家寶、胡錦濤死心塌地完成對班禪大師的政治謀殺。

中共元老政客們捕捉人性弱點之網的最後一個網結，是由薄一波來編織的。

鄧小平爲這次黑手黨式的政治謀殺確定中共組織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陳雲賦與殺佛之罪以神聖的光環，李先念捧出權力的誘惑，最後則由薄一波提出懲罰的威脅。

薄一波對溫家寶、胡錦濤說：「此次『特別處置』行動，意義重大，可同我黨歷史上對顧順章的特別處置相比。所以，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什麼叫失敗？執行過程中有任何一點兒洩密的情況，就等於失敗。

「你們要精心策劃，謹慎執行，不得有一絲疏失，要做到萬無一失。一旦出現失誤，你們就將承擔重大的，或者說不可原諒的政治責任，而且要受到嚴厲處罰。」

誘導與告誡齊飛，獎賞與懲罰備至，誘惑與威脅並陳——

中共元老政客為收買溫家寶、胡錦濤之心，為其所用，可謂殫精竭慮，煞費苦心。不過，如果說這些詭詐的老政客有什麼失誤的話，那就是他們對新一代中共官員的卑鄙與陰毒冷血的程度估計不足，或者說他們過高估計了新一代中共官員心中殘存的人性和良知。

這次接見，是溫家寶和胡錦濤第一次知道，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已經決策謀殺班禪大師，並確定由他們兩個人負責主持和執行。同時，薄一波還明確要求，責成他們應當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完成對班禪大師的「特別處置」；

理由在於西藏局勢變化很快，如果繼續拖下去，班禪大師的活動很可能引發中共在西藏統治的更大危機——

用薄一波的原話來講，叫作「形勢逼人，時不我待」。

從接見過過程中的表現來看，溫家寶和胡錦濤沒有任何震驚畏難或者猶豫惶恐的反應，相反，他們不僅表示感謝黨的信任，誓言堅決完成黨交付的重任，而且迅速進入情況，當場就極其冷靜地提出一些相關建議，冷靜得好像他們的心是一塊布滿血鏽和寒霜的黑石。

溫家寶提出，既然一年左右時間之內就要完成「特別處置」，那麼，從現在開始，就應當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輿論準備，即透過中共控制的國內外的所有媒體，用生動有效的方式，廣泛傳播「十世班禪大師同我黨同心同德，堅決反對分裂主義」的信息，而且越臨近「特別處置」的時間點，越要強化這方面的輿論宣傳。

溫家寶向中共元老說明，這種輿論宣傳能夠起到兩個方面的作用：

第一，可以有效掩護「特別處置」行動，徹底消除班禪是死於中共謀殺的懷疑出現的可能。

第二，能夠進一步激起流亡的「達賴集團」對十世班禪的忌恨，有利於分化境內外藏人的關係，並且有利於減弱班禪死後的國際反應，降低對班禪轉世靈童的國際關注程度，便於中共控制第十一世班禪的確認過程。

溫家寶的提議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讚賞，他誇獎溫家寶「思維縝密，細緻入微，有高度的策略感，可堪大用」。還意猶未盡地加了一句「後生可畏」。同時，基於溫家寶的建議，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決定，在實施「特別處置方案」和其後認定班禪靈童的整個過程中，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西藏問題的宣傳報導，事先都要徵求溫家寶的意見。

當時中共宣傳部長王忍之開始還認為溫家寶沒有資格過問宣傳部的工作，直到被鄧小平找去談過一次話之後，才不得不執行上述中共元老的決定。不過，其後王忍之還是忍不住對這件事不滿，對其秘書講：「溫家寶不知道替老鄧幹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老鄧才給他干涉中宣部工作的特權。」

在這次接見中，胡錦濤表現出的冷靜和思維敏捷程度，與溫家寶相比不僅不遑多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錦濤首先談到協助執行「特別處置」行動的人選問題。

這這個問題上，他提出三個原則：

第一，「特別處置」行動成敗的標準首在保密，所以，協助執行人員的範圍要嚴格限制，知情人要越少越好；保密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杜絕一切不必要的知情人。

第二，根據他在共青團中央任職時同藏族幹部接觸的經驗，幾乎每個藏族幹部心底裡都或多或少有宗教情結；此次行動的對象又是宗教的象徵性人物十世班禪，所以，協助執行的人員不能從藏族幹部中選擇，而無論其在過去日常工作中表現出多麼強的黨性。

第三，協助執行人員從漢族幹部中選擇，但是，不能選擇長期在西藏工作的幹部。理由在於，他們雖然熟悉西藏情況，卻也同藏人建立了千絲萬縷的感情或者利益的聯繫；這種聯繫，不利於保密。所以，要從新近援藏的幹部中選擇協助執行人員；其在西藏的工作經歷最好不要超過五年。

鄧小平表示，在選擇協助執行人員的問題上，胡錦濤考慮得很全面，「方方面面都考慮到了」，並充分授權，由胡錦濤和溫家寶確定協助執行人員

的具體人選。

陳雲只意味深長地提醒：「這是一次性質特殊的任務。和這次任務相應，你們選擇協助執行人員時，要注意古人先賢總結的一條用人原則，『賤者貴之，貧者富之』。」

陳雲提到的「賤者貴之，貧者富之」的原則的基本涵義是，為驅使人效死命去做某些卑鄙或者危險的事情，就要用榮華富貴去收買地位卑賤、身家貧窮之人——

這並非相信被收買者對收買者的感恩之意，因為，貧賤者大多心懷對命運的憤懣怨恨，不會有真正的感恩之意，而是相信貧賤者對於榮華富貴的渴望和忠誠。

事實證明，胡錦濤後來確實把陳雲提出的這個用人原則奉為圭臬。

這次接見中，胡錦濤還建議，他擔任中共西藏書記的實際交接工作要儘快開始，但是，這項任命公開宣布的時間點則應當推遲，即公開宣布任命的時間距離執行「特別處置方案」的時間點要比較接近。這樣做，有利於消除對他的任命和班禪大師之死間的關係的聯想，即表明對他的任命不是為了完

成一件深思熟慮、長時間策劃的陰謀。

正是根據這個建議，胡錦濤實際在一九八八年初就已經開始主持中共西藏的黨委工作，但是，直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離謀殺班禪大師不到兩個月，才正式宣布胡錦濤擔任西藏黨委書記的任命。

這次接見過後，胡錦濤很快就遵循「賤者貴之」的原則，首先確定胡春華作為協助執行「特別處置方案」的關鍵性人員之一。

胡春華原係湖北偏僻縣分的一介草民，後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

一九八三年畢業後，主動要求到西藏工作。

生活在中原或者東南沿海的繁華之地的人們心目中，西藏乃是邊遠荒蠻的苦寒之地。名牌大學畢業生，特別是有「中國最高學府」之譽的北京大學的學生，更是自視為天之驕子，很少有人會選擇把命運同西藏聯繫在一起。

畢業後，願意遠赴西藏工作的人，一般可分為兩類：

一類是少年之心未泯，仍然活在詩意之夢中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想要遠離庸俗的都市生活，到離蒼天最近的地方，去尋找心靈的歸宿。

不過此類人很少——現代本就是一個背叛心靈、不相信理想的時代。

另一類則屬於極端功利主義的一群。

這類人或出身於城市貧民，或來自於被城裡人視為賤民的農民家庭。正由於出身貧賤，許多人對於權貴充滿豔羨渴慕之情，心中燃燒著進入權力體系，以改變家庭賤民命運的勃勃野心。

這類人深知，受自己出身的社會背景的限制，他們如果身處大都市或者東南形勝繁華之地，在仕途上官場中，根本沒有能力同中共「幹部子弟」進行「公平」競爭，更遑論同「太子黨」爭鋒。只有遠赴中共權貴階層子弟不願去的天際之外、雲端之上的「荒蠻之地」，他們才能找到迅速進入權力體系的機會。

胡春華恰好應當歸類為上述極端功利主義者的一群。

西藏地勢高亢，藏人則是高原的選民——

從解剖學的角度來看，藏人的心臟比低地的人要大一些，形態也更豐滿，因而適於在氧氣較為稀薄的高原生活。

西藏高原的很多地方，漢人或者其他低地的人生理上不可能真正適應，一般生活八年左右，就會罹患心臟病。這樣一來，為絕對控制西藏，中共需要不斷更換從低地赴西藏的官員，以保證西藏官員中有足夠比例的漢族官員。所以，中共當局很重視每年進藏的大學畢業生。

共青團分管包括大學生在內的青年工作，所以，動員和挑選大學畢業生赴藏就成為共青團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九八三年，胡錦濤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同年，胡春華北京大學畢業，自願赴西藏工作。於是，胡錦濤和胡春華，這兩個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命運，就在一九八三年第一次發生了關係：胡錦濤在北京接見自願去西藏工作的大學畢業生；胡春華則作為赴藏畢業生代表，在盛大的進藏誓師大會上發言。

凡是瞭解當代中國政治邏輯的人都清楚，胡春華這類功利主義者胸膛裡只跳盪著對權力的野心，而且那種野心熾烈得能燒紅頑石。然而，在大會發言過程中，胡春華竟然淚水盈眶，表現得像一個「願為建設西藏而貢獻一切」的理想主義者。

或許正是由於這種出神入化的虛偽的能力，胡春華當時就受到胡錦濤的讚賞，並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真可謂「惺惺相惜」一說，不僅適用於英雄，也適用於虛偽者——

胡錦濤走上中共權力之巔過程中，就是一個內心陰狠而臉上永遠帶著溫柔之笑的虛偽者。

此次接受中共元老寡頭集團下達的殺佛重任之後，胡錦濤首先想到的就是胡春華。

經過包括胡錦濤親自和胡春華談話在內的嚴格考察之後，胡錦濤正式選擇他，作為對班禪實施「特別處置方案」的成員。當時，胡春華任拉薩「西藏飯店」的人事經理，在中共官場上，這是一個「沒有出息」、前途黯淡的職位；用胡春華自嘲的話講：「我混成了一個高級跑堂的。」

經胡錦濤幕後推薦，胡春華很快轉任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副書記，並擔任胡錦濤的聯絡員，而他當時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實施「特別處置方案」，協調西藏各方面相關工作。

一九八八年初，溫家寶和胡錦濤經研究確定，用毒藥造成突發性疾病死亡的方式，實施對班禪大師的「特別處置」。

經鄧小平和薄一波同意上述殺佛的方式之後，溫家寶推薦王敏清【註1】參與方案的執行，其理由有下列三項：

其一，王敏清任中央保健局局長，專職負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日常保健和緊急搶救，既然決定用毒，王敏清所處的職位和專業知識就可以起到關鍵作用。

其二，溫家寶強調，「這一點最重要」——

鄧小平一九六二年就親自選擇王敏清做他的保健醫生，即從歷史淵源來看，王敏清就深得鄧小平信任，因此政治上完全可靠。

其三，王敏清經過黨的長期考驗。

對於第三點，溫家寶語焉不詳，未加解釋，不過胡錦濤已經心領神會。

王敏清被稱爲「紅色御醫」，深得中共老權貴信任；有他參與殺佛，可以免除溫家寶和胡錦濤將來被中共老權貴卸磨殺驢之憂。

至此，殺佛的陰謀已經如箭在弦上，等待的只是一個合適的時機。

溫家寶和胡錦濤商定，射出殺佛的陰謀之箭的時間，就在一九八九年一月，日喀則扎什倫布寺舉行五世至九世班禪大師遺骨合葬靈塔祀殿建成典禮之時。

註釋：

【註1】王敏清（一九二九年～）山西省洪洞縣人。原中央保健局局長兼中央保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專門在中南海為中共首長做保健醫生，被稱為「紅色醫生」。是中國「紅二代」的代表人物。

第七章

佛殤

——聖潔的白蓮花凋殘於鐵幕陰影之下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即已決策殺佛。但是，作出決策之後，鄧小平仍然提出一項要求，即給班禪大師「最後的機會」，派員做班禪大師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回到黨和人民的立場上來」；直至從思想上最後「挽救」班禪的努力失敗之後，再對其實施「特別處置」。

鄧小平堅持上述要求並非由於他有仁慈惻隱之心，而是因為他陰狠狡猾至極。

鄧小平深知，對於班禪大師這樣一位精神領袖，生理上的死亡並不意味著精神能量的消失，只在殺死班禪的靈魂，即透過威脅利誘讓班禪主動背棄西藏復國的理想，才是屬於中共強權的具有重大政治價值的勝利——

鄧小平真正想要的，是讓班禪大師形存魂滅。

作為一個極端實用主義的老政客，鄧小平還提出兩項具體要求，一是要班禪公開表態，同達賴喇嘛的分裂主義劃清原則界限；一是公開譴責一九八七年西藏的抗議活動，支持當局對抗議活動的鎮壓。

秉承鄧小平旨意，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中共統戰部、全國政協等部門，對十世班禪大師實施攻心戰略，透過種種方式進行「思想工作」，威脅利誘

，無所不用其極。

結果卻事與願違，毫無成效。

班禪大師不僅沒有說過一句譴責達賴喇嘛的話，相反，他在諸多正式和非正式場合不斷表示，他和達賴喇嘛都是宗喀巴的弟子；他十分想念自己的這位教友，希望他也能回到西藏。

班禪大師說：「我從地獄裡走出來，又回到西藏；我祈願達賴喇嘛教友能走出流亡的苦，也回來。」

——言語之間，佛心深沉悲涼，佛情淚影瑩澈。

在對待一九八七年西藏大規模抗議的問題上，班禪大師的態度則令中共官員更加尷尬。他直截了當地譴責鎮壓抗議的官員和軍警，而且情緒激烈，常如驚雷震天，大風呼嘯。

班禪大師多次反覆指出，一九五九年他就看到中共黨內文件上策劃這樣的陰謀，即「挑動叛亂，擴大事態，然後，通過平息叛亂徹底解決西藏的宗教和民族問題」——

中共陰謀的要害就在於，當局挑起事端，擴大衝突，為進行國家恐怖主

義式的大屠殺、大逮捕製造藉口。

班禪大師指責一九八七年的鎮壓，是在重複一九五九年的陰謀。

班禪大師還對來作「思想工作」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註1】說：「一九六二年我就對張國華講過這樣的話——『你們的作法太失人心，蔣介石、馬步芳沒有做過的，你們做了……講講你們這幾年的毛病，一說假話，二不認錯，三亂整人，四無佛心，不講人道。』現在，我把這句話送給你。希望你們不要重複當年的錯誤。」

依照鄧小平指示對班禪大師進行最後的思想「挽救」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對班禪實施「特別處置」的方案卻已經開始有條不紊地啓動。

一九八八年一年中，在溫家寶和胡錦濤直接安排下，中共官方的各種媒體，都圍繞「班禪大師與黨和人民同心同德」的主題，作出大量報導；中共還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公開發布決議，高調爲一九六四年曾經加在班禪大師頭上的「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蓄謀叛亂」三項罪名平反。

溫家寶、胡錦濤顯然試圖透過中共官方媒體的此類報導，完全抹去將來

把班禪之死同中共的政治陰謀連結起來的所有可能的疑慮。

但是，就在媒體連篇累牘虛假地宣傳班禪大師與中共的「政治蜜月」的同一時期，中共所有的情報和準情報機構，都把大量關於十世班禪大師「對西藏政治社會穩定造成威脅」的情報，源源不斷呈送到中共元老寡頭集團成員的辦公桌上。

一九八八年初秋，溫家寶、胡錦濤、王敏清和胡春華在北京召開了一次關於「特別處置」行動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上，最終確定了王敏清設計的對十世班禪大師的用毒方案。

這個方案包括下述各項思考要點：

一、在高原地區，突發性心臟病的機率很高，因此，要依照突發性心臟病的症狀用毒。

二、將不採用可以導致極其快速死亡，即所謂「閃電死亡」的氰化鉀類藥物。理由在於，氰化鉀類藥物中毒死亡後的生理特徵太典型，一般醫護人員都有相關知識，而參與搶救的醫護人員勢必至少有數人，因此，使用氰化

鉀類藥物，不容易在所有參與搶救的醫護人員中形成因突發性心臟病死亡的共同結論。

三、王敏清選擇的毒藥，是受中央軍委總參二部和總政聯絡部兩個軍隊情報部門共同委託北京醫院秘密研製而成，其知識產權屬於軍事機密——

數年後對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謀殺使用的也是這種藥物。

此藥致死的過程可能需要數個小時，不過，這種藥物死亡後的生理特徵更接近心臟病突發的特徵；更重要的是，這種藥物要求的施放方式簡單而隱密——

只要用一根比頭髮還細的金屬芒刺，塗上藥物，刺入皮膚，見血即可生效；而且，在芒刺上同時塗一些高效麻醉劑，芒刺刺入皮膚時便不會有任何疼痛，因此，只需一名醫護人員，利用給施藥對象量血壓或者聽診心肺的機會，便可以不留痕跡地完成施放藥物。

四、王敏清指出，用毒致死，死後不可能完全沒有體徵反應，只是根據身體不同狀況，反應的明顯程度會有區別。

王敏清調閱過班禪大師的體檢檔案，認為班禪大師基礎代謝旺盛，生命

力強悍，用藥後的反應可能比較強烈。據此，王敏清要求，藥效發生後，最初的搶救過程，人員不能過多，要把班禪大師同外界嚴密隔離開。

五、按照藏傳佛教儀軌，十世班禪大師的遺體要保存下來。保存遺體，勢必進行脫水處理，因此，要把握脫水處理這個環節，徹底清除遺體內的藥物殘跡，以永絕後患。

在這次會議上，王敏清正式推薦周美珍【註2】承擔施放毒藥的任務。

周美珍任職於專門負責黨和政府領導人醫療保健工作的北京醫院，是內科主治醫師，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即是一位受到中共寵信的特權醫生。

王敏清特別指出，用藥後，班禪會呈現出心臟病突發的病症，而周美珍以治療惡性腫瘤著名，不是心血管病的專家，這是不利之處，但是，她黨性很強，政治上絕對可靠，選擇她可以絕對排除洩密的可能。

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十世班禪大師乘中共當局派遣的專機，前往西藏日喀則，準備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遺體合葬靈塔祀殿的開光典禮。

班禪大師動身時，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的命令，他的警衛和服務人員全部更換，隨行的保健醫生則由周美珍擔任。

警衛人員分別從總參二部、公安部、中共中央警衛局臨時調來，此前互不統屬，互不認識。

特別需要提醒歷史記住之處在於，這次臨時警衛任務的負責人叫孟宏偉【註3】。

孟宏偉是胡春華的校友，與胡春華同期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分配到公安部任職。

在校時，胡春華和孟宏偉既不屬於一個系，也沒有老鄉的淵源，但是，兩人卻過從甚密，似有宿命的緣份。此次，是經胡春華推薦，孟宏偉才得以參加這項「特別處置」行動。

或許是胡春華意識到，這次殺佛行動是一步登天的難尋難覓的機會，所以，才特意推薦有宿命之緣的校友參與。

孟宏偉當時只是公安部的處級官員，按常規顯然沒有資格負責「國家領導人」級別的警衛，然而，胡錦濤和溫家寶遵循陳雲關於此次行動要以「賤

者貴之」的原則選用人員，經考察之後，同意了胡春華的推薦。

對於這次出行前突如其來更換全部警衛、服務人員和醫護人員，班禪大師沒有表示任何異議。佛心虛寂，早超越對個人榮辱生死的關懷；佛心浩蕩，只寄情於西藏高原的命運。

不過，班禪大師對此行的凶險似有所察覺。他在初次見面簡短詢問周美珍時，得知她是腫瘤專家後，不禁聲如洪鐘，哈哈大笑，調侃地說：「怎麼會派妳來做保健醫生，還怕去日喀則的這一個月，我就會長出一個大大的腫瘤來嗎？我告訴妳，腫瘤是不會長出來的，其他的事情倒很可能會發生。」

這次十世班禪大師動身前往日喀則之前一個月，中共對外才正式公布胡錦濤擔任中共西藏書記，儘管胡錦濤早就以交接工作為名，實際掌控西藏的黨政大權。

任命公布之前，胡錦濤又一次受到鄧小平接見。

鄧小平作出兩項指令：

其一，在實施對班禪的「特別處置」之前，必須直接向他請示；經他批

准，才可實施。

其二，這次歷代班禪佛骨合葬靈塔祀殿開光典禮，十幾個省和自治區的領導，以及著名僧俗人士都要參加，在國際國內會產生重要影響；胡錦濤要向班禪大師正式轉達鄧小平的希望，即希望班禪大師在相關會議上，肯定中共對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作出的巨大貢獻，同時，明確表示對於「達賴集團」分裂主義罪行的譴責。

——鄧小平對胡錦濤強調說：「我們要做到仁至義盡，這是對班禪的最後挽救。」

凡是對班禪的個性、歷史，特別是現實表現稍有瞭解的人，都不可能相信班禪大師會做出鄧小平希望他做的事，因為，班禪大師不會背叛自己的靈魂，或者說班禪大師不會在靈魂的意義上自殺，而讓無魂的肉體繼續活在塵世間。

鄧小平也定然會得到大量情報，供他在這個問題上作出準確判斷。然而，鄧小平依舊「癡心不改」，要求胡錦濤做出「最後挽救」的努力，希望班

禪大師做靈魂的自殺。

鄧小平的行狀可以說明一個道理：這個世界有兩種最固執的動物，一是衰老的驢，一是中共老政客。

班禪大師到達西藏之後，遇到一件意外驚喜：

受胡錦濤委派，一個名叫熱地【註4】的典型的共產黨藏人高官，把一九六〇年代逮捕班禪時，從他家中搜走的《七萬言書》的手稿以及其他文件，交還給班禪大師。

胡錦濤之所以如此作爲，是想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應：

首先可以釋放中共當局不計前嫌的強烈善意，以利於說服班禪大師接受前述鄧小平對他的「最後挽救」所提出的要求；其次，如果由於班禪拒絕鄧小平的要求，而不得不對他實施「特別處置」，交還《七萬言書》手稿的舉動，也有助於排除「中共謀殺班禪」的懷疑。

在同班禪大師的第一次交談中，胡錦濤就向他轉達了前述鄧小平的兩項希望，即希望他表態支持中共在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希望他譴責達賴喇嘛。

久歷地獄之苦的班禪大師當然知道，胡錦濤塑膠假花般的笑容後面，隱藏著一隻緊握利刃的冷冰冰的鐵手。不過，當時班禪大師只是淡然一笑，顧左右而言他，沒有做正面回應。

靈塔祀殿開光典禮之後十天，一月二十三日，中共組織西藏、四川、甘肅、青海、貴州、寧夏各省區的官員和僧俗知名人士，在日喀則召開座談會，聽取對西藏的發展意見。

就在這次會議過程中，班禪大師對胡錦濤轉達的鄧小平對他的希望，以及藏在胡錦濤假笑後面的緊握利刃的鐵手，作出針鋒相對的正面回應。

班禪大師強烈抨擊中共對西藏的統治，並得出結論：

中共統治三十年，西藏遭受的破壞和苦難，以及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所謂「發展」帶來的益處。

同時，班禪再一次指出，中共官員對一九八七年藏區人民抗議的血腥鎮壓和逮捕，是在重複一九五九年大屠殺時期的錯誤。

當其時也，班禪大師聲如天雷滾滾迴盪，形似降魔金剛威猛；會場間則

一片肅殺之氣，那群中共參養的奴才官員，聞班禪大師之佛音而色沮，聽班禪大師真理之言而膽破，一個個噤若寒蟬，猶如敗草枯枝。

當天晚上，胡錦濤就用絕密級的保密電話，透過溫家寶，向鄧小平辦公室發去了班禪大師會議上的發言錄音；胡錦濤作出明確判斷——

「班禪拒絕了黨對他的最後挽救」。

一月二十六日凌晨，胡錦濤得到溫家寶轉達的鄧小平指令：「儘快實施『特別處置方案』；注意做好善後，務求萬無一失。」

就在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及其走狗胡錦濤、溫家寶等人最終決定實施殺佛重罪的這兩天中，即一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班禪大師只醉心於做一件事：為藏人摩頂祈福；僅僅兩天之內，受到班禪大師摩頂之幸的藏人就達五萬餘眾。

班禪大師為藏人摩頂——

那是西藏高原的蒼天在撫摸青銅色的大地；那是西藏高原的魂在撫摸雪域的白骨和血淚；那是西藏佛教復興運動的領袖，在以佛的大悲之心，撫摸

藏人的苦難命運，他想撫平那苦難命運上留下的每一條深深的傷痕。

一月二十七日晚，在中共日喀則地區黨政軍官員都出席的宴會上，班禪大師講道：「扎什南捷開光典禮上的發言，我應當再加一句話就好了——『我和達賴喇嘛都是宗喀巴的弟子；在這個隆重的開光大典上，我很想念我的教友達賴喇嘛。』」

顯然，這句話就是班禪大師對於鄧小平要他譴責或者詛咒達賴喇嘛的回應，同時，這句話也成爲班禪大師的遺囑，而班禪大師的遺囑就是所有藏人的祈願。

正是受到班禪大師遺囑的感召，直至今日，每一個把燃燒的生命獻給自由西藏事業的藏人，每一個自焚的聖徒和英雄，都把達賴喇嘛重返故國當作遺願之一，供奉在蒼穹之巔。

一月二十六日晚，胡錦濤透過胡春華，向周美珍下達了第二天實施「特別處置」的指令。

二十七日晚，班禪大師就寢之前，周美珍利用例行的測量血壓和聽診心

肺的機會，將塗好毒藥的金屬芒刺刺入班禪大師的皮膚。

數小時過後，一月二十八凌晨，毒性發作。

事前孟宏偉已得到胡春華傳達的指令，二十七晚至二十八晨，對班禪大師的居室進行隔離警戒，除周美珍和隨行的醫護人員外，任何人不得接近。

不過，由於班禪大師的經師嘉雅仁波切【註5】有凌晨即起誦經的習慣，而當時誦經之處就在班禪大師居室外的佛像下，所以，幾乎在班禪大師毒發的第一時間，嘉雅仁波切便與周美珍以及隨行的另兩名醫護人員，先後進入班禪大師的居室，而警衛人員來不及阻止嘉雅仁波切。

當時進入居室後，還沒有對班禪大師進行任何檢查，周美珍就高聲宣稱：「嘴唇發紫，膚色泛黑，是典型的缺氧和心肌梗塞症狀。」顯然，周美珍的話是說給所有在場的人聽的——

她要在第一時間給事情定性。

後來，嘉雅仁波切告訴身邊的人，班禪大師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面如紫檀，體黑如鐵鑄，怒目瞪天，現大威德金剛狀。

周美珍沒有預料到的是，班禪大師的生命力如此強悍，對毒性的反應竟

然如大海怒濤；在最初的兩個小時內，班禪大師的生命之潮，一直洶湧澎湃，不肯退去。

爲了不引起懷疑，周美珍已經透過胡春華發出班禪大師罹患突發性心臟病的消息，但是，北京派來的警衛人員仍然對班禪大師實施隔離警戒，把所有大師身邊的工作人員和藏人拒之門外。

這時，發生了西藏公安廳廳長白瑪多吉【註6】強行闖入的意外事件。

白瑪多吉是一個把靈魂完全出賣給中共暴政的藏人；在中共鐵血強權鎮壓一九五九年藏人大起義和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藏人的和平抗議過程中，白瑪多吉表現得比漢人共產黨更冷血，更殘酷。

正由於他是中共忠實的奴才，才能夠受命擔任西藏自治區公安廳廳長這一重要職位。

然而，奴才也自有其荒誕的自尊心——
最令奴才自尊心受傷的，就是主人的不信任。

此次班禪大師赴藏，白瑪多吉負責指揮當地警力，對扎什倫布寺外圍進

行安全警衛。

一月二十八日清晨，傳出班禪大師突發心臟病的消息後，白瑪多吉也被北京來的警衛擋在外面，不准進入班禪大師居室。這種明顯的不信任的舉動，使得白瑪多吉的奴才的自尊心大受傷害；心碎之餘，白瑪多吉突然野性大發，竟亮出佩槍，直闖班禪大師居室。

北京派來的警衛都是身懷擒拿絕技的高手，要想制服白瑪多吉易如反掌，但是，考慮到白瑪多吉公安廳廳長的身份，如果強行阻止他進入，很可能引發對班禪大師死亡原因的懷疑，甚至激起社會動亂。因此，負責警衛指揮的孟宏偉，臨機決定允許白瑪多吉進入班禪大師的居室。

白瑪多吉強行闖入的意外事件，當天就由胡春華向胡錦濤作出匯報，胡錦濤肯定了孟宏偉的臨機決斷，他說：「事緩則圓麼。不過，要請國家安全部立即對白瑪多吉進行全天候秘密監控；一旦出現必要的情況，就要對他作出及時處理。」

鑒於嘉雅仁波切和白瑪多吉已經看見過毒發後的班禪大師，同時，周美珍認為，班禪大師的體徵反應最初雖然激烈，但現在已經趨於平靜，體症特

徵可以作出類心肌梗塞解釋，胡春華建議允許多個醫療單位進入現場實施搶救——

根據現在的情況，參加搶救的人員越多，對班禪大師死亡原因的疑慮便會越少。

胡春華的建議經胡錦濤批准後，從一月二十八日早晨起，「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總醫院」、「日喀則地區人民醫院」、「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八醫院」等醫療單位的專家和醫護人員，分頭趕到，齊聚班禪大師的搶救現場，人數竟達近百名。

稍有醫學常識的人都應當清楚，把這麼多醫療單位和醫護人員糾集在一起，對於搶救病人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反會徒增混亂。不過，中共當局就是要透過近乎誇張的龐大的搶救陣容，以證明他們多麼想讓班禪大師活下去，證明他們對於班禪大師之死完全無辜。

然而，表演得太過火，也會有作賊心虛，欲蓋彌彰之虞。

事實上，一月二十八日清晨，班禪大師的生命便已經凋謝。上述眾多醫療單位的搶救只是在做一件事，即透過呼吸器和心臟按摩，保持班禪大師遺

體的心肺系統的物理性運動，而非生理性運動。這種作為顯然是對已逝的聖者的大不敬。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在等待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拉開的另一場「搶救大戲」的帷幕。

一月二十八日早晨，中共中央便迅速組成由溫家寶擔任組長的十世班禪大師搶救小組，效率之高，令人覺得中共對此事早有預見。

王敏清則是這個搶救小組的靈魂人物。

搶救小組從北京南苑軍用機場起飛，在拉薩降落之後，又改乘直升飛機，於二十八日傍晚六點二十分到達日喀則班禪大師的搶救現場。

中共中央搶救小組全部的搶救活動，只是在王敏清指揮下，做了兩次心臟穿刺起搏——這種常規性搶救方法，早已在場的任何一個醫療單位都有能力實施——然後，便宣布十世班禪大師死亡。

這個從北京不遠萬里，風塵僕僕趕來的搶救小組，實際的作用，只是用誇張的戲劇性的方式告訴世界，中共對班禪大師「情深意切」。

中共的宣傳機器和御用文人也確實充分張揚了這種戲劇性——一篇相關的文章，竟然說搶救小組為挽救十世班禪大師的生命，是冒著

墜機的危險，不顧個人生死，趕往日喀則。

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點燃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聖火的精神導師；推動當代西藏文化復興命運之輪的大力金剛佛；終生與自己的族人一起承受地獄之苦的大悲菩薩；在西藏命運最艱難的時刻，對著抵在咽喉上的刀鋒發出復國召喚的英雄；歷史上唯一給三百五十萬藏人摩頂祈福，送去心靈安慰的聖者，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被中共鐵血強權謀殺而亡；聖潔的白蓮花黯然凋殘於鐵幕的陰影下。

那一夜，十世班禪大師的佛魂回歸寂滅的真理；西藏高原的天空群星湮滅，深黑如墨，萬座雪峰都被夜色染成鐵黑的墓碑。

殺佛之後，中共發表的訃告中，竟然稱十世班禪大師是「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

凝視這句中共刻在班禪大師峻峭的死亡之上的謊言，我不禁悲從衷來。少年時，我相信正義必勝，邪惡必敗；相信真理一定戰勝謊言。歷盡滄

桑之後，心如風裂的頑石之餘，我卻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

邪惡往往主宰命運，正義則只意味著苦難與悲愴；歷史並非真理的墓碑，而是強權書寫的謊言。

我不知道，是我少年時的信念錯了，還是人類的命運與歷史已經走入歧途。

十世班禪大師魂歸佛境的第二天，班禪大師法體呈鐵黑色的消息就在扎什倫布寺內傳開。

爲此，許多僧人提出希望聯合國介入處理班禪大師法體，以查明真實的死亡原因。當然，在中共嚴酷的秘密警察統治之下，上述僧眾的要求必然被扼殺在極權鐵幕的陰影中。

當時，十世班禪大師的法體經用花香馥鬱之清水拭淨後，被塗上燦爛的金粉。可是，六個月之後，班禪大師法體進行塔葬時，法體上的金粉竟然也變成鐵黑色，因此，不得不再一次爲法體塗金粉——

中共鳩殺十世班禪大師用毒之酷烈，由此可見一斑。

爲讓十世班禪大師之死成爲「燭光斧影，千古之謎」，監控和處置兩個班禪毒發時狀態的目擊者，即嘉雅仁波切和白瑪多吉，就被中共視爲所謂「善後」工作的重點之一。

嘉雅仁波切與班禪大師的關係如影隨形，榮辱與共，苦難相從；嘉雅仁波切是班禪大師靈魂的影子。

早在一九四三年，嘉雅仁波切就以經師的身份，與還處於童稚之年的十世班禪大師結下終身不變的生死之緣。

一九六四年，在萬人傳召法會上，班禪大師視鐵血強權如無物，發出西藏復國的雄獅之吼，隨即被逮捕。當時，嘉雅仁波切也被冠以「班禪反動集團重要成員」的罪名，關入勞改營，歷經十五年苦役犯的生涯。

一九七九年，嘉雅仁波切與班禪大師先後獲釋。從此之後，嘉雅仁波切就成爲班禪大師開創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的重要智囊和得力助手。

對於嘉雅仁波切，中共自然極其忌憚；他親眼目睹十世班禪大師毒發逝世的過程之事，更讓胡錦濤、胡春華百倍警惕。

顯然是爲了安撫嘉雅仁波切，以免其講出班禪大師死亡過程的真相，中共很快就組成「班禪轉世靈童尋訪領導小組」，任命嘉雅仁波切爲組長。

不過嘉雅仁波切對於自身所處的險惡境地有清醒的認識，他曾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別看我還能自由活動，實際我是活在鐵墳裡。」嘉雅仁波切這句話的意思是，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在中共監視之下。

一九八九年秋冬之際，負責監控的秘密警察作出報告稱，有跡象表明，嘉雅試圖爭取出國赴印度訪問的機會，以便同「西藏流亡政府」接觸。胡錦濤、溫家寶根據這個報告，決定對嘉雅仁波切實施善後「特別處置」，並口頭報告鄧小平、薄一波批准。

一九九〇年二月，由孟宏偉率人從北京赴安多，即青海，秘密用毒，殺死嘉雅仁波切。

白瑪多吉乃中共強權統治西藏之鷹犬爪牙。

十世班禪大師辭世後，不知是因爲酗酒之後喪失理智，還是由於鬼使神差，白瑪多吉竟數次犯中共之大忌，對人講他親眼看到，班禪大師瀕臨死亡

之際，指甲青紫，嘴唇發黑。

白瑪多吉的言論使一些人開始懷疑班禪大師是死於中毒。

胡錦濤認為白瑪多吉已經超過可以容忍的底線，為防止對班禪大師的死因的懷疑進一步蔓延，決定對白瑪多吉也實施善後「特別處置」。

一九九〇年，胡春華受命，指令他在西藏公安廳的一位「親密朋友」，利用宴請白瑪多吉之機，將其鳩殺。

中共毒死嘉雅仁波切和白瑪多吉的藥物，與謀害班禪大師使用的藥物是同一種。

為掩人耳目，消除懷疑，安撫白瑪多吉的家人，中共在白瑪多吉死亡兩年之後，授予其「一級警監警銜」；宣布授銜時，竟然忘了同時宣布這是「追授」。

另外，一些曾經為十世班禪大師提供過服務的人員，也於一九九五年前後，相繼在扎什倫布寺內離奇死亡，其中包括班禪大師的廚師邊巴，秘書兼會計鄧珠甲午，班禪大師常與之探討佛法的邊瓊。

這些人都是在胡春華主持下，由秘密警察用毒致死。

中共毒殺這些人的原因，不僅在於他們一直堅信並傳播十世班禪大師係遭中共謀殺的消息，而且因為他們都拒絕承認中共製造的偽十一世班禪。

不過，曾經在十世班禪大師身邊工作過的人，只要願意泯滅天良，與中共合作，也會得到當局的重用。

由於十世班禪大師之死而被中共謀殺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便是葉雄仁波切。

葉雄仁波切係十世班禪大師表弟，法名嘉樣更登嘉措，擔任安多循化縣文都寺寺主。

十世班禪大師辭世後，葉雄仁波切為查清十世班禪大師死亡真相，堅持不懈，多方奔走，引起中共當局忌恨。孟宏偉受胡錦濤之密令，派公安部的秘密警察於一九九六年毒死葉雄仁波切。

中共官方公布的葉雄仁波切的死因，也同十世班禪大師一樣，即突發心臟病。

中共處理十世班禪之死的所謂「善後」，實質上有兩種涵義：

一是消除中共謀害班禪大師的陰謀洩密的可能；一是摧殘班禪大師開創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西藏文化復興運動，以及以這兩種精神復興運動爲心靈之源的西藏復國運動。

前一種意義上的「善後」，以謀殺嘉雅仁波切、白瑪多吉、葉雄仁波切，以及諸多十世班禪大師身邊的工作和服務人員爲終結；後一種意義上的「善後」，由二十世紀一直持續進行到二十一世紀，現在還看不到終結之時。

十世班禪大師辭世之後，中共首先全力摧毀大師爲西藏佛教復興和文化復興創建獨立的經濟基礎的努力。

班禪大師擔任董事長的「援藏發展基金會」原本是非政府組織，很快被收歸國有，由中共相關部門全面監管控制；班禪大師創建的「剛堅發展公司」，本來已經發展成爲規模巨大、經營領域遍及全球的經濟體，可是在中共的刻意打壓和種種限制之下，經營規模迅速萎縮，失去了蓬勃的生機。

班禪大師從一九七九年出獄之後便開始推動的寺廟重建和佛學院的創建

、恢復事業，乃是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能夠凌空奮飛的雙翼。中共「善後」摧殘的鋒芒，自然不會放過寺院和佛學院。

一九九〇年代之後，中共盡現鐵血強權的蠻橫風格，強行限制寺院的規模和數量；派遣大批秘密警察和告密者，披上僧衣，進入寺院，控制宗教活動；強迫男女僧人學習中共的政治理論，甚至要求寺廟供奉中共狗官領袖的畫像——

中共要把禮佛的寺院變成崇拜滅佛惡魔的殿堂。

對於反抗其上述種種倒行逆施的活動，中共則毫不猶豫地運用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實施殘酷鎮壓。

佛學院遭受的摧殘毫不亞於寺院，其中五明佛學院的遭遇極具典型性。如前曾述，經班禪大師批准成立的五明佛學院，僧眾學員發展到萬人以上，有「世界上最大的佛學院」之譽。

一九九〇年代後半期開始，中共派遣工作組率警察強行進駐五明佛學院，全面控制學院的活動，強令佛學院縮小規模。

受到佛學院創建人堪布晉美彭措和所有堪布抵制之後，中共工作組採用黑手黨方式，大規模拆毀校舍，使僧眾學員沒有存身之處，從而逼迫他們離開學院；最瘋狂的時候，一天之內被拆毀的校舍竟然達到一千七百座。

中共強權下達行政命令，限制五明佛學院的學員人數不得超過二千四百人；學院的創建人堪布晉美彭措也於二〇〇三年突然圓寂，官方宣布他所罹患的病症，也同被鳩殺的班禪大師，以及嘉雅仁波切、白瑪多吉一樣，即所謂心臟病。

五明佛學院的遭遇是一個典型，但卻不是個別現象；所有與西藏有關的佛學院都失去教學自主權，淪為中共嚴厲監管下的準囚徒。

十世班禪大師入滅是一個標誌：

屬於西藏的十年精神自由的春天已經凋殘，鐵血強權將再次給雪域帶來嚴酷的政治寒冬。

中共鳩殺十世班禪大師是一個預言：

西藏高原的子民將再次面對命運的逼問——

是做一個忠實於心靈的自由人，還是接受強權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使自己淪為中共黨文化的精神亡國奴？

這是一個歷史凝神屏息等待藏人回答的問題。

答案將決定藏人今後配不配繼續被稱為佛的選民，英雄的選民，聖徒的選民。

註釋：

【註1】葉小文（一九五〇年～），湖南省寧鄉人。一九九八年～二〇〇九年擔任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職務；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曾作為國務院特派專員，赴藏監控偽十一世班禪的金瓶掣簽和坐床大典。現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黨組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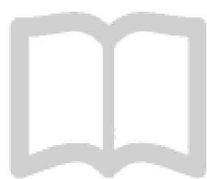
【註2】周美珍，女，主任醫師，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一九六七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一直從事臨床內科工作，曾任職於北京醫院腫瘤科。

【註3】孟宏偉（一九五三年～），漢族，黑龍江省哈爾濱人，一九七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現任公安部副部長、黨委委員，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局長，副總警監警銜，國家海洋局黨組副書記。

【註4】熱地（一九三八年～），藏人，西藏比如縣人，一九六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

【註5】嘉雅仁波切，青海塔爾寺的知名活佛之一。十三世嘉雅洛桑丹貝堅贊仁波切，曾任十世班禪大師經師，於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圓寂。

【註6】白瑪多吉，曾任中共西藏公安廳廳長。因目睹十世班禪大師死亡過程而被中共謀殺。



第八章

佛魂不滅

——黑暗不會成為永恆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迫黯然交出中共總書記權杖。這意味著中國思想自由的春天即將百花凋殘，不過，政治邏輯還在被歷史的慣性推動，向前運行——

凋殘也是一個過程。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世班禪大師蒙難則意味著，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在摧殘思想自由的春天的同時，又將開始實施新一輪滅佛的罪惡。

這一輪滅佛運動除了依然以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為後盾之外，中共老政客陰險詭詐的個性，又為其刻畫出更加鮮明的政治陰謀的特徵。

這個政治陰謀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個：從政治思想、組織體系、經濟來源各個角度，全面控制西藏兩個宗教領袖的轉世靈童，將靈童培養成「披著僧衣的共產黨人」，從而達到在精神王國控制藏人的目的，即要在靈魂的意義上滅佛。

前述陳雲所言對藏人的「釜底抽薪」之策的要義，端在於此。

因此，鳩殺十世班禪大師只是政治陰謀的起點，從心靈到肉身徹底控制班禪轉世靈童，才是陰謀的歸宿。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宣布確吉傑布爲僞第十一世班禪。在此之前，繼嘉雅仁波切擔任「班禪靈童尋訪小組」組長的恰扎·強巴赤列【註1】，因爲違悖中共的意志，而遭受秘密逮捕，後被投入勞改營，經歷六年苦役犯的懲罰，釋放後一直處於軟禁之中。

另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恰扎·強巴赤列已經圓寂，係被中共當局毒死。

正是在恰扎·強巴赤列的協助下，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仍然得以按照宗教儀軌，認定更登確吉尼瑪【註2】爲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並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宣布班禪靈童認定的消息。

此後不久，應當成爲十一世班禪的更登確吉尼瑪便在中共極權鐵幕的陰影下消失了——

像一盞被惡魔的詛咒吹滅的佛燈；像一縷飄散在雪域高原上的風，像一片滲入西藏青銅色大地的深紅的晚霞。

中共暴政毫無顧忌地用專制的鐵手，抹去一個生命的所有痕跡，而且這個生命天生就受到佛的祝福；十一世班禪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而鐵血強權

控制的偽十一世班禪卻竊據扎什倫布寺的聖殿。

中共之所以不畏懼天譴地詛，敢行此悖逆天理人倫之事，公然脫下褲子，赤裸裸地露出政治黑手黨的本能，關鍵就在於他們已經看透了當代人類墮落的本質——

人類遠比忠實於良知更忠實於物性貪慾，而中共有能力用骯髒的金錢收買人類那顆貪婪於物慾的心，使其背棄良知，對暴政的惡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中共能夠鳩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能夠讓十一世班禪消失在比死亡更荒涼的黑暗中，但是，暴政卻殺不死班禪的佛魂。

十世班禪的佛魂就活在他開創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中，就活在藏人從心底裡發出的西藏復國的呼喚中。

十世班禪的佛魂不死，因為，他的命運從來沒有離開過西藏高原的苦難；因為，當藏人最絕望的時刻，他的血作為復國希望的種子，播撒在藏人心靈的深處。

一九八九年三月，距離十世班禪大師被鳩殺不到兩個月，反抗中共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示威便如火如荼，又一次在絕大部分藏區展開。

藏人是用能夠點燃白雪的熾烈之血，祭奠不滅的十世班禪之佛魂；示威人海中繽紛的雪山獅子旗舞動長風，獵獵作響，彷彿是三十五年前十世班禪大師在萬人傳召法會上發出的復國召喚的歷史回音。

此後，年復一年，藏人的反抗從沒有中斷。

二〇〇八年，藏人的反抗運動之後，出現了一件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一位筆名學懂【註3】的藏人學者，用藏文完成了一部名為《開天關地——藏曆土鼠年和平革命》的著作；這本著作以二〇〇八年西藏反抗運動為背景，從理論基礎、歷史淵源、現實道路等各個角度，全面論述了西藏復國的意志與理想。

學懂應當是以十世班禪大師命名的十年西藏文化復興運動培養起來的學者群體中的一員；《開天關地——藏曆土鼠年和平革命》則是關於西藏命運的智者之書。

學懂和他的著作表明，當代西藏文化復興運動中已經湧現出一個智者群體；這個群體的湧現，使藏人對自己命運的關注超越宗教的範圍，成爲在更廣闊的領域中對自由的思考與追求，他們賦與西藏復國的理想更加豐饒的思想內涵。

以二〇一二年爲起點，藏人以族群命運的名義，開始了英勇悲愴冠絕古今的自焚抗暴運動。

過去，在不同時空和歷史背景中，也曾有壯烈之士自焚以明志，不過，那都是個別現象，個人行爲。

人類的萬年文明史間，沒有哪個民族像藏人這樣，以族群的名義，讓生命化爲一團團金色的烈焰，表述對自由的熾烈之戀，以及對心靈的忠誠。

每一個自焚的藏人都是一首自由的史詩和長歌，都是一個壯麗的生命哲學，都是一尊光明佛——

當他們把紅焰焚身裂骨的燦爛痛苦作爲祭品，獻給西藏復國的理想那一刻，他們已經成佛。

如果說一九五九年，藏人透過全民大起義，以決死的搏戰證明自己是英雄的選民，現在，藏人則用燃身獻祭證明自己是聖者的選民——

為忠誠於理想和心靈而燃燒的生命，就是神聖的獻祭者。

迄今為止，已經有一百二十餘位藏人燃身成聖；他們大部分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其中還有為數眾多生命如花如詩的少男少女。

自焚獻祭者的共同的遺願是：

西藏自由；西藏復國；珍惜西藏自然環境；讓達賴喇嘛回家；還十一世班禪大師以自由。

這些遺願幾乎都是十世班禪大師留在西藏苦難命運上的心靈的足跡；就連「讓達賴喇嘛回家」，也是班禪大師在自己生命盡頭說出的願望。

可以說，每一個自焚獻祭的藏人都在告訴世界，十世班禪大師佛魂不滅；每一團焚身的金焰，都是十世班禪大師佛魂的輝煌復活。

預測未來是人類社會的心理習慣。

關注西藏自由命運的人們不妨對參與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中共狗官的命

運稍作關注，因為，中共對殺佛者的態度，可以作為判斷中共今後將怎樣對待自由西藏運動的標誌之一。

胡錦濤主持執行謀害班禪大師之後，又於一九八九年三月，頭戴鋼盔，手持自動步槍，親臨拉薩街頭，指揮對示威藏人的屠殺與逮捕。

正由於胡錦濤手上既沾有佛的血，又沾有藏人英雄的血，這個陰柔寡毒如太監的庸人俗物，才深得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垂青，被鄧小平隔代指定為中共接班人，從而才能夠在中共最高權力意志上留下他猥瑣的生命風格的印跡——

中共老政客只相信殷紅的血，不相信清淚。

江澤民【註4】任中共總書記時，基於黨內幫派利益和權力鬥爭的考慮，一度曾試圖阻止胡錦濤接掌最高權力，元老宋平遂出面找江澤民，對其警告道：「對胡錦濤同志的安排是由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共同作出的決定；你想挑戰這個決定權威還不夠。胡錦濤在穩定西藏大局的問題上，是為黨立下不世之功的。這一點我比不上，你也比不上。你要一定想改變對胡錦濤同志的安排，軍隊裡的老同志也不會答應。」

溫家寶出身平庸，其祖上甚至應歸類為中共政治概念中的「政治賤民」；溫家寶本人雖然慣會逢場作戲，專喜附庸風雅，猶擅垂淚買憐，然而其才只堪做一個雜貨鋪的小掌櫃。他能青雲直上，攬大國總理之位於懷，全在於兩次背叛，一次殺佛。

溫家寶本是偏僻之地的庸鄙小吏，全賴胡耀邦信任拔擢，才得以進入中樞，掌中共中央辦公廳之重權。但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策動宮廷政變時，溫家寶背叛胡耀邦，助元老寡頭逼迫胡耀邦退位，遂得鄧小平、薄一波等老政客寵信。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學生運動大潮湧起，溫家寶再次投靠欲血洗北京以立威的中共元老寡頭集團，背叛總書記趙紫陽，運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之重權，阻止趙紫陽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致使趙紫陽試圖挫敗元老寡頭集團屠殺學生陰謀的努力，功敗垂成，遺恨千古。

八九學運期間，趙紫陽在最後關頭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當時溫家寶隨侍在側。

從一張廣泛流傳的照片上看，溫家寶臉上亦現哀淒之情狀；有人據此以

爲溫家寶與趙紫陽一樣，有菩薩的悲憫之心。殊不知，溫家寶去廣場，乃是遵鄧小平之密令，防止趙紫陽留在學生中間。

如若趙紫陽有意滯留廣場不歸，與學生聯手，反抗元老寡頭集團，溫家寶手下的秘密警察將強行將趙紫陽帶離廣場；必要時甚至將採取極端措施，刺殺趙紫陽，然後嫁禍於學生，爲大屠殺製造新的藉口——

鄧小平之心毒如蛇蠍，狠似虎狼，溫家寶甘做鷹犬，天良泯滅，只求高官厚祿。

至於那張廣泛流傳的照片上，趙紫陽含千古之悲，勸學生珍惜年輕的生命，盡顯長者仁慈之心；隨侍於旁的溫家寶臉上的淒哀神情，只能說明小人僞善，直可欺天瞞地，斯人作假之術，同名滿世界的丑角戲子政客江澤民相比較，亦不遑多讓，各有千秋，各擅勝場。

兩次無恥背叛，一次與胡錦濤共同主持執行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終使溫家寶得成「正果」，獲問鼎總理寶座之資格——

那是屬於卑鄙小人和殺佛罪犯的資格。

胡春華在協助執行謀殺班禪大師過程中，深得胡錦濤賞識，稱他「機智果斷、冷靜堅定，有大將之風」。

後來，在中共製造偽十一世班禪，以及迫害十一世班禪的過程中，胡春華亦竭盡全力，甘效犬馬。

因此之故，胡春華在中共官場中春風得意，一路攀升，現已官至政治局委員，並被視為未來「中共第六代領導」的核心。

二〇〇八年胡春華任河北省省長之後不久，就發生了震驚全球、影響深遠而惡劣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胡春華主持之下，河北省政府的第一反應便是百般掩蓋事實真相。後來掩蓋不成，事件真相暴露於國際國內的輿論譴責之下，中共不得不懲處眾多相關官員，以平息天下之怒。可是，唯獨胡春華不僅沒有受到任何貶斥，反而繼續升遷，調任中共內蒙古黨委書記。

當其時也，李鵬【註5】之子李小鵬【註6】覬覦京畿重地河北省省長之位，本欲乘三鹿毒奶粉事件之機，搞掉胡春華，取而代之。

胡錦濤聞訊，委託鄧樸方勸阻李小鵬。

鄧樸方只說了一句話，李小鵬便放棄了攻擊胡春華的策劃。

鄧樸方的話是：「人家連『殺佛』這種髒活兒都替我們幹了，如果連這種人我們也要整，以後誰還願意爲共產黨賣命？」

由此可見，殺佛，就是胡春華的「免死金牌」；殺佛也爲胡春華贏得中共的「鐵帽子王」的資格。

對於鄧樸方這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至少可以從下述幾個視角來審視：

其一，中共太子黨和老權貴階層把共產黨的政權視爲他們的私產；在他們眼中，胡春華這類平民出身的官員只不過是權貴階層僱傭的幫工，最多是個經理而已，太子黨才是政權的股東和董事，即政權的所有權擁有者。

其二，中共權力已經從黨的私有化轉向權貴家族私有化；中共元老寡頭集團的成員已經把他們的子女視爲最值得信任的政治原素，因此，他們可以將謀殺十世班禪大師這種黨內最高機密，毫無顧忌地告訴自己的子女，否則，鄧樸方也不會知道胡春華參與殺佛之事。

其三，極權專制的本性在於陰謀政治，而陰謀政治與秘密政治乃是一體

兩面。

不過，從元老寡頭集團透過宮廷政變方式整肅大良知者胡耀邦之後，中共已經喪失了保密的能力——

元老寡頭集團視包括保密法則在內的黨規黨法如無物，太子黨則以相互炫耀自己對中共內部機密的知曉程度，作為在權貴階層中的顯赫地位的證明，而且蔚然成風，一發不可收拾。

因參與謀殺十世班禪大師而受中共權貴高官大爵之賞的另一人，便是孟宏偉。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共公安部著意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政法大學等一系列中國著名大學中招收畢業生，充當警官，以提高中共警察的知識水平。

孟宏偉雖然出身於北京大學，但是卻資質平庸，且其下顎骨粗大厚重，有龍布羅梭（編按：一八三五年～一九〇九年，義大利犯罪學家、精神病學家）所言「天生犯罪人」之相。經胡春華推薦參與謀殺十世班禪，孟宏偉顯出可以

泯滅天良，願為中共效死命之意；特別是在讓十一世班禪猶如被埋進鐵棺一樣，消蹤滅跡的過程中，孟宏偉負主要責任。

孟宏偉由此得仕途之「天梯」，直上官場之九霄。現在，他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中國中心局局長。

直接實施殺佛重罪的罪犯，都得享高官厚祿，「光宗耀祖」，然而，浮生若夢，榮華富貴皆為過眼煙雲。這群殺佛狗官內心深處必受罪孽的詛咒而驚慄恐懼，日夜不得安寧。

如前所述，胡春華於居所密室之中，昏暗血紅的燈光之下，懸十世班禪大師之像，施以巫蠱之術——

用鐵錐刺大師雙眼，以防大師之冤魂，化凶神厲鬼，找其索命。

胡春華此舉不可謂不毒，卻也盡顯其恐懼萬端，惶惶難以終日之心態。

不僅胡春華活在恐懼之中，殺佛大罪的陰影也像不散的惡夢一樣籠罩在胡錦濤和溫家寶的頭上。

二〇一二年，薄熙來【註7】王立軍事件爆發之後，薄熙來身陷囹圄，

身處絕境，仍然敢有恃無恐，向胡錦濤、溫家寶挑戰；薄熙來對審訊人員聲稱，如果胡錦濤、溫家寶一定要判他死刑，取他性命，他就會在法庭審判過程中，公開披露胡錦濤、溫家寶主持謀殺十世班禪大師之事，要求以殺人罪立即逮捕胡錦濤、溫家寶，並對他們提起公訴，進行審判。

薄熙來威脅道：「你們逼我老婆承認殺人，我倒要看一看到底是哪個罪過大——是殺佛罪重，還是殺一個英國間諜罪大。」

薄熙來此言一出，中共廟堂震盪，不僅胡錦濤、溫家寶以及胡春華一千人等冷津遍體，不寒而慄，股顫神搖，惶恐如懼雷殛之狐鼠，就連諸多退休的中共元老高官也心驚膽戰。

他們的憂懼之處在於，一旦由薄熙來出面指控中共謀殺十世班禪，勢將在國際國內對中共政治形象造成毀滅性的打擊，而且必然引發藏人抗議的大潮巨瀾；本來就已經朽敗不堪、民心喪盡的中共政權，很可能將因此進入風雨飄搖之秋。

這正是薄熙來案一拖再拖，久拖不審的主要原因——
中共需要時間，來脅迫薄熙來「顧全大局」，放棄魚死網破的打算。

二〇一三年七月，中共終於宣布刑事起訴薄熙來。

這表明，中共當局採用黑手黨的方式，以薄熙來兒子的生命安危來脅迫薄熙來，已經取得成功；中共當局與薄熙來之間達成骯髒的交易——

薄熙來或許可以保住自己那一條貪官酷吏的狗命，其子則定然可以繼續用他貪污的金錢在國外吃喝嫖賭，而中共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陰謀卻又一次被這項骯髒的交易所遮蔽。

不過，無論他們如何恐懼，所有參與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人員，畢竟盡皆成爲中共權力意志的標誌性人物，而胡春華更被培養爲「中共第六代領導集體」，即未來新的寡頭集團的核心，這一切本身就足以說明，西藏的命運必將面臨又一次艱難困苦，甚至血雨腥風。因爲——

有必要再說一次，中共強權所要做的，不僅限於謀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而是要摧殘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摧殘藏人爲做自由人而復國的意志。

每一次中共權力交替之後，中共豢養的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務總要花嘴巧

舌，翻覆雲雨，散布對中共的政治幻想——

這已經成爲令狗都厭倦的老戲碼。

現在，媒體上又充斥種種無恥且無聊的溢美之詞，加諸於習近平【註8】，似乎他將給中國和西藏帶來希望。

然而事實是，命運將進入人類萬年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
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西藏，都是如此。

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是一個標誌，它標誌著毛澤東的「老紅衛兵」【註9】將全面主宰中國權力意志，習近平不過是他們推舉的政治象徵。

何謂毛澤東的「老紅衛兵」？一言以蔽之，就是類似希特勒的「衝鋒隊」或者「黨衛軍」那樣的反人類罪犯組織；毛澤東利用這個罪犯組織，書寫出「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序言。

一九六六年，「老紅衛兵」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即極權專制，聽從毛澤東的政治召喚，發動「紅色恐怖」運動，對近千萬知識分子和中共治下的「政治賤民」及其子女，實施瘋狂的大迫害；至今難以準確計數的人們在「紅色恐怖」中死去，其中包括不識世事的兒童和衰朽的老人，他們是被石

頭砸死、被棍棒打死、被皮鞭抽死——他們是在最原始、最粗糙的方法打擊下死去；最原始、最粗糙，因而最野蠻，最殘酷。

毛澤東的「老紅衛兵」少年時代就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是兇殘至極的犯罪集團。

有人說，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可以原諒。但是，原諒要以懺悔為前提，迄今為止，毛澤東的「老紅衛兵」沒有一個人面對歷史的血跡懺悔罪惡。這意味著這個反人類罪的罪犯群體，依然在堅守少年時代由毛澤東思想注入的惡魔的天性。

由於政局動亂，命運跌宕起伏，「老紅衛兵」的學業少年時期便中斷，他們的靈魂喪失了透過教育得到知識拯救的機會，毛澤東思想的詛咒成爲銘刻在他們少年之心上的終生難以磨滅的印記。

儘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今天都有意無意地炫耀碩士、博士的頭銜，但那只是用權力與學位相交換的結果——在中國，有了腐敗的權力，就擁有了切——他們的真實學歷，只是毛澤東思想詛咒下的初中生或者未畢業的高中生。

中共十八大之後，就是這樣一代毛澤東魔性的繼承人將主宰中共權力意志。

當前，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端的財產兩級分化、千萬貪官污吏如附骨之蛆的腐敗、十五億中國人道德的全面潰爛、東亞大陸自然生態瀕臨崩潰的大危局，所有一切都表述一個基本事實：

鄧小平的權貴市場經濟經過三十年運行，已經步入絕境死地。

習近平所代表的毛澤東「老紅衛兵」全面主宰權力意志之後，這個驕橫如公牛、固執如老驢的半文盲群體，完全沒有解決危機的知識和政治能力，他們除了繼承鄧小平的權貴資本、腐敗權力、黑手黨政治、特務統治的遺產之外，還將繼承毛澤東的恐怖政治和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的遺產。

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個魔鬼加諸於中國命運的詛咒，將透過毛澤東的「老紅衛兵」主宰權力意志而重疊在一起，雙重魔咒之下，命運必定進入人類萬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世上沒有不朽的青春年華，人間也不會有永恆的黑暗；繁花怒放之後只

能凋殘，黑暗發展到極致之處必然破碎。因此，中共極權專制的覆滅就像黑暗不能永恆一樣，是無可避免的。

現在，對於中國，需要考慮的只是，「最後的黑暗」是否會因為拖延得太久而給中國國運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中共暴政的覆滅還需要多少中國人的生命殉葬，還需要用多少紅血和白骨作祭品；十五億不相信道德良知的中國人將從何處獲得精神能量，來拯救自己的靈魂和文化的祖國。

對於西藏，需要考慮的則是，在「最後的黑暗」結束之前，如何使西藏免於文化滅族的命運，即如何保持藏人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價值的存在，如何讓復國的意志成為西藏自由命運的希望和守護神。

「最後的黑暗」即將來臨，「最後的黑暗」已經來臨，但是，黑暗畢竟不能成爲永恆，只有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不滅的佛魂才與不朽的永恆一致——

屬於永恆的，只有寂滅的真理和佛的大悲之心。

註釋：

【註1】恰扎·強巴赤列（一九四〇年～），原西藏日喀則市扎什倫布寺的主持，原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一九八九年班禪喇嘛圓寂後，時任西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堪布恰扎·強巴赤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任命為十世班禪轉世靈童尋訪小組組長，主持尋找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一九九五年，強巴赤列將尋訪結果通信告知了十四世達賴喇嘛。同年五月十四日在印度德里，達賴喇嘛通過廣播的形式宣佈生於西藏嘉黎縣的更登確吉尼瑪為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十七日，中國政府秘密拘捕恰扎·強巴赤列。

一九九七年西藏日喀則市中級人民法院秘密審判恰扎·強巴赤列，以分裂國家和洩露國家機密罪判處恰扎·強巴赤列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二〇〇一年，恰扎·強巴赤列服刑期滿，但未獲釋。二〇〇二年，恰扎·強巴赤列出獄，但仍被軟禁在日喀則，沒有行動自由。也有訊息稱，恰扎已經被中共謀殺。

【註2】更登確吉尼瑪，藏人，生於西藏那曲地區嘉黎縣。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圓寂後，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四日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確定為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承認更登確吉尼瑪的靈童候選資格，並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將其從家中帶走，自此更登確吉尼瑪與其家人便下落不明，更登確吉尼瑪由此成為「世界上年紀最小的政治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共非法認定確吉傑布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轉世靈童。國際社會持續向中國政府要求見到更登確吉尼瑪本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兒童權利委員會先後向中國政府要求探視更登確吉尼瑪並與其單獨接觸，但是迄今為止中共拒絕了所有這些要求。

【註3】學懂，藏人學者，曾因撰寫以西藏復國為政治主題的《開天闢地——藏曆土鼠年和平革命》一書遭到中共監禁。

【註4】江澤民（一九二六年～）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中共總書

記，因推動中共的全面腐敗而臭名昭著。

【註5】李鵬（一九二八年～），四川省宜賓市慶符縣人（今屬高縣），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要領導人之一。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六四事件前夕，李鵬在電視上發表「五一九講話」，代表中共元老寡頭集團，宣示出動軍隊進行武力鎮壓學生運動的意志，並簽署戒嚴令。李鵬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坐鎮中南海參與了對學生運動鎮壓的指揮。

【註6】李小鵬（一九五九年～），出生中國北京，前中共高級領導人李鵬的長子，現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長。

【註7】薄熙來，薄一波次子，曾任大連市長、商務部部長、重慶市委書記和第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是中共第五代領導層的最熱門人選之一；在二〇一二年，以「王立軍事件」為導火線、「薄熙來事件」為核心

的一系列中共政治風波中倒臺失勢，現被中共囚於秦城監獄。

【註8】習近平（一九五三年～）陝西富平人，中共元老習仲勳之次子。一九七四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中共太子黨執掌中華人民共和國軍政大權的象徵人物。

【註9】老紅衛兵：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初期出現的中共高幹子女組成的政治組織；被稱為毛澤東的「黨衛軍」和「衝鋒隊」，是反人類罪的犯罪組織。

第九章

西藏命運在生與死的鋒刃 上艱難行進

——習近平說：「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

十世班禪大師推動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召喚西藏復國的理想，乃是以佛的大慈悲之心，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對西藏命運的拯救。

一九八九年班禪大師魂歸佛境之後，境內藏人從未停止的反抗運動，是在執行十世班禪大師拯救西藏命運的遺囑。

與鐵血暴政抗爭，爭取做自由人的權利，當然是崇高而艱難的事業；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境內藏人反抗運動的艱難不僅來自中共強權，而且來自一個本來不應當為境內藏人的反抗運動增加艱難的地方，即達蘭薩拉。

桑東仁波切【註1】任流亡西藏噶廈總理十年。

他主政時期，達蘭薩拉癡迷於同中共暴政談判，並公開申明只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桑東仁波切主張的這條政治道路意味著大荒謬，其大荒謬至少有下列三項：

一、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悖逆藏人歷史上走過的艱難而光榮的自由之路。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西藏主政者交出雪域國門的金鑰，中共遂入主西

藏。數年之後，中共便開始以「民主改革」的名義，在全藏區發動當代滅佛運動，試圖摧毀藏人傳統的忠實於心靈的生活方式，並透過滅絕佛教，從文化的意義上滅絕藏人。暴政逼迫之下，藏人舉行全民大起義，用血河來證明對心靈的忠誠；又有八萬藏人追隨達賴喇嘛，翻越喜馬拉雅雪山，走上艱苦卓絕的流亡之路。

那是一條通向自由的路，因為，它走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

中共的專制惡法就是囚禁自由的法律黑牢。

我因此讚譽達賴喇嘛，並尊稱他為「當代摩西」，因為，是他，引領藏人走出做中共的政治法律奴隸的命運，走向自由；這條流亡之路既是自由西藏運動的起點，也是達賴喇嘛歷史榮耀的起點。

現在，事隔半個世紀之後，桑東仁波切卻要引領流亡藏人和西藏的命運，重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之內，即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法律巴士底獄（編按：「巴士底」法文意為城堡，是十二世紀法王查理五世為防禦英國人進攻巴黎（史上「百年戰爭」期間）所建的又高大又堅固的要塞。十四世紀末改爲

監獄，專門關押政治犯，後「巴士底獄」一詞即由此而來）中，去尋找所謂「真正的自治」。

歷史不禁感到困惑，並追問：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有「真正的自治」，當年又何必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管轄，踏上艱難的流亡之路，到異國他鄉去尋找自由？五十年滄桑，又回到命運的原點，即專制惡法的巴士底獄中，桑東仁波切將怎樣面對那些為做自由人死在流亡命運中的藏人的靈魂？

無論如何，我不相信，悖逆光榮的歷史，背叛自己過去留在心靈間的足跡，能夠贏得今日的尊嚴和自由。

二、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違悖現實的政治結論。

從一九五九年藏人大起義的血海淚濤，到今日自焚藏人生命中騰起的金色烈焰；從十世班禪發出「勿使我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的大悲之音，到十世班禪站在刀鋒上宣示的復國召喚——

所有這一切屬於西藏命運的苦難和悲愴，都在表述同一個基本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只有奴役，沒有自由；只有滅族亡國的痛苦和屈辱，沒有自由人的權利和尊嚴。

桑東仁波切盲目於藏人用無盡的苦痛書寫的現實政治的結論，想在專制惡法之內，尋求以「真正自治」的方式獲得自由，無異於癡人說夢，水中撈月，與虎謀皮；如果有一日他真的把自由西藏運動引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他個人或許能得到某種「歷史地位」——

那是中共暴政賞賜給奴才的獎品，而自由西藏運動將淪為鐵幕陰影下的囚徒。

三、桑東仁波切主張的政治道路將自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命脈。

流亡境外的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力之源泉，在於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血脈相聯。強化這種聯繫，境外自由西藏運動才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這種聯繫被切斷，境外自由西藏運動勢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流亡藏人同境內藏人的政治聯繫，取決於流亡藏人是否作出努力，利用自由的空間，向世界和歷史講出境外藏人心靈的苦痛和政治願望；如果流亡

藏人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理解境內藏人的苦痛和願望，並代表境內藏人發出他們在專制鐵幕下無法發出的聲音，那麼，對於西藏的現實命運，流亡者將像天外的一縷風塵，遙遠而陌生。

正如境內藏人智者群體所指出的，自十世班禪大師蒙難之後，西藏境內反抗運動具有思想慶典意義的特徵，就是西藏復國意識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崛起在歷史的地平線上——

失去祖國，就失去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西藏復國，藏人才能獲得自由人的尊嚴；藏人的自由之路，就是西藏的命運走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的復國之路。

但是，桑東仁波切卻要把自由西藏運動帶回到中共專制惡法的黑牢之中；他的政治路線背叛了藏人用紅血和白骨表述的政治願望，背叛了西藏復國的理想——

桑東仁波切試圖用他的政治路線之刀，斬斷流亡藏人和境內藏人反抗運動之間的血脈聯繫。如果他最終成功了，他就斬斷了境外自由西藏運動的生命線。

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共對於流亡藏人最關注的有兩件事：

其一是預作全面準備，一旦達賴喇嘛圓寂，中共便立即開始操控尋找靈童的程序，以便最終像製造偽十一世班禪那樣，製造一個偽十五世達賴喇嘛，從而讓「達賴喇嘛」這個概念實質上變成披著絳紅僧衣的共產黨員。

其二便是誘使達蘭薩拉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

桑東仁波切一方面堅守背棄西藏復國理想的政治道路，另一方面則極力迎合中共想把「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概念從歷史上抹去的努力。

按照桑東仁波切退休前的政治安排，他退休後不久，「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便被放棄，代之以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隨後，原來的西藏流亡政府總理也改稱「司政」。

至此，中共從政治上消滅「西藏流亡政府」的戰略企圖，在桑東仁波切心領神會的配合之下，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便取得歷史性成功。

在現象世界中，表述就是存在；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而稱號乃是經典

的具有象徵性的表述方式。

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稱，首先意味著達蘭薩拉由原來的代表和領導境內外全體藏人爭取自由的政治組織，退化成一個只管理十餘萬流亡藏人日常生活事務的行政機構，最多也只能算一個人權團體，而且是一個溫和如羔羊的人權團體——

面對境內藏人壯麗悲愴的自焚抗暴運動，他們所做的最積極的事，就是用冷漠的外交辭令切割與自焚者的關係，而不敢高聲向國際社會講出自焚藏人心靈的悲情、現實的苦難和所承受的人格侮辱，彷彿自焚藏人不是他們的族人，似乎他們和自焚藏人不屬於同一個歷史命運和祖先的血脈延續。

然而，事情還沒有就此爲止。

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期，同中共簽訂「十七條和平協議」表明，西藏的主政者將綿延數千年的西藏主權交給了中共暴政——

如果是被迫交出，那意味著歷史的悲劇；如果是心甘情願地交出，則不是愚蠢，就是怯懦。

不過，十七條協議至少沒有明確取消西藏政府，也就是說，作爲藏人祖

先政治遺產的西藏治權還一定意義上存在——

主權是治權的靈魂，治權是主權的實現形式；治權作為主權的殘跡繼續存在，常會引發對主權的懷戀。

現在，桑東仁波切埋葬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就意味著對西藏治權的否定，並進而徹底否定西藏主權，徹底得連一絲懷戀都不要。

在此，人們不禁要問：

當年交出西藏主權，藏人只換來了地獄之苦，只換來了幾乎亡教滅族的大劫難；如今桑東仁波切稱中共暴政之意，徹底否定西藏的治權，他究竟想幹什麼，他又能為藏人換來什麼？

無獨有偶。

因為取消「西藏流亡政府」而沒有資格再稱「總理」，只能降格稱為「司政」的洛桑森格，已經充分顯示出他只是桑東仁波切的一條渺小的政治尾巴，而且在討好中共的表現上，洛桑森格更加妖嬈萬端，媚態百出，像一隻會討主人歡心的寵物。

當前，境內藏人正在用燃燒的生命表述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正在用紅焰

焚身裂骨的苦痛表述對中共西藏政策的悲愴抗爭，洛桑森格卻向國際社會公開宣稱：

他，以及他所代表的「行政中央」，不挑戰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也不追求在西藏改變中共憲法，實現自由民主；他要的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

這個對中共本質和實際政治運作毫不了解的無知者似乎完全忘了，西藏現在實行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而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對藏人的自由命運只意味著東方的巴士底獄。

洛桑森格的上述宣示，與境內藏人的追求與希望，可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風馬牛不相及。我不能不意識到，洛桑森格，這個喝美國的爆乳母牛的奶長大的人，他完全不理解西藏高原上喝犛牛奶長大的藏人的心靈，就像他從來沒有機會領略雪域高原上那浩蕩之風的神韻。

他的意識中只有西方政客功利實用主義的淺薄的小聰明，而沒有藏人英雄人格的真實與堅硬。

就是這樣一個政治小動物，曾經聲稱他代表這個地球上所有的六百萬藏

人。他根本不理解，一個聽不懂境內藏人心底裡的呼喚的人，聲稱自己代表所有藏人，只意味著缺乏自知之明的愚蠢，以及屬於政治侏儒的狂妄。

我有一言，請所有試圖做六百萬藏人代表的人們靜聽：你想要代表藏人嗎？那麼，就請你向國際社會和人類歷史說出藏人心底裡的追求吧；那已經浴血半個世紀以上的追求就是——

自由西藏與西藏復國。

中共暴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而荒淫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中共暴政是對東亞大陸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類罪行的犯罪集團；中共暴政是中國歷史上最陰狠無恥的賣國賊集團——

它出賣了中國人文化的祖國，心靈的故鄉。

中國人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即中共暴政是當代中國的萬惡之源；只有徹底掙脫中共極權對中國命運的統治，實現民主憲政，中國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現在爭論的只是掙脫中共暴政統治的具體方法。

桑東仁波切尋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的政治道路，以及洛桑森格上述一系列媚共言論，實質上是在論證中共暴政政治法律制度之合理性和權威性，也是在論證中共暴政存在的合法性。他們的論證不僅違悖六百萬藏人的根本利益，也極大地傷害了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的進程。也許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與中共暴政為友，與十五億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為敵。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海外民運」的某些小政客仍然像街頭拉客的妓女一樣，拉著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以及他們代表的政治道路不放。

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中國「海外民運」不懂得他們要回到中共憲法框架內的政治路線對於中國自由民主事業的傷害，而是根本不在乎這種傷害。

中國「海外民運」的某些小政客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早已年老色衰，爲了不被命運完全拋棄，他們只在乎一件事，即如何利用一切機會證明自己還有剩餘價值——

能夠同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一起站在媒體的聚光燈下，是他們所剩不多的證明自己價值的方式之一。

當然，在那種場合，媚共的桑東仁波切和洛桑森格是明星演員，中國「海外民運」渺小如鼠的政客只是三流的伴舞舞娘。

桑東仁波切取消「西藏流亡政府」之舉，既使境內外藏人的反抗運動失去了一個統一的政治領導組織，又摧毀了藏人繼承自祖先的治權，並再一次徹底否定西藏的主權。

正是由於這些政治效應，中共的涉藏官員才在達蘭薩拉改稱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之後，彈冠相慶，並將其歸之於胡錦濤治藏的一大功績。

習近平主政之後，更用一句話說出此中關鍵——

二〇一三年五月，中共決策層召開的一次涉台、涉藏的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講：「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說明『達賴集團』進退失據，信心喪失殆盡，接近變成政治破落戶了。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這個『寶貝』對我們保持西藏穩定還有一些『剩餘價值』。我們在政策上要作出一些調整，讓達賴的靈童也為穩定西藏發揮一點餘熱吧。」

為摧殘從十世班禪大師佛心中湧出的當代西藏佛教復興運動、西藏文化

復興運動和西藏復國運動，中共強權鳩殺十世班禪大師的肉身，又將他的靈童關在專制鐵棺之中，成爲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幽靈，並把僞十一世班禪當作政治花瓶，擺在中共極權的殿堂上。

與此同時，桑東仁波切則導致「西藏流亡政府」自殘，並通過悖逆境內藏人反抗運動根本訴求的政治路線，實質上斬斷了境內外藏人之間的政治血脈聯繫，現在，中共暴政剩下的只有一項當務之急，即捕獲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

習近平就此作出指示：「精心設計，謀定後動，一定要把控制達賴喇嘛靈童這件事做好，儘量避免出現兩個班禪那樣的現象。」

根據這個指示，中共各涉藏機構在統戰部統籌協調之下，已經高效率地制定出並開始實施誘使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計劃。

地方當局斥巨資加速修繕達賴喇嘛故居，某些寺廟宣布可以懸掛達賴喇嘛法相，甚至有御用學者和官員放出風聲——

達賴喇嘛可以先到香港講經，條件成熟時也可以回家鄉講經，等等這些動態都是上述計劃的表現。

一時之間，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用化爲烈焰的生命抗爭暴政的自焚藏人和中共暴政的代言人，似乎都希望達賴喇嘛能夠回家。不過，只要不是白癡就可以一眼看出其中的原則區別——

藏人祝願達賴喇嘛能夠歸國，是希望他給雪域帶來自由，給藏人帶來尊嚴和復國理想的實現；中共暴政的代言人則指望達賴喇嘛回來，做一個擺在中共極權暴政殿堂上的政治花瓶，如此一來，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尋找轉世靈童就自然淪爲中共絕對控制的政治過程。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維吾爾反抗運動在新疆發動針對一處中共警察局的襲擊；約二十名中共警察在攻擊中被打死，反抗運動也有十餘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中共暴政的御用宣傳工具和文化特務，一直試圖讓世界相信維吾爾反抗運動屬於國際恐怖主義的範疇。

然而，維吾爾反抗運動的上述襲擊則明確劃清了自己和恐怖主義之間的原則界限。因爲，這次襲擊的目標鎖定的是中共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暴

力機器，即警察局，而沒有傷害不特定的多數人。

幾百年前，偉大的盧梭提出，人民在暴政前擁有天然合理的起義的權利。從歐洲的尼德蘭革命（編按：「尼德蘭」為地理名詞，意為低窪之地，指今荷、比、盧地區，十六世紀初為西班牙領地，一五六六年爆發反西統治的人民起義，史稱「尼德蘭革命」）到美國的獨立戰爭，都以歷史的名義證明，如果人民喪失在暴政前起義的權利，人類社會直至今今天可能都還在中世紀的千年專制暗夜中徘徊；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是社會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締造者。

當代國際恐怖主義和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之間，涇渭分明，界限清晰，不可混淆。

國際恐怖主義的基本特徵在於，為實現特定的政治意志，採取危害不特定的無辜者的生命財產的方式，造成社會恐怖的行爲——

要害是，為自己獲得政治利益而對社會和一般平民實施暴力襲擊。

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的基本特點則在於，起義行爲打擊的對象只限於暴政用以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專制統治的國家暴力機構，而絕不針對普通民眾

和社會公共設施。

就中共暴政而言，其國家暴力機構主要包括實行一黨專制的共產黨的各種機關、各級政府機構、警察以及武裝警察部隊。

長期以來，維吾爾人對中共暴政的抗爭從未止息，不過，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維吾爾反抗運動對警察機構的攻擊，則引起中共決策層前所未有的恐懼與緊張。因為，這次攻擊所鎖定的目標，明確屬於人民在暴政前的起義權的範疇。

中共極權專制已處於人神共憤、民怨沸騰的大危機之中，只要維吾爾反抗運動持續以中共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統治的貪官污吏、警察特務及其相關機構為打擊對象，勢將逐漸贏得漢人的理解、支持，甚至直接參與，畢竟漢人也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

這正是令中共決策層恐懼之處——

中共不怕恐怖主義，因為，中共本身就是恐怖主義的最凶殘的形式，即國家恐怖主義，但是，中共懼怕人民行使在暴政前的起義權利。

二〇一三年六月末，中共決策機構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名稱叫作「新疆西藏問題緊急工作會議」。同時開會研究新疆和西藏的問題，可見藏人的自焚抗暴運動也同樣引發中共暴政的深刻恐懼。由於新疆問題不是本書關注的主題，所以，關於中共暴政通過這次會議所確定的對維吾爾反抗運動的鐵血鎮壓政策，在此不再贅述。

上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西藏問題，習近平卻指定由現在擔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胡春華作主題發言。

由胡春華作西藏問題的主題發言，原因大致有兩項：

其一，胡春華雖然兼任廣東省委書記，但他同時是中共寡頭決策機構，即政治局的委員，負有對維護中共統治的全局性責任，同時，他也正在被重點培養為未來「中共第六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

其二，胡春華有長期在西藏任職的經驗，在鎮壓西藏佛教復興運動和復國運動過程中，表現出維護中共極權統治的冷血的意志。

更關鍵之處在於，中共把謀殺十世班禪，湮滅十一世班禪，扶持偽十一世班禪，視為控制藏人心靈，進而控制西藏的重大戰略決策之一，而在這個

戰略決策的實施過程中，胡春華為暴政立下「不世之功」。

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胡春華此次關於西藏問題的主題發言，時間長達九十五分鐘。現將胡春華此次發言的內容，用讀者易於理解的表述方式，摘要披露如下：

發言甫一開始，胡春華就以佞臣諂媚帝王之態，為習近平的治藏之策，獻上溢美之辭。他稱頌習近平把控制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作為下一階段對藏工作的重點，乃是具有大戰略眼光的長治久安之策。

胡春華指出，控制達賴喇嘛轉世靈通的關鍵是要使達賴喇嘛在符合中共政治利益的條件下，返回中國。

同時，他也就誘使達賴喇嘛返回中國的條件，提出一項原則，即「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宗教問題上可以充分滿足達賴的合理要求」。

胡春華解釋說，「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的原因在於，「對達賴集團在政治上的任何讓步，都會在與我黨長期榮辱與共、同心同德的藏族幹部中引起疑慮和惶恐，深刻傷害他們的感情，所以說，政治讓步等於自毀長城。」

胡春華這句話意在說明，把靈魂出賣給中共的藏人官員是中共統治西藏的政治基礎之一；對達賴喇嘛作出政治上讓步會使這個政治基礎軍心動搖，士氣渙散，直接威脅到西藏的政治穩定。

胡春華所說的「政治問題上寸步不讓」原則，具體有下列三項內容：

其一，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公開承認「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公開否認西藏曾經作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

胡春華認爲，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迫使達賴喇嘛服從中共的意志，有利於從歷史的角度徹底摧毀「藏獨」的理論基礎以及西藏復國運動的情感依託。

其二，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承認中共憲法對西藏高原的分割式行政區劃的合理性，即承認歷史上西藏的衛藏、康藏、安多三區的國土，按照中共現行憲法分屬「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甘肅省、雲南省是合理的，同時公開放棄「大藏區」的訴求——

中共所謂的「大藏區」就是現在被分而治之的西藏歷史上固有的國土。

胡春華認爲，只要促使達賴喇嘛從政治上放棄「大藏區」的概念，就一勞永逸地斬斷了達賴喇嘛與西藏境內的藏人反抗運動的聯繫，因爲，境內藏

人反抗運動，一直是以由衛藏、安多、康藏三區構成的西藏歷史上固有國土，作為復國理想的基礎；這種聯繫一旦被斬斷，達賴喇嘛就失去了政治能量的基礎，變成政治的水上浮萍；境內的藏人反抗運動則喪失了一個重要的國際影響力的背景。

其二，中共必須要求達賴喇嘛事實上接受中共確認的偽十一世班禪，同時默認達賴喇嘛認定的十一世班禪更登確吉尼瑪形消蹤滅的事實。

胡春華指出，藏傳佛教轉世靈童的認定表面上看屬於宗教範疇，實質上事關重大的政治問題；只要達賴喇嘛以默認的方式事實接受中共確立的偽十一世班禪，放棄他自己認定的十一世班禪，就等於接受了一個基本的政治原則，即中共政權在轉世靈童的認定上有最後的決定權，如此一來，今後世代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靈童轉世的過程都將處於中共的政治控制之中——控制了這兩個靈童轉世【註2】，就等於控制了藏人的靈魂。

在這個問題上，胡春華的發言還透露出更為陰狠的政治權謀。

胡春華特別強調，達賴喇嘛一旦在十一世班禪的問題上作出中共所要求的妥協，不僅勢必重創達賴喇嘛在藏人中的道德形象，而且會引發藏區一萬

多名「仁波切」，即漢語所說的活佛對達賴喇嘛的道德質疑，因為，靈童轉世是萬名活佛存在的宗教基礎，在靈童轉世的問題上任何出爾反爾、首鼠兩端的行爲，都會引發他們的強烈不滿。

胡春華就此總結道：「從唯物主義的立場來看，靈童轉世是荒謬的迷信，但唯物主義者更應當實事求是。現在一個事實是，這一萬多名大小活佛在藏區有很大的影響，達賴喇嘛事實承認我黨確認的十一世班禪，勢必引起這個群體的不滿，他的精神權威也必將受到極大削弱。一個道德和宗教倫理破產的達賴喇嘛，也就不再可能擁有足以威脅西藏穩定的精神和政治能量。」

爲誘使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全面妥協；中共準備在宗教問題上滿足達賴喇嘛的願望。就此胡春華在發言中提出具體的方案。

方案的內容可以概括如左：

在達賴喇嘛公開全面滿足上述中共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分四步滿足達賴喇嘛的宗教願望：

第一步，允許達賴喇嘛進香港舉辦法會。

第二步，允許達賴喇嘛回到大陸，在五台山建廟作爲達賴喇嘛的道場。

第三步，將雍和宮贈給達賴喇嘛，作為其在北京的駐錫地。

第四步，允許達賴喇嘛返回青海和西藏，並以國家的名義，將布達拉宮的所有權交還給達賴喇嘛。

為誘使達賴喇嘛全面接受中共的政治條件，胡春華還在發言中提出另一個方案，即採取有效措施，繼續強化達賴喇嘛可以成為中國十三億人的宗教精神領袖的幻想。

胡春華指出，胡錦濤主政期間，中共已經透過在全球「藏漢協會」和「中國海外民運」中長期培養的秘密力量，成功地製造出諸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漢人都視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的幻想，並有效地運用這種幻想，強有力地影響了桑東仁波切等流亡藏人上層人士。

胡春華認為，上述幻想在促使桑東仁波切放棄「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今後，透過滲透進「藏漢協會」、「中國海外民運」的中共秘密力量，進一步強化這種宗教幻想，勢將有利於促使達賴喇嘛在政治上徹底妥協。

在這次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習近平對胡春華關於西藏問題所作的發言給予充分肯定，認為胡春華的發言「有原則，有策略，有方法」。

會議最後通過了習近平提出的今後一段時間涉藏工作的總體方針，即「堅定不移地維護西藏和其他藏區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在這個前提下，以控制達賴靈童轉世為工作重心，夯實西藏長治久安的基础。」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中共建黨日慶典之際，由劉少奇之子劉源和李先念女婿劉亞洲出面，邀請數十名「太子黨」成員在北海仿膳舉辦酒會；酒會只有一個主題：為習近平執政出謀劃策。

酒會上，孔丹【註3】，中共資格最老的特務頭子之一孔原【註4】之子，為習近平的西藏政治戰略擊節讚嘆。

孔丹有一個怪癖，即習慣用粗俗下流的形容顯示自己的才華，他說：「近平的西藏政治戰略高妙至極，大有諸葛孔明之風。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能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控制起來，我們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犛牛的兩個犛丸，看他還怎麼撒野。」

「能看到班禪和達賴聽從我們黨的號令，一代又一代互相認證轉世，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比看毛片有意思。」

上述孔丹之言盡顯中共暴政對西藏的鬼魅陰險之意，詭譎狡詐之心。不過，相信以達賴喇嘛的睿智如海，定然不會在中共誘騙之下返回中國，因為，那是一條通向地獄之路。

對於達賴喇嘛和流亡的藏人，只有在西藏擺脫中共暴政統治的自由慶典中返回家園，才是唯一光榮的命運之路。

現在，又有心懷叵測者把中共實施誘使達賴喇嘛返回大陸的計劃，形容為中共對西藏的政策開始軟化。

不過，只要不是腦殘，都會看出一件事：

中共對西藏的政策不是軟化，而是更加陰險；柔軟的絲綢手套裡面，是一隻冰冷的鐵手。

歷史又一次把西藏命運推上生與死的鋒刃——把西藏的未來永遠關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只意味著西藏的自由命運陷於絕境死地；走

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鐵牢，與走向自由是同一回事，無論五十餘年前還是今天，情況都是如此。

只願藏人能記住一件事：為免於亡教滅族的命運，十世班禪大師曾經站在生與死的鋒刃上，發出西藏復國的悲愴召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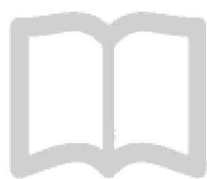
註釋：

【註1】桑東仁波切：洛桑丹增，一九三九年生於西藏扎洛，為第五世桑東仁波切，曾任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相當於內閣總理）。二〇〇一年，當選西藏流亡政府噶倫赤巴，二〇〇六年連任，二〇一一年卸任。二〇一二年，他主導取消「西藏流亡政府」的稱號，徹底放棄了西藏延續數千年的治權。

【註2】兩個靈童轉世：根據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傳統，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世代互為師徒，互相認證彼此的轉世靈童。

【註3】孔丹，孔原之子，中共太子黨核心成員。

【註4】孔原（一九〇六—一九九〇）原名陳鐵錚，江西萍鄉人。曾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



第十章

現代滅佛運動的罪惡之源

——漢人的苦難和罪責

從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中葉至今日，藏人命運受到魔鬼的詛咒，一直在重
重苦難中蹣跚。

那是血海屍山表述的苦難，那是毒焰焚毀心靈的地獄之苦。

在悲泣的苦難中黯然湮滅，還是從浴血的苦難中壯麗崛起——

這是歷史對藏人文化命運的最後一問。

此刻，我不知道歷史將得到怎樣的答案，不過，我清楚，再次壯麗崛起
必須以認清苦難來自何方為前提；迷失了對苦難來源的認識，既不可能找到
追尋幸福的方向，也不可能找到征服苦難命運的道路。

那麼，究竟誰應當為藏人的苦難負責——

中國文化，漢人，還是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現代復活？

西藏高原是地球上離蒼天最近的地方，也是離死亡意境最近的地方。藏
人只要越過雪線，走上生命的禁區，就可以從荒涼的白雪間呼吸到死亡那凜
冽而清新的芳香，就可以從晶藍的天空和瑩白的雪峰間聽到死亡的召喚，就
可以親吻和撫摸覆蓋在鐵黑色或者青銅色岩石上的死亡的神韻，就可以從淺

藍色的風中領略到死亡的聖樂。

因此，藏人不可能不把關注死亡當作最重要的生命課題之一。

對死亡的形而上的關注正是心靈的起點，也是佛學哲理的起點。所以，西藏高原天性屬於心靈，屬於佛。

不過，遠古歲月裡，生命的原始野性也曾經在荒蠻的高原上蓬勃浩蕩；從原始野性中湧現出中亞大陸最遼闊的帝國，最金碧輝煌的王冠——

那是長刀與狂風的帝國，那是英雄人格的王冠。

但是，藏人的命運最終還是依照西藏高原天啓的靈性，皈依心靈；藏人成爲佛的選民，雪域沐浴於佛光之中。從此之後，藏人用岩石般真實的天性，創建出一種以心靈爲起點和歸宿的生活方式，從而在人類歷史的仰視中，肯定人人都可以進入佛的意境，即成爲純然的心靈存在。

即便對於生活在東亞大陸低地的人群，這種仰視也不僅限於地理的意義，而更意味著精神意義上的崇敬。

西藏高原和中原之間的歷史關係，曾經證明了這種精神的仰視。

由長刀與狂風的存在演進爲禮佛金燈之下的寧靜心靈存在之後，如何在

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中保持佛國命運的獨立性，就是藏人不得不面對的歷史主題之一。

因為，塵世首先不屬於心靈，而屬於強權。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藏人是幸運的，他們似乎由於忠實於心靈而受到蒼天的佑護。

蒙古人和滿人先後入主中原，他們建立的中原強權在一定意義上成爲中國文化的代言人。

入主中原之後，蒙古人和滿人先後同藏人命運發生直接碰撞。不過，蒙古和滿清既不希望改變藏人作爲心靈存在的生活方式，也不追求讓藏人淪爲他們的奴隸；這兩個輝煌的強權並不試圖摧毀西藏的獨立命運，而只滿足於用戰刀在藏人的國門之柱上刻出草原之風的痕跡。

與之同時，在心靈的意義上，面對佛的意境，蒙古人和滿人都虔誠地摘下皇冠——

藏傳佛教被蒙古人奉爲民族宗教，滿清皇朝則把來自西藏高原的梵音視爲精神導師。

漢人皇朝與藏人的愛恨情仇的歷史則更為久遠。

在深長久遠的歷史中，最令人矚目的事件，是由藏人的榮耀和漢人的屈辱共同來表述：

唐朝皇帝用皇族的女人，向藏人的刀鋒換取卑微的和平；唐朝皇族的女人給西藏高原帶去漢文化的祝福，唐朝皇帝則躲在女人香艷的肉體構成的盾牌之後，繼續展示專制者的威嚴，並忽略了那片遼闊高原的存在。

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女人的尊嚴的民族根本不配存在；需要靠出賣女人的肉體換取安全的男人，連男妓都不如。

「知恥近乎勇」，然而可恥的至極之處在於，歷代中國文人不僅沒有勇氣直視這種民族人格的醜陋，反而謳歌用女人香艷的肉體交換和平的醜行，將其稱譽為漢藏友好的典範。

民族人格特徵決定民族命運風格，或許正是贏露在漢民族歷史上的醜陋使上蒼產生厭惡之意，二十世紀才成爲中國文化遭受天譴的世代——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以共產黨作爲政治代理人，徹底摧毀了漢文化的

萬年歷史——不僅摧毀了她的醜陋，更摧毀了她風華絕代、傲視千古、豐饒富麗的文化之美，摧毀了她魅力無限的精神故鄉。

漢人的文化命運悲劇進而演進成藏人命運的劫難；「共產主義幽靈」的惡咒隨之降臨在西藏高原之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經把靈魂出賣給「共產主義幽靈」的漢人軍隊，像無數隻黃螞蟻湧入西藏。

如果相信人的本質在於文化的存在，那麼，共產黨及其軍隊就不再是漢人，因為，命運剝出他們的中國文化之心，給他們換上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魔鬼的靈魂。他們已經異化為一個在精神風格的意義上與歷史間的漢人完全不同的種族，這個種族的名字就叫作「中國共產黨人族」，他們是魔鬼的選民。

面對以生命為價值之王的傳統生活方式的危機，藏人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困惑之中。

藏人發現，共產黨漢人同他們的祖先過去幾千年來接觸過的漢人，在文

化內涵、情感風格、思想方式、行爲準則等所有方面都完全不同，共產黨漢人彷彿屬於另外一個世界，屬於完全非東方風格的種族——

平靜時，他們的眼睛像蛇或者蜥蜴的眼睛一樣冰冷、呆板；憤怒時，他們的眼睛會像食腐屍的野狗眼睛，充滿血紅的凶殘意味；激動時，他們的眼睛則如同剛用砂紙擦過的鉛球，閃爍起金屬的光澤。

藏人茫然地注視著這個崇拜物性邏輯如同崇拜上帝的陌生種族，就像注視從地獄中湧出的厲鬼。

許多人至今仍然徘徊在歷史的大困惑之中，其中包括鐵幕之下英勇抗爭暴政的人們。

作為西方極權文化傳統的現代經典表述，共產黨文化爲什麼會主宰東亞大陸，並成爲屠戮藏文化的劊子手？作為西藏苦難政治根源的中共暴政，其精神的發源地在哪裡？找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走出歷史大困惑的必由之路。我們將以西方文化發展邏輯爲思考引導，回答這兩個令歷史和現實茫然的問題。

共產主義和中共暴政的文化之源，是流淌在歐洲中世紀千年暗夜下的極

權主義血河；沿著那條血河，還可以上溯至古猶太智慧中湧現出的真理絕對主義意識。共產主義和中共暴政的精神風格，同中世紀天主教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相似得有如兩個骷髏。

且允許我略論它們的相似之處如下：

歐洲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共暴政，這兩種文化現象，都以創建絕對真理作為思想的終點，並以絕對真理的名義，運用鐵血強權，要求對人類心靈的絕對控制權。

只不過所謂「絕對真理」，一個表現為來自上帝的宿命，一個表現為來自物性的客觀規律。

這兩種文化現象，都設立終極的理想來誘惑歷史，並以終極理想的名義，要求對人類命運的主宰權。

不同之處只在於，一個理想屬於地平線之外的天國，另一個理想則是地平線之內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兩種文化現象，都把普遍的社會仇恨奉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如此

一來，仇恨便真理化因而神聖化。

這種具有「歷史原動力」價值的仇恨，以神聖真理的名義，衝決人性和道德的堤壩，表現為殘酷至極的國家恐怖主義和獸性的氾濫；區別只在於，前者仇恨的對象被設定為異教徒，後者仇恨的對象則冠名為「階級敵人」，或者「敵對勢力」。

這兩種文化現象，都把摧殘精神多元化和推動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視為實現絕對真理必須履行的天職；不同之處只表現為，前者的絕對真理是來自天主教羅馬教廷對《聖經》的理解，後者的絕對真理是來自德國猶太人馬克思對物性邏輯和歷史必然規律的「科學認識」。

這兩種文化現象，都以拯救人類作為世界性極權政治擴張的道德基礎；只不過前者要實現的是天主教對世界的絕對統治，而後者要把所有族群的靈魂都囚禁在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社會概念之下。

這兩種文化現象都設立組織嚴密的具有精神特權的團隊，而且其精神特權又得到專斷的政治特權的加持，用以對全社會實施鐵血統治；不同之處只在於，一個精神特權集團稱為教士階層，另一個精神特權集團稱為共產黨。

我們還可以從更多角度，對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和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共暴政的同質性作更全面的審視。

然而，面面俱到，往往意味著主題淹沒於瑣碎之中；僅根據上述對比分析，已經足以使人看清，這兩種文化現象遠隔千年時間顯示出的精神風格的相似性——

它們具有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共同基因；共產主義以及中共暴政，是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鬼魂的近現代復活。

不過，正如古希臘哲人指出的那樣，世間沒有完全相同的事與物，甚至兩滴海水也有差別。

以共產主義名義復活的西方極權文化傳統也必然表現出時代的特徵——時代特徵，那是中世紀鬼魂開啓近現代復活之門的鑰匙。

從思想形式的角度審視，共產主義最主要的時代特徵可以概括如下：

由於古希臘文明的復興是近現代史的時代精神的主宰者，所以，西方極權主義儘管本質上源於古猶太智慧的絕對真理意識，但是，它的近現代復活

的經典形式，即共產主義，卻不得不披上源自古希臘智慧的思想外衣。

於是，詭辯論與唯物主義的結合，宿命論與物性邏輯意識的聯姻，等等一系列具有明確古希臘智慧個性的理論，便為馬克思主義作哲學的奠基；同時，鑒於從古希臘文明自然理性崇拜中崛起的科學理性成為時代的力量象徵，馬克思又用「科學」的名義，裝飾他的共產主義宿命論之屋。

只配用淺薄的思維能力觸摸表象的庸人學者，根據共產主義理論的外形，便將其歸類為古希臘文明復興的範疇。

這種歸類是錯誤的。

因為，共產主義的本質不在於理論的外形，而在於理論外形所承載的極權主義靈魂——

以宇宙絕對真理的名義，索要對人類精神世界和現實命運實施鐵血專制的權力，並論證文化性種族滅絕政治的合理性。

從歐洲到東亞大陸，共產主義政治實踐的全部內容，都表現為極端的極權專制政權，以及與這種權力模式共生共存的國家恐怖主義。

這種實踐的結論正是共產主義精神本質的體現。

創立唯一的宇宙真理的思想暴君，否定精神和信仰自由，肯定宿命——這才是極權文化的本質。至於思想暴君被謊稱爲上帝的意志，還是必然的物性規律，並不決定政治本質。

「還魂的鬼是醜陋的」。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以上帝的意志作爲絕對真理，畢竟還爲人類的精神救贖保留下一絲餘地，即生命的神聖感；只要生命神聖感還沒有完全凋殘，人類就不至於徹底墮落爲魔鬼。

馬克思將絕對真理表述爲物性規律，意味著共產主義是以物性崇拜爲最高信仰的宗教，人的精神則被歸結爲物質的一種存在形式。

這既是對人的概念的侮辱，也是對生命神聖感的根本顛覆：

人本質上不過是一塊物質，一堆塵世的慾望，一團終將在死亡中腐爛發臭的肉。

對人的本質懷抱如此陰鬱的觀念，人格的高貴和美就失去了可能。這正是中共暴政大規模虐殺人類時顯出無與倫比的粗俗與冷酷的哲學原因——殺人，就像劈開一塊塊腐朽的木頭。

共產主義恰恰是西方極權文化的最俗不可耐的墮落形式。我對其厭惡至極：

我厭惡鐵血強權維護的絕對真理，因為，它意味著思想的墓碑和囚禁精神自由的鐵牢。

我厭惡以仇恨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因為，這種觀念陰鬱得像劊子手的眼睛。

我厭惡把人的本質視為一塊物質、一堆蠕動的物慾，並把人類命運表述為經濟決定論，因為，那太粗俗，太接近奸商只能聽懂金錢召喚的心。

我更厭惡塗在醜陋理論上的理想主義油彩——

就像裝嫩的老女人臉上厚厚的脂粉，經常由於皺紋神經質的抽搐而掉落下來。

既然厭惡，為什麼還要在本著作中引導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作思想的關注？原因很簡單——

只因為來自西方的魔鬼，馬克思主義，不僅把惡毒至極的詛咒加諸於西藏高原，而且首先加諸於中國的命運之上。

中共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人，是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專制集團。

中共統治中國的過程表述曠古絕今的文化悲劇：在西方極權主義的文化性種族滅絕之下，中國文化精神香消玉殞——

那比生物性種族滅絕更加殘酷，因為，被屠戮的是曾經屬於金色種族的靈魂，而心的悲苦超越肉體疼痛。

中共建政以來的全部歷史，就是中國淪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殖民地的過程，中國早已喪失文化的祖國，心靈的家園；中共權貴是中國萬年歷史上罪惡最為深重的賣國賊集團，它背叛文化的祖國，出賣精神的故鄉，摧毀心靈的家園；中共權貴的政治奴隸和西方極權文化控制下的精神亡國奴——這便是今日中國人的真實地位。

當年遊學燕趙之地時，我曾在北京某所大學中，與十幾位藏人學生縱酒。那群康巴人（編按：居住於「康區」的藏族人。康區範圍大約包括藏東的昌都、那曲東部、林芝東部地區及清海玉樹、四川甘孜、雲南迪慶等藏族自治州）神韻天

成的形象英俊剛毅——

長眉如雄鷹展翅，頭顱似鐵鑄銅雕的藝術品。

狂飲大醉之後，藏人竟仰天長哭；康巴鐵漢的悲聲，直可斷金碎石。其中一人似向蒼天大地傾訴心之苦痛，而發悲愴欲絕之聲：

「共產黨要剝出藏人的心，給我們換一顆漢人的心。」

當其時也，我亦感焚身裂骨之痛，卻又欲哭無淚，只能讓一聲長歎飄散於荒涼的沉默之中：

「藏人竟不知，中共狗官首先剝出的是漢人的中國文化之心，並給漢人換上來自西方的魔鬼之心；漢人的靈魂已死，活著的，只是魔鬼的詛咒——中共暴政給藏人換上的，也是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心。」

如果把西方極權主義文化視爲一種生命存在，那麼，這種生命存在的天性在於，運用鐵血強權所衛護的絕對真理的名義，透過控制人類的心靈，主宰歷史命運，獲得對世界的所有權。

而文化性種族滅絕就是展現魔鬼天性的基本方式。

中共建政之後，把國家恐怖主義發揮到血腥獸性的極致，爲共產主義文

化的理論形式，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思想暴君的加冕；一輪又一輪大規模思想整肅和政治迫害，其精神虐殺的鋒芒最終都指向中國文化。難以計數的承載中國文化之魂的生命，或者屍橫刑場，或者在苦役犯的命運之路上被荒涼的風吹散，或者變成鐵牢陰影下的一片黑紅的枯血。

他們凋殘了，他們枯萎了，他們消失了，隨著他們一起死去的，是中國的文化精神。

文化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典籍等一類非生命形式，另一種是人的心靈。

佛教密宗的傳承極重視上師的心口之傳，這意味著一種文化的哲理——真正的文化神韻只活在心靈中，典籍等非生命形式只是保存文化木乃伊的棺木；開啓棺木，看到的是文化的遺骸，從人的心靈中，才能領悟到生機盎然的文化神韻。

中共對千萬文化人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大迫害，大虐殺，承載中國文化的心靈被摧殘殆盡，中國文化也因此失去現實的生命形式，中國文化的幽靈只能黯然退出現實，退回落滿時間風塵的歷史陳跡中。

由於中國實行的是國家權力的共產黨寡頭集團私有制，所以，中共權貴有能力把國家權力絕對控制下的國民教育體系，也變成維護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常規性設置。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再到碩士和博士的研究生教育，共產主義的基礎理論，從哲學到歷史學，從政治哲學到政治經濟學，都是不變的學習主題。

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垃圾竟能佔有大學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課時，即便理工科也是如此。再加上密如蛛網的「共產主義神學院」，即中共黨校和團校的設置，中國人從學童啟蒙到高等教育的完成，乃至成人教育，無不處於具有巴士底獄風格的精神鐵牢中；裡面關押著自由思想的可能，或許還關押著中國文化的鬼魂。

無論庸俗的政客學者基辛格（季辛吉），還是繁瑣的亨廷頓（杭廷頓），或者更加渺小瑣碎的西方漢學家，當他們把中共官員及其御用文人的思想風格解讀為中國文化的象徵時，他們既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也是在侮辱中國文化。因為，中共的理論和實踐都在表述一個雄辯的事實：

讓神州淪為馬克思主義的精神殖民地，是中共權貴對西方極權主義文化魔鬼所作的政治承諾；擔當屠戮中國文化的行刑者，是中共實現魔鬼承諾的題中之意，是其「黨性」的歸依——

只有中國文化血濺刑場，魂飛魄散，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即共產黨文化，才能主宰中國人的心靈與命運。

中共暴政強加在當代中國命運上的憲法，其序言中載明，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應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奉為指導思想。

這是中共權貴在最高政治法律意志之上雕刻的紀功宣言。

在中國的土地上，憲法竟然以國家強制力的名義，迫使全社會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暴君的地位。這意味著，十五億中國人已經被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征服，淪為精神亡國奴；這座中共權貴的紀功碑，對於中國文化卻是恥辱的墓碑——

中國已經文化亡國！

《殺佛》是一本關於中共暴政弑佛的重罪之書，也是關於十世班禪大師

的悲情之書。中共弑佛重罪與班禪大師的悲情自然同西藏高原的命運直接有關。這也正是我們利用這本書的最後篇章，討論中國文化悲劇命運的原因。

對於個人，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誰，自然是人生一大憾事；對於一個族群，不知喪邦破國的原因，不知造成自己命運的苦難的根源在於何方，則是更深重的遺憾。因為，盲目於苦難的來源，就必然迷失走出苦難之路，並會在同險惡命運搏戰的過程中，陷入盲人騎瞎馬的尷尬境地，而無法用長劍準確地抵住命運的咽喉。

相信關於中國文化悲劇命運的討論進行到此，足以消除一種矇昧者的誤解，即中國文化應當為藏人的當代苦難和罪孽深重的滅佛運動負責——

中國文化已經淪為屠刀下的冤魂，又怎麼能對現實陽光下的罪惡負責？同時，也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中共暴政是萬惡之源，也是藏人苦難的根源；應當對西藏高原上當代的滅佛運動和文化性種族滅絕罪惡負責的，是中共暴政及其精神歸依，即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

認清並正視這個結論，將為自由西藏運動未來的發展提供至關重要的政

治座標，至少不至於繼續幻想透過在中共暴政「憲法框架內的真正自治」的方式尋求自由——

中共憲法框架內只有滅佛的罪惡和藏人的血海淚濤，沒有藏文化生存的權利；只有奴役，而沒有自由。

漢人和藏人的命運有共同之處。

漢藏兩族都是共產主義的受難者：兩者都在中共暴政下蒙受文化性亡國滅種的劫難；兩者都經歷過大屠殺、大逮捕、大飢餓、大迫害；兩者都被剝奪了屬於自由人的權利，淪為當代的政治奴隸和精神亡國奴。

但是，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務極力試圖讓世界相信一種謊言，即西藏問題本質上是藏漢兩族之間的民族矛盾。甚至某些仇恨中共暴政的藏人也相信這種謊言。

中共暴政縱容製造這種謊言，其政治目的在於——

透過漢藏矛盾的假象，掩蓋暴政在西藏犯下的重重反人類罪行，進而模糊藏人反抗的焦點，撕裂漢藏的族群關係，分而治之，使漢藏兩族無法形成

共同抗爭暴政的態勢。

仇恨中共暴政的某些人士相信這種謊言，則是由於思想的矇昧。

漢民族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但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漢人也應當對藏人的苦難負責。漢人的相關責任主要有下述各項：

漢人應當承擔的首要歷史罪責在於，是漢人知識份子群體，引狼入室，甘願做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在東方的政治代理人，為中共暴政征服東亞大陸提供精神基礎。

人類近現代史，是西方文化一路凱歌行進的過程，與之同時，東方文化則一潰千里，終至瀕於滅絕的邊緣。

這種歷史大趨勢發生的原因至少有兩個。

其一，中國文化，或者說東方文化整體上過分癡迷於對心靈的關注，以至於長久忽視了自然理性；西方文化則受到重視自然理性傳統的祝福，在近現代率先進入科學理性的範疇，而從科學理性中湧現出的奇蹟般的物性能量，為西方文化擊潰東方文化提供了難以阻擋的現實力量——

科學理性就是力量。

其二，隨著古希臘文化的復興，民主、法治、人權等觀念成爲西方政治學的正義之魂，而中國政治文化還自我囚禁在家天下的歷史鐵牢中。因此，在社會正義的意義上，西方文化獲得更加強大的道德召喚力和現實的政治能量。

當代是西方文化主宰的時代，東方文化只表現爲歷史天際的一抹黯淡的殘霞。所以，構成當代人類命運主題的，早已經不再是亨廷頓（杭廷頓）所斷言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矛盾——

東方文化作爲歷史殘骸而存在，不具有形成時代主題的精神能量。當代人類的命運主題，表現爲兩種西方文化傳統，即源於古希臘智慧的自由哲學和源於歐洲中世紀形成的極權主義文化傳統之間的宿命衝突。很不幸，當代的中國是復活的西方極權主義建立的東方巴士底獄。

近代史上，面對亡國滅種的大劫難，中國的漢人知識分子不是思考如何透過創造性思維，學習西方文化之長，來拯救自己精神的祖國，文化的家園。相反，他們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卑鄙——

中國知識分子竟形成一種時尚，即用惡意如熾的語言詛咒自己文化的故國，並以此來炫耀其才華。

中國文人在摧毀文化的祖國、心靈的家園之後，只能淪為無家可歸的文化流浪狗，作卑賤的思想乞丐，向西方乞討真理——

有尊嚴的學習者與思想乞丐之間的區別，像風姿綽約的美人與母猴子之間的不一樣明確。

或許因為歷史也厭惡思想乞丐，背棄文化的祖國之後，中國文人伸出去的屈辱之手，沒有得到自由哲學的施捨，而只乞討到西方文化中最具魔鬼天性的部分，即極權主義。

當代中國文化亡國，淪為西方極權主義的精神和政治殖民地的命運，隱喻著一個陰鬱的哲理：

在國運艱險之際，一個族群如果選擇背叛文化的祖國，拋棄心靈的故鄉，做真理的乞丐，那麼，這個族群最後乞討到的，只能是來自異國他鄉的魔鬼的詛咒，以及文化亡國奴的屈辱命運，而絕不會是真理。

對於藏人承受的地獄之苦，漢人應當負擔的第二項罪責，一言以蔽之，叫作爲虎作倀。

我曾對一位藏人朋友講這樣的道理：漢人不是藏人苦難的來源，藏人的苦難來自於一個文化意義上的種族，這個種族名叫「中國共產黨族」。

當時，這位藏人朋友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他說：「當我看到中國邊防軍士兵像射殺獵物一樣，一個接一個射殺想越過雪山，去尋找心靈依歸的尼姑時，我應當把這些士兵當作『共產黨族』，還是漢人？」我只有用鐵鑄的沉默回答這個問題。

沉默，是爲漢人羞慚。

漢人由於怯懦，過分長久地容忍了暴政，長久得已經習慣於政治奴隸和文化亡國奴的生活方式。

正是這種入骨的奴性，使漢人成爲中共暴政對西藏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的生命主體力量，儘管他們的生命只是無魂的行屍走肉。

在屠殺、迫害藏人的過程中，漢人政治奴隸常表現出冷血的獸性和對藏人的種族性蔑視：冷血的獸性是刻在骨頭上的奴性的變態表現方式；對藏人

的種族性蔑視則表述時代的荒謬——

暴政的卑賤奴才，卻敢於蔑視為重建文化的祖國，衛護心靈家園而抗爭暴政的藏人英雄，這難道不是時代的荒謬嗎？

漢人的偽善者莫過於偽類，即偽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偽民運人士。

這群偽類莊嚴地宣稱他們追求自由民主，但是，卻不承認藏人的民族自決權。

一個喪失決定自己政治命運權利的族群，不可能獲得自由的祝福。可見，偽類們心中的自由民主只是屬於漢人的特權。

同時，一旦聽到藏人中的愚昧者發出只要中共「憲法框架內的真正自治」的夢囈，偽類們便如同剛下過蛋的小母雞般亢奮萬分，他們似乎比暴政更急切地試圖把自由西藏運動引進中共「憲法的框架」，而中共「憲法的框架」只意味著囚禁自由的法律牢籠。

偽類的所作所為，在論證他們本質上只是中共所宣導的無魂的民族利己主義的精神奴隸，他們的人格離自由很遠，離奴性很近。

漢人是中共暴政和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受害者，而且受害的慘烈程度無

與倫比——

文化祖國被摧毀，八千萬同胞在大迫害、大屠殺、大飢餓中死去。

可是，漢人卻背祖忘宗，認賊作父，甚至在中共暴政驅使下，爲虎作倀，殘害藏人。

這種民族悲劇真令鐵佛都會痛斷肝腸。

正視並懺悔對藏人的苦難應當承擔的罪責是漢人得到自由拯救的前提。

當前，藏人正讓自己的生命化作一團團金色的聖火，用烈焰焚身裂骨之痛作爲祭品，表述對自由的苦戀。面對如此悲愴壯麗的英雄史詩，漢民族是否會被感動？漢民族是否還有擺脫中共政治奴隸的命運，重做自由人的意志和勇氣？

——歷史不是在等待回答，而是在逼問。

二〇一三年七月初稿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第一次修改完畢

二〇一三年八月八日第二次修改完畢

出版說明

本書的資料來源於下列三個群體：

- 一、中共高層良知人士，其中包括被稱爲「太子黨」的人士；
- 二、歷年因各種原因，特別是所謂「貪腐」而受到整肅的中共高級官員的家族成員；
- 三、中共體制內的藏人官員。

鑒於上述人士絕大部分現在仍然生活在中共極權鐵幕之下，另有許多人需要經常從海外回到中國，所以，對於爲本書提供資料的人士的個人情況，以及提供資料的方式，暫時不宜公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 袁紅冰，
安樂業著。 — 臺北市：亞太政治哲學文化，2013.09
面：公分
ISBN 978-986-89718-3-7(平裝)
1. 西藏問題 2. 報導文學 3. 政治人物 4. 宗教人物
676.64 102019201

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真相

作者 / 袁紅冰
安樂業

系列叢書總校訂 / 袁紅冰
文字編輯 / 布萊恩
美術編輯 / 蔡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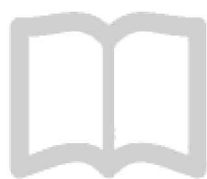
出版者 /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公司
發行人 / 陶延生
地址 /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46-1號7樓
電話 / 02-2761-3571
傳真 / 02-2766-1936
E-mail / app5399@yahoo.com.tw

發行總代理 / 紫宸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10號7樓之6
電話 / 02-8221-5697
傳真 / 02-8221-5712

出版日期 / 2013年10月
定價 / 340元

(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侵害必究

ISBN 978-986-89718-3-7



- 比小說更小說，令你顫慄、驚悚的「驚天祕案」報導紀實
- 曾經恭迎「佛牙」的政府官員、民代、善男、信女、大德、大師們不可不知，或裝作不知
- 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治謀殺
- 十世班禪大師真正死亡原因的知情人士被全部滅口
- 「現在我們已經控制了十一世班禪，如果再能把達賴喇嘛誘回國內，我們就等於捏住了西藏這頭野犛牛的兩個睪丸……」
- 「達賴現在窮得只剩下轉世靈童這個『寶貝』了！」——習近平
- 「……殺佛罪重，還是殺一個英國間諜罪大……」
——薄熙來為何在中共毒殺十世班禪大師的問題上保持緘默
- 「中共統治三十年，西藏遭受的破壞和苦難，以及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所謂『發展』帶來的益處」
——1989年班禪十世被謀殺前夕
- 和平協議？早在六十幾年前西藏就已經與中共簽了「和平協議」，結果呢？
- 面對中共，我們政府沒有專家，所謂的專家只有不同程度的無知而已
- 今日的西藏，明日的台灣
- 台灣人得過且過，反正火沒燒到自己都沒事
- 你以為本書這種案例只會發生在「那個地方」？

ISBN 978-986-89718-3-7



定價340元

上架建議：報導文學・政治人物・宗教人物